



博物馆事业操作实务

(中)

编者董原

目 录

博物馆藏品的搜集工作	1
文物的收购	1
文物的捐赠	6
文物的交换、拨交和拣选	12
考古发掘	16
中国博物馆藏品的保管工作	21
中国博物馆藏品保管工作概况	21
故宫博物院藏品的保管工作	29
中国革命博物馆藏品的保管工作	33
南京博物院藏品的保管工作	39
上海博物馆藏品的保管工作	43
中国博物馆的收藏	49
中央直属博物馆的收藏	49
综合类博物馆的收藏	51
历史类博物馆的收藏	57
文化、艺术类博物馆的收藏	63
民族、民俗类博物馆的收藏	69
历史遗址类博物馆的收藏	72
自然、科技类博物馆的收藏	76
纪念类博物馆的收藏	80
中国博物馆的陈列展览	87
中国博物馆陈列展览的概况	87
综合类博物馆的陈列	91
历史类博物馆的陈列	93
革命史类博物馆的陈列	96
纪念类博物馆的陈列	99

军史类博物馆的陈列	101
艺术类博物馆的陈列	103
自然类博物馆的陈列	105
科技类博物馆的陈列	108
民族、民俗类博物馆的陈列	110
中国博物馆的宣传教育与服务	112
群众教育队伍的宏观管理	112
群众教育队伍的选拔培养	120
讲解工作水平不断提高	125
举办流动展览和专题展览	131
配合学校教育活动	135
举办博物馆知识竞赛和夏（冬）令营	138
宣传教育活动形式的多样化	143

博物馆藏品的搜集工作

文物的收购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长达数千年发展的进程中，留下了极其珍贵而且十分丰富的文化遗产。中国人民有着收藏古代文化遗产的传统。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众多著名的收藏家，他们热爱文物重于自己的生命。特别是近百年来，一些帝国主义者利用他们在中国的特权，对中国历代的珍贵文物进行野蛮的盗窃与劫掠。为了保护中国的珍贵文化遗产免遭厄运，有的收藏家被捕坐牢，还有的甚至牺牲了生命。新中国建立以后，广大文物珍藏者，出自他们的爱国之心，把自己或者几代人保存下来的文物，主动出售（或者捐赠）给各博物馆，使其成为中国人民的共同财富，在博物馆陈列展览，供人们欣赏。

博物馆的文物收购工作，主要是通过文物商店和博物馆自身进行收购。文物商店向博物馆提供文物，是博物馆藏品重要来源之一。博物馆自身的收购，通常采取走出去和坐等上门两种方法。走出去即收购人员主动到文物收藏者家进行收购；坐等上门即文物持有者，将文物送到博物馆要求出售，博物馆则根据文物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来决定是否符合该馆的收藏标准，符合标准的给予合理作价加以收购，不符合馆藏标准的，要向文物持有者说明不予收购的原因，使文物持有者满意而去。

总之，不论是坐等上门还是走出去，文物收购人员均以积极认真负责的态度，最大限度地将各类有价值的文物，通过收购这一途径，收购到博物馆中来，使其成为博物馆的藏品。

新中国建立后，各地博物馆为了不断丰富自己的藏品，普遍开展了文物收藏工作，并且取得了可喜的丰硕成果。下面以博物馆为单位，作一简要介绍：

（一）故宫博物院

自新中国成立到八十年代末，累计收购各类文物达15万余件，而一级藏品就是有1500件左右，其中一级甲达200余件，例如：

1. 纸绢画

有宋代王诜渔村小雪图卷，马和之鹿鸣之什图卷，夏雪堂客话单页和松溪泛月单页，梁楷柳溪卧笛单页和柳寒鸦单页，法常水墨写生图卷；元代钱选八仙图卷，李 墨竹新篁图轴，赵孟 水村图卷和幽篁戴胜图卷，王振鹏伯牙鼓琴图卷，谢庭芝竹石轴；明代王履华山图册，林良灌木集禽图卷，吴伟渔乐图轴，沈周临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卷，唐寅毅庵图卷和墨梅图轴，文徵明绿荫长话图轴，仇英职贡图卷和临萧照中兴瑞应图卷，徐渭水墨葡萄图轴和墨花九段卷，董其昌山水册，兰瑛白云红树图轴；清代髡残层岩叠壑图轴，查士标空山结屋图轴，恽寿平灵岩山图卷，华 墨笔兰竹卷等。

2. 纸绢书

有唐代国铨善见律卷，颜真卿竹山堂连句册；宋代欧阳修灼艾帖卷，米芾兰亭叙题跋卷，赵孟坚自书诗卷；元代赵孟 张总管墓志铭卷，鲜于枢老聃道德经卷；明代宋克急就章卷，宋广风入松诗轴，解缙自书诗卷，张

弼行草诗卷，陈献章大头虾说轴等。

3. 青铜器

有商代三羊尊，四祀 其卣，六祀 其卣，亚 盘；周代格伯 ， 从 ，士父钟，天尹钟，虎饰钟；战国时期嵌银菱纹灯，嵌金银丝虎子，嵌金银戈顶等。

4. 瓷器

有唐代黑釉兰彩腰鼓，灰兰釉褐斑大罐；宋代钧窑碗，耀州窑刻花缠枝花瓶；元代釉里红松竹梅玉壶春瓶，青花鸳鸯莲花盘；明代成化青花折枝花果盘；清代康熙青花山水人物凤尾樽，五彩雉鸡牡丹尊，雍正粉彩花卉盘口瓶，乾隆黄地珐琅彩开光婴 纹瓶等。

5. 玺印。

有战国的“ 荃信 ”青玉 ，“善何”青玉 ，“祭睢”琉璃 ，凤纹鼻钮玉 ；汉代“淳于蒲苏”玉印，“王武”玉印，“新成甲”铜印，“ 志”玉印，“贵仆”玉印，“更始”白琉璃印，“焦育”骨印，“薄戎奴”黄玉印等。

6. 拓本

有汉代郭香察宋拓华阴本西岳华山庙碑册；晋代王羲之宋拓薛刻兰亭叙帖卷；唐代欧阳通宋拓道因法师碑册；怀仁集王羲之宋拓圣教序碑册；宋代蔡京等宋拓榷场本大观帖册。

7. 织绣

有明代缂丝赵昌花卉图卷，顾绣罗汉朝观音图轴；清代康熙香色地龟背如意锦等。

8. 玉器

有商代玉戈，玉 ，条纹玉 ，飞女玉佩，玉人首，玉鸟；周代双鸟纹玉器柄，龙纹玉饰件；战国时期勾云

纹玉奩，龙凤纹玉璧。清代乾隆水晶笔筒等。

（二）山东省博物馆

山东省文物总店，将多年收购到的近千件各类文物，送交山东省博物馆。其中铜器有商代祖辛方鼎，战国时期嵌金银镶绿松石铜镜，元代管军万户府印。书画中有明代林良芦雁图轴、文徵明书画扇面，毕自严自题画像轴，清代高风翰花卉及王铎草书等。瓷器中有宋代定窑鱼纹大碗，元代釉里红碗，清代窑变石榴尊、霁蓝天球瓶，以及玉器、古墨、砚台等。

（三）江西省博物馆

江西省文物商店，向江西省博物馆提供了四件珍贵的釉里红瓷器。其中青花釉里红堆塑四灵塔式盖罐，青花釉里红阁式瓷仓，都有用青料书写的“至元戊寅”年款，这种带有年款的釉里红瓷器极为罕见。

（四）扬州市博物馆

江苏省扬州市文物商店，向该馆提供 1 件元代蓝釉白龙梅瓶，其蓝釉晶莹艳美，盘绕在梅瓶腹部的白龙神态生动。在国外也有 1 件与此相同的梅瓶，而现存国内的这件梅瓶，比国外的那件还要高大，尤其可贵。

（五）辽宁省博物馆

辽宁省文物商店，向该馆提供 2 件精美瓷器：辽代三彩鸳鸯壶，该壶口作梅花形，柄作曲带形，壶身模印羽毛纹，造型新颖动人；元代青花双龙耳开光八楞罐，该罐通体绘 5 层青花纹饰，开光内绘松竹梅与鸳鸯莲花纹，主题醒目，画工精细，是元代青花中较为珍贵的作品。

（六）河南省博物馆

河南省文物商店，将收购到的“蜻蜓眼”琉璃球及东汉弩机，提供给河南省博物馆。“蜻蜓眼”琉璃球，整体

浮有莹光层；东汉弩机在望山上和郭上均有错银鸟纹，并且在望山上刻有标尺。

（七）上海博物馆

上海文物商店将自己收购到的许多文物珍品，陆续提供给该馆，其中有：宋代扒村窑黑地白花大梅瓶，明代陈洪绶的花卉草虫册，夏仲昭的半窗春雨图轴，清代梅清的山水册等。这些文物丰富了该馆的藏品，其中宋代扒村窑的黑地白花大梅瓶，还填补了该馆藏瓷中的空白。

（八）安徽省博物馆

安徽省文物商店将收购到的宋代翟院深画的绢本“雪景大堂”，提供给该馆，填补了安徽省博物馆无宋画的空白。

（九）苏州市博物馆

苏州市文物商店，向该馆提供 1 件元代釉里红龙纹盖罐，造型与纹饰均极精美，是元瓷中不可多得的珍品。还有 1 件明代徐渭草书“青天歌”，原是七折八皱粘满泥浆和水渍的一堆烂纸，经该馆整修，成为一件艺术瑰宝。

（十）青岛市博物馆

青岛市文物商店，前后两次向该馆提供了许多珍贵文物。第一次提供的有宋代钧窑洗，元代釉里红盘，明代兰瑛、八大山人，清代龚贤、王原祁、袁耀、郑板桥、金农、高凤翰、黄慎等名家书画，其中被列为一级文物的就有 24 件。第二次又提供珍贵文物 184 件，其中有吴伟的观瀑吟诗图轴、戴明说的墨竹、高凤翰的早期作品、松小梦的设色花鸟、张大千和溥儒合作的山水人物，以及刘重庆、王铎、刘统勋、林则徐等人的真迹。

（十一）首都博物馆北京市文物商店向该馆总计提供了 3000 多件文物，其中明代的洒蓝釉盃，是稀世之宝，

在国内尚属首见。在国外瑞士人曾藏过一件相类似的盃，一九八一年在香港拍卖，售价高达 370 万港元。

博物馆开展文物收购工作，不仅大大丰富了馆藏，同时还具有抢救文物的作用，使得文物免遭损坏。如前面谈到的明代徐渭草书“青天歌”，如不及时由博物馆整修，很可能作为烂纸被丢弃；明代洒蓝釉盃，原是北京一位市民用来盛盐的用具；苏州的元代釉里红龙纹盖罐，原是一位社员用来放稻种用的；辽宁元代青花八楞罐，原是鞍山一位居民放在草棚子里腌鸭蛋用的。以上所列数件珍贵文物，由于文物持有者不了解该器物的历史价值，而随意使用或抛置角落，博物馆或文物管理部门，如不通过调查了解，并及时加以收购，就有可能由于某种原因使其遭受不可挽救的损坏。所以这一看来极平常的文物收购，却有它不平常的作用。

文物的捐赠

文物捐赠即文物收藏者（个人或单位），将其所珍藏的各类文物，无偿送交给博物馆，从而成为博物馆的永久藏品。捐赠文物者有国内各界人士，侨居各国的爱国侨胞，以及外国的友好人士。参加捐赠文物的，不仅人数多，而且所捐文物精，有的是稀世之宝。文物捐赠充分体现了捐赠者热爱文物、热爱博物馆事业，热爱中国，热爱社会主义的一片赤诚之心。

一、国内各界的捐赠范例简略介绍

（一）天津艺术博物馆

一九八一年、一九八六年和一九八七年，先后共 3 次接受天津市政协委员张叔诚先生捐赠各类文物共 22

件。

（二）青岛市博物馆

接受孙墨佛先生捐赠给青岛市政府的他自己的书法作品共 270 件和书谱 10 本 , 以及其子孙天牧先生的部分绘画收藏品和仿制品共 40 件。

（三）重庆市博物馆

接受李初梨捐赠的各类文物共 568 件 , 其中有书画、陶瓷、铜器、砚台、碑帖等 , 很多作品具有较高的历史与艺术价值。

（四）安徽省博物馆

接受孙大光捐赠的从战国到清代的各类文物珍品近 200 件 , 其中有书画、瓷器、砚台、古墨等。

（五）山西省博物馆

一九八七年接受北京退休职工钱容之先生捐赠的由唐至明代的瓷器以及宋、元、明、清的书画 , 共计 110 余件。

（六）湖南省博物馆

接受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曹瑛捐赠的他自己珍藏多年的文物 95 件。不仅丰富了该馆的藏品 , 有的还填补了该馆的空白。另外 , 该馆还接受了农民的捐赠 , 有重 154 公斤的兽面纹大铙、夔纹卣以及兽面纹觚等文物。

（七）黑龙江省博物馆

接受大庆市冯义信捐赠书画两件。一件是宋人绢本淡彩蚕织图卷 , 包首是宋代缂丝鸟兽繁花图案。另一件是明以后仿制的瑶池醉归图卷 , 其卷后题跋皆为宋元真迹。这两件为清帝溥仪出宫时由宫内带至长春 , 抗日战争胜利后 , 散落在长春街头商贩之手 , 在一九四七年为冯义信所购得的珍贵文物。黑龙江省政府为了表彰冯义信的

爱国行为，于一九八四年三月召开大会，向他颁发了奖金和奖状。

（八）黑龙江省革命博物馆

接受原黑龙江省委常委、后任省顾问委员会主任的张凌捐赠的革命文物 47 件。其中有他在中国解放战争时期在黑龙江工作时保留的许多珍贵历史照片；有延安和黑龙江几个省、地区使用的钞票，有些钞票现在已经很少见到。另还接受一九二九年“孙中山先生安葬纪念”银质像章一件，该像章是东北林学院离休老干部柳营的伯父留下的。

（九）甘肃省庆阳地区博物馆

接受庆阳县董志公社社员捐赠商代玉戈一件，该玉戈的大小与形制和殷墟妇好墓所出玉戈基本相似，对研究和探索殷商文化在西北地区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重要资料。

（十）河南省博物馆

接受中牟县黄庄和大庄社员张彦兴、李抓妞捐赠的商代二里岗时期青铜器 5 件，有 爵、觚、戈等。黄庄和大庄距郑州只有二三十公里，为商氏族活动的主要地区，在这里发现青铜器，预示中牟一带在今后可能会有更重要的发现。

（十一）绍兴鲁迅纪念馆

接受已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周建人的夫人王蕴如捐赠的清嘉庆年间刻印的《嘉泰会稽志》、《宣庆续会稽志》、《越谚》，四十年代绍兴禹庙禹王像等。还接受浙江省农业厅袁默君捐赠的两幅原照。

（十二）中国农业博物馆

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委员刘瑞龙前后两次捐赠。计有古本线装书《滇南本草》、《野菜博录》、《新纂云南通志》1套140册，《福州通志》1套100册，以及农学、畜牧、土壤、农机等科学书籍65册。

（十三）上海博物馆

接受邱辉先生捐赠的西周青铜器小臣单觶、鲁侯尊、厚方鼎、无、纪侯；薛贵篁先生捐赠的效卣；陈大年先生捐赠的鄂侯驭方鼎；孙鼎先生捐赠的旅钟。

（十四）武汉市博物馆

接受武汉市居民刘敦敏捐赠的林则徐用过的龙凤端砚，该砚刘家保存了四代人，时间长达一百四十余年。

（十五）故宫博物院

该院接受国内各界人士捐赠文物，一是人数多，二是数量大，三是质量精。为了表彰文物捐赠者，故宫博物院在建院六十周年所举办的展览中，特公布了所有捐赠文物者的名单，共有430多人，文物达2.1万多件。其中捐赠一级文物的有48人，共捐赠珍贵文物290多件。他们是（以姓氏笔画为序）：丁燮柔、马衡、王文昶、王志明、王衡永、邓以蛰、乐东屏、冯大生、冯公度、刘九庵、刘秉崑、朱光、朱氏、朱省斋、朱桂辛、关瑞梧、孙云洲、李一氓、李德全、李濂堂、吴景洲、沈仲章、肖瑾、陈万里、陈叔通、陈汉第、杜是、何贤、何遂、郑佑民、郑振铎、郑洞国、周一良、周作民、张允亮、张伯驹、张彦生、张珩、侯宝璋、夏锡忠、夏润生、徐石雪、黄胄、黄镜涵、章乃器、廖泰初、萧龙友、魏今非等人。所捐赠文物定为一级甲的，书画有：宋代马远的水图卷；元代赵孟頫的人骑图卷、浴马图卷、草书千字文卷、高峰和尚行状卷、临兰亭叙卷，黄公望的天池

石壁图轴，顾安的幽篁秀石图轴，邓文原的范仲淹书伯夷颂诗题册页，杨维禎的张南轩城南唱和诗卷，周伯琦的朱泽民墓志铭卷；明代夏昶的湘江风雨图卷，仇英的桃村草堂图轴、人物故事册，于谦的题中塔图赞册页，傅山的草书孟诗卷；清代罗聘的山水人物册以及北魏太安二年的明拓中岳嵩高灵庙碑册，唐代欧阳询的北宋初拓九成宫碑册，李邕的宋拓云麾将军李思训碑册，孙过庭的太清楼书谱册。青铜器有商代二祀 其卣，周代水鼎。瓷器有唐代越窑壶，宋代钧窑莲瓣洗。织绣有明崇禎七年的绣宋元名迹册。玉石器有商代大玉戈、青玉几何纹刀，周代韬发玉图等。国内各界人士的捐赠，由于篇幅所限不能一一列举。

二、爱国侨胞及国际友人的捐赠范例简略介绍

（一）南京博物院

该院于一九八七年一月赴香港珍品展览期间，接受香港豆品公司董事长罗桂祥博士捐赠的 7 件清乾隆十七年景德镇窑烧制的外销瓷。另外，还接受了侨居美国的侯北人教授捐赠自己的代表作 8 幅。

（二）广州美术馆

接受旅法画家关金鳌先生捐赠的包括他收藏的 7 幅古代油画和自己的作品 170 多幅。

（三）故宫博物院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三日，上海市人民代表、上海市政协委员杨通谊先生，遵照其侨居美国的姑母杨令女士的遗嘱，将其收藏的绘画 131 件、玉器 6 件、象牙球 1 件捐赠给故宫博物院。

一九八七年澳门爱国人士何鸿先生，将自己用重金收购的书画、玉雕、石雕、牙雕、水雕、印玺、古墨、

砚台等历史文物 147 件,委托澳门爱国人士马万祺先生,无偿捐赠给故宫博物院。

(四) 中国历史博物馆

一九八二年八月接受日本“不言堂”会长坂本五郎委托日本“中国文物爱好者友好访华团”团长圆诚寺次郎赠送的 1 件宋代漆盘,该盘底部有篆书圆章“碧天”二字。

同年还接受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东方语言系教授简慕善捐赠的珍藏多年的康有为四条屏,使这件具有历史和美学价值的作品,回到它的故国供人民欣赏。

(五) 中国邮票博物馆

一九八七年接受了美国作家詹姆斯·埃思里奇先生捐赠的其父亲日·W·埃思里奇先生用毕生心血收集到的一批邮品,其中包括美国五十年来的首日封和纪念封 2210 枚,明信片 83 枚和一批邮票。

从以上所列举的极不完整的统计来看,国内、外各界人士向各地博物馆捐赠的各类文物数量是很可观的。有的保存了几代人,有的用了毕生的精力和心血收集而得,他(她)们出于对伟大中国的热爱,毅然作出抉择,无私地捐赠给中国博物馆。周谷城副委员长为澳门爱国人士何鸿先生捐赠文物作了以下题词:

文物捐献,事不寻常。爱国热情,理应表扬。国家重视,审慎馆藏。取精用宏,教育腾芳。

这 32 个字,既是对何鸿先生捐赠文物的赞扬,又是对所有为了支持博物馆事业的发展,丰富博物馆的藏品,而无私地捐赠文物的各界人士的赞扬。

文物的交换、拨交和拣选

文物交换是博物馆之间为了调剂相互之间的余缺而采取的一种方法。各地博物馆的藏品多具有鲜明的地方性。这是由当地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例如，在某一历史时期内，某一王朝在某地的某一种或某几种文化艺术特别发达，因而，在这一地区遗留下来的这一方面的文化遗产也就特别丰富。而在另外一些地区，同类文化遗产则明显落后于该地区。因此，各地博物馆之间的藏品，会因地区的不同而出现地区性的不平衡，为了解决这种地区间由于种种原因所造成的藏品类别与质量上的差异，采取通过一定的批准手续，实行馆际之间、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藏品交换，互通有无、调剂余缺，以丰富充实各自的馆藏文物。这种办法是切实可行的，同时也是博物馆之间双方易于接受的一种办法。

拨交不同于馆际之间的交换。拨交是文物收藏机构一方，将自己的收藏无偿地交给另一方。因此，拨交文物具体地体现出彼此之间相互支援、共同发展的全局思想。这是建立在反对本位主义思想基础之上的。本位主义思想一般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根据自己的馆藏（如某一类藏品数量较大，而且在形制与纹饰上多有相同类似之处）明明可以支援别人，却不去支援；另一种为了丰富自己的馆藏，不管别人馆藏如何，总是千方百计地把别馆的重要藏品纳入自己的馆藏，从而成为本馆的镇库之宝。鉴于以上两种思想的存在，有关文物管理部门在处理文物拨交时对于应该而且可以拨交的要坚决支持，不该拨交的坚决不予批准。

拨交是丰富博物馆藏品的一种途径。新中国建立以来，向故宫博物院拨交文物的单位即有：国家文物局，北京市文化局，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中国历史博物馆，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博物馆，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江苏省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北京定陵博物馆，北京颐和园管理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中央气象局，天津艺术博物馆，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南京博物院，山东省文化局，山东省博物馆，山西省博物馆，广东省文化局，敦煌文物研究所，北京市财政局等单位。

拣选是指博物馆从废品收购站、冶炼厂、造纸厂等单位即将处理的“废品”、“废料”中挑选出文物，而成为博物馆的藏品。拣选是文物保护工作中，具有抢救性的一项措施，同时也是博物馆藏品来源的途径之一。

新中国建立以来，拣选文物的丰硕成果主要有：

1.北京市文物工作队

于一九八一年八月在北京铜厂，拣选出一组青铜器共28件。其中大部分有铭文“举”2字，这在拣选工作中实属少见。

2.首都博物馆

在一九八二年夏举办“北京市拣选古代青铜器展览”，共展出从商到清青铜礼器、兵器、工具、饰物、钱币、印章、佛像等660多件，其中西周的“班”和“伯”，特别引人注目。

3.山西省博物馆

从一九六四年起和太原电解铜厂互相配合，在该厂回收的废铜中，拣选出商到南北朝时期的各类历史文物共计1000余件。

4.天津市文物管理处。

一九六六年从天津电解铜厂杂铜中,拣选出一件西周“ 羶 ”盖,有铭文 96 字。

5.天津市文物保管委员会

从废铜中拣选出一件“ 曹伯狄 ”盖,一九六五年春由山东运来天津。曹国铜器传世较少,这件 盖的被发现,可补宋朝以来各家著录中没有曹国青铜器之空白。

6.湖南省博物馆

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五年期间,从长沙废铜仓库拣选出 16 件形制及纹饰都是很特殊的铜钺。

7.湖北省襄樊市文物管理处

一九七九年四月从废品回收公司,拣选出一批青铜器,其中带铭文的有:父戊爵、曾仲子敌鼎、侯氏、邓公牧 等。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八一工厂废品库里,拣选出原国民党海军巡洋舰“ 重庆 ”号的舰名牌。该舰是当时国民党最大的一艘军舰,于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五日,在上海吴淞口岸举行震惊中外的武装起义。后来该舰被美国和国民党飞机炸沉。“ 重庆 ”号巡洋舰舰名牌在废品库被发现,弥补了该馆文物陈列中的这一空白。

文化部文物局,为了表彰各地在拣选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于一九八四年秋冬,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了“ 全国拣选文物展览 ”,共展出全国各地拣选的各类文物精品数以千计。

除交换、拨交和拣选外,还有一些其他文物搜集方法,也取得成果。其中主要有:调查征集、实地采集及战争缴获等。例如:

1.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淮海战役纪念馆

该馆文物征集人员,仅一九八六年就征集各种文物及资料 100 余件。如他们了解到在淮海战役中,牺牲的日籍中共党员板本寅吉的儿子,保存着烈士的遗物和证书,立即派人前往访问,并将征集到的遗物和证书公开展出。

2. 中国邮电博物馆筹建处

一九八七年六、七月份,派人到甘肃、青海、贵州、四川、陕西、山西等省,征集到清末邮传部实寄封套和信札、火漆戳记实寄封,标有电报局名的《中国分省图册》以及晋绥边区邮政管理局用过的刻章工具等。

3. 江西省文安县博物馆

该馆通过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奖励群众及培训群众的方法,在两年的时间里,征集到革命文物 900 余件,历史文物近 3000 件。

4. 文化部文物局扬州培训中心

该中心举办的“中国古陶瓷鉴定学习班”,组织学员到野外和基建工地采集古陶瓷片,其中唐代青花瓷片,比浙江等地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相继发现的宋代早期青花瓷片和青花瓷器,在时代上还要早,这样,青花瓷在中国生产的时代,就提前到了唐代。

5. 和军事有关的博物馆

如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抗日战争纪念馆、中国人民抗美援朝纪念馆等。这些馆收藏和陈列着许多重大战役中缴获的武器弹药、通讯器材、运输工具以及各类文件等。

考古发掘

考古发掘是博物馆获得大量藏品的重要途径。因为社会搜集总有一定的限度，流散在社会上的文物也是有限的。而保存在地下的文物却是大量的，而且往往会有空前的新发现，这是社会搜集根本不可能有的。这些考古新发现，为丰富博物馆的馆藏，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而且有的考古现场，还被建设成为遗址博物馆。

一、重要考古发现为博物馆提供的珍贵文物

(一)一九五六年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车站附近，出土的披毛犀骨架化石，是在中国出土的较巨大和较完整的一件。一九七三年在肇源县三站公社，出土了较完整的猛犸象骨架化石个体。这个发现在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史上还是第一次。

(二)一九八二年在四川省重庆市北碚同兴乡发现的原始蜥脚龙。此类化石仅在澳大利亚和印度发现过一些碎片，而同兴乡所发现的为三个个体，有部分背椎和尾椎的脊椎和肩胛骨、肢骨、腰带等。这是恐龙化石发掘史上，极其重要的发现。

(三)一九七三年七月在辽宁省阜新县胡头沟，发掘一座红山文化墓葬，出土玉器 15 件。(四)一九八六和一九八七年，在浙江省余杭反山良渚墓地和瑶山良渚文化祭坛遗址 11 座墓葬中，共出土与采集玉器达 4200 多件。在余杭地区出土如此众多的良渚玉器，为国内外所瞩目。

(五)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六年，在河南省安阳殷墟发掘的 5 号墓，它是自殷墟发掘以来，保存最完整的一

座王室墓葬，共出土各类器物多达 1928 件。

(六)一九八六年八月在四川省广汉三星堆遗址，发现商代晚期 1 号 2 号祭祀坑，形制之大，出土文物之丰富，各类器物制作之精美，为多年来所少见。两坑共出土金器、青铜器、玉器近 800 件，所有这些表明广汉三星堆，是蜀国早期政治与经济活动的中心。

(七)一九七七年七至八月，在陕西省岐山县凤雏村，发现西周初期甲骨文、卜骨和卜甲，共有 17000 余片，其中带字卜甲 190 余片，约有 600 余字。这批甲骨的发现，确证了早周都城岐邑所在地。因此，这批甲骨文的发现，也是研究周初历史的重要资料。

(八)一九七六年在陕西省扶风县庄白 1 号西周青铜器窖藏，出土重要青铜器 100 余件。

(九)一九七八年在河南省淅川县下寺春秋楚墓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上面玲珑剔透的附饰，为腊模制造工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十)一九七八年三月在湖北省随县发掘的曾侯乙墓，共出土各类器物达 7000 余件。其中的乐器不仅种类全、数量多，而且制作精美，保存完好，更是一次罕见的重大发现。

(十一)一九八二年一月在湖北省江陵马山砖厂，出土了一大批内容十分丰富的战国丝织品，几乎囊括了先秦时期丝织品的全部品种。

(十二)一九七七年在河北省平山县，发掘了一座战国中山王墓，出土了大量带有铭文而且造型精美的青铜器。这一发现对研究中山国的历史及其王系，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十三)一九七四年三月和一九七六年五月，在陕西

省临潼秦始皇 1 号、2 号兵马俑坑，两次进行发掘，通过发掘再现了当时秦始皇那威武的军阵。在一九八一年又出土了秦始皇陵铜马车，这是秦王朝考古的重大收获。

(十四)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在云南省晋宁石寨山发掘的古墓群，共出土文物 3500 件。这批文物除具有较浓厚的地方特点外，很多器物是从前没有发现过的，填补了滇文化的一些空白。

(十五)一九八六年在河北满城陵山发掘了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王后窦绾墓，出土的大量文物，不仅工艺水平高，而且有的还是首次发现，为研究西汉时期手工业和工艺美术的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

(十六)一九七八年九月至一九七九年六月，河北省在磁县发掘了东魏茹茹公主壁画墓，出土的彩绘陶俑和壁画，填补了中国绘画史上的一项空白，是一次极为重要的发现。

(十七)一九七七年和一九七八年春，在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县林前公社，清理了一批宋墓。出土的鎏金漆器为前所未见，剔犀漆器比传世的元代张成、杨茂的作品还早。

(十八)一九八二年四月，在江苏省淮安县发掘了明代处士王镇夫妇合葬墓。在墓主人王镇的两腋之下各有一个书画卷，两卷共有元、明时期的书画 25 幅，有明代前期享有盛名的大画家如夏昶、马轼、李在、谢环、何澄、戴浩、夏芷、陈录等人的作品，也有不见画史的如李政、高鼎、樊晖等人的作品。见于画史的，可以进一步了解他们的画风，如李在的墨笔宣花图，一改他只学郭熙山水的说法。陈录不仅画梅花而且也画竹。而以明院体人物、山水画著称的马轼、夏芷、谢环等人，却画

出了逸笔草草的枯木竹石和米派山水。这些作品都是前所未有的。这批书画的出土，不见画史的可以补画史的缺失，为中国书画史的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和珍贵的实物资料。

考古发掘不仅对丰富博物馆的藏品，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它和社会搜集来的藏品相比，具有很高的科学性和时代准确性。为博物馆的陈列、科学研究、出版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依据。

二、遗址博物馆

考古发掘不仅为博物馆提供了极其珍贵馆藏文物，而且一些重要的考古现场，已成为中国的遗址博物馆，供国内外参观。例如：

（一）定陵博物馆

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境内的燕山脚下，是一座专题性的博物馆。它的主要建筑是地下宫殿。埋藏的是明代第十三个皇帝朱翊钧和孝端、孝靖两个皇后。定陵整个建筑占地 18 公顷，修建时间历时六年，耗银 800 万两。该陵墓的发掘，揭开了地下宫殿的秘密。出土的珍贵文物，不仅揭露了封建皇帝奢侈淫逸的生活，也反映出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勤劳与智慧。为便于参观游览，于一九五九年十月在原址建立了博物馆。

（二）北京市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

位于北京市丰台区郭公庄西南隅，距市区 15 公里。是中国第一座专题性的汉墓博物馆。该汉墓为燕王（或广阳王）及夫人的墓葬，发掘于一九七四年六月，是北京地区已被发现的规模最大的汉墓中的两例。整个墓室不用一砖一石，全部用柏木堆垒而成，是一座规模宏伟的木结构地下宫殿。该墓历时二千多年仍基本完好，其

重要原因是墓葬具有较好的密封防潮性。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就是在陵墓的发掘原址复原建立的，它展示并保存着研究西汉葬制及北京地区历史的宝贵资料。

（三）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位于陕西省临潼县城东 15 华里。该兵马俑坑是一九七四年三月在临潼县晏寨公社西杨村社员打井时发现的。一九七五年底，国家决定就地建立博物馆。一九七九年十月正式开放。1 号兵马俑展厅，东西长 230 米，南北跨度 72 米，高 22 米。厅内周围有环形参观廊。大厅前广场两边是辅助陈列室，陈列着出土的各种兵、马、战车和实战兵器。秦俑坑的发现，为研究中国秦代历史和文化艺术，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四）西安半坡博物馆

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东郊，距市中心区约 12 华里，建于一九五八年，是中国第一座新石器时代遗址博物馆。该馆总建筑面积为 5390 多平方米，有 4 个陈列室和 1 个遗址室。第一陈列室，主要展出半坡先民生产活动和生产工具。第二陈列室，主要展出生活用具、艺术创造和科学实践。原始社会史第一陈列室，主要展出中国各阶段的猿人头骨化石和古动物化石，以及猿人使用的工具。第二陈列室反映中国母系氏族公社的产生、发展、繁荣。在遗址大厅保存着部分原始村落居住遗迹，其面积约 3000 平方米。房屋有半地下室和地面木架建筑，形状有圆形和方形两种。在房屋旁有许多储藏东西的地窖，是公共仓库。

以上 4 个遗址博物馆，包括馆址及其全部藏品，都是考古发掘品，由此可见，考古发掘对博物馆藏品搜集的重要意义。

中国博物馆藏品的保管工作

中国博物馆藏品保管工作概况

只要是成立了博物馆，就会有藏品的保护管理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中国的博物馆工作者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汲取传统的金石学、方志学、考据学、目录学的成果，同时也借鉴外国博物馆藏品管理方面的经验，逐步摸索、总结出中国博物馆自己的一套藏品保护管理办法。文物藏品保管不仅基本的工作内容已被确定下来，而且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管理程式。

例如，中国人开办的第一所博物馆——南通博物苑，就很重视藏品的征集、鉴定、分类、登账的工作。博物苑的创办人张謇一九〇八年就写过《通州博物馆敬征通属先辈诗文集、书画及所藏金石古器启》的征集启事，要求“收藏故家出其所珍，与众共守”，以便“留存往迹，启发后来”。他还聘请陈师曾、诸宗之、宣子野等专家帮助鉴定文物，请日本籍教师木村忠治郎帮助鉴定动植物。一九一四年在鉴定、分类的基础上还编印出版了《博物苑品目》，收录了自然、历史、美术、教育 4 部分文物、标本共 2973 件。从这个《品目》上看，当时南通博物苑在藏品收藏方面，自然部分包括动物、植物和矿石标本等类别；历史部分包括金、玉石、陶瓷、拓本、土木、乐器、画像、卜筮、军器、刑具、狱具等类别；美术部分包括书画、雕刻、漆塑、织绣、缂丝、编物、文具等类别；教育部分包括科举、私塾、学校 3 科，有科举时

代的考卷、夹带、窗课，有对儿童进行教育的教具如轮船、兵器、农业机械等实物和模型。实际上，这一部分是从历史部分划分出来的，为的是为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进行研究的实物。据统计资料表明，到一九三三年，南通博物苑的藏品已发展到 3605 件。这对旧社会一个私营博物馆来说，的确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又如故宫博物院，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五日溥仪被逐出皇宫后，中华民国政府组成了清宫善后委员会，清点清宫物品，逐宫逐室加以清点查收，约一年，整理出点查报告，共 6 编 28 册 9.4 万余号 117 万多件，一九二五年十月十日故宫博物院成立后，这些东西就成了故宫博物院的藏品。该院成立初期，即由原存各宫殿中核对原号，集中一处，查启箱匣，逐一点交查收。在点收的同时，随时登记，建立各种账目，包括各项文物提收总账、库房细账、分类清册等。这些账册有些很明确，很清楚；有些则很不明确，比较含糊，如 1 捆、1 盒、1 匣，像很贵重的宝石，说 1 盒而不注明内装多少粒；字画贴拓说 1 捆而不注明多少张，嵌宝石盆景 1 件而不注明嵌了什么宝石，嵌了多少等等。在各类文物相对集中的基础上，还进行了部分藏品的审查、编目工作。成立了铜器、瓷器、书画三个审查组。至一九三一年底，鉴定了铜器、瓷器各千余件，书画 2000 余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故宫博物院，文物征集活动不多。抗日战争以前，只购买过新莽权衡，没有征集过其他文物。抗战胜利以后，在马衡先生主持院务期间，征集、接收、收购了郭葆昌的瓷器、杨宁史的商周青铜器、孙素堂的丝绣、溥仪在天津张园住宅的物品以及唐写本旋风装刊谬补缺切韵卷、南宋宝庆刊本《四明志》的第七、第八两卷（与故宫原藏正好

合成全部)。总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故宫博物院文物账册一般来说做得还是比较清楚的,除了上面谈的那些账册外。“九一八”事变以后,为保护文物免遭日寇劫掠,故宫文物南迁之时,造具有南迁文物清册,一九四五年还造具过《留院文物点查清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大多分散贮放于各个宫室之中,而专门设立的延禧宫、北五所、保和殿西庑、寿康宫四个大库,也是各类文物合贮在一起。所谓分类整理、审查编目,涉及的藏品与文物总藏量相比,只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

自日寇侵华以来,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家一直处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环境之下,社会动荡不安,中国的博物馆事业不断凋零,从三十年代的100多所下降为24所(包括中国人办的和外国人在华办的),馆藏文物也不断迁移。在这样一种战乱的情况下,博物馆的藏品保护管理工作是不可能有所发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接收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博物馆的时候,各馆大多处于管理混乱、账目不清、底数不明的状况之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中国稳步开展了对旧有博物馆的整顿和改造工作,同时也注意了社会主义新型博物馆的建设工作。经过整理,博物馆的藏品保管工作基本上克服了混乱状态,一般都有了专人负责、专库度藏,初步建立了保管制度,进行了藏品的清点、登记、编号、分类、排架等工作,保障了藏品的安全。

博物馆的藏品,从时间方面看,有远近之分;从制作工艺方面看,有精粗之别;从质料方面看,有贵贱之分;从保存程度方面看,有完残之别;从反映社会、反映事物的本质方面,也就是说,从社会意义方面看,有重轻

之分；从纯经济价值方面看，也有高低之别。也就是说博物馆的藏品，其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是各不相同的，有的极其重要，有的比较重要，有的相对说来就一般一些、普通一些，但它们又都是人类的历史文化遗产，都应当很好地保管保护起来。但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人力方面、财力方面、物力方面的各种限制，实际工作中对它们的保管保护的措施、方法，不可能做到完全一样，就会有区别。对普通一些的，要加以保护；对比较重要一些的，要加强保护，放置的条件更好一些，保护的措施更多一些；对极其珍贵、极其重要的那一部分，就要格外采取措施，给以特殊的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对大量藏品的整理工作中，就有珍贵的、一般的、需要处理的之分，如南京博物院就有基本藏品库和储用藏品库之分。以后许多先后成立的博物馆，也都有类似的划分，如上海博物馆，一开始就搞了“选品”和“参考品”之分。

为了加强对藏品的保护管理工作，各个博物馆在工作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对藏品提出了分级的问题，并定出了一些具体的标准，如故宫博物院在一九六二年比较科学地进行藏品划级工作，将藏品分成一、二、三级三个级别。实际上是五个等级，因为一、二级里又分了甲乙两等。中国历史博物馆大致上也是这个时期开始进行此项工作的。国家文物行政管理部门适时总结了各地博物馆的经验，一九六二年四月十一日文化部发布了《关于加强一级藏品的编目保管工作的指示》，提出了藏品要按类分级，规定一级藏品是特藏品，二级藏品是重要藏品，三级藏品是一般藏品。这以后，各馆相继贯彻了这一指示精神，关于藏品的分级工作在全国范围内的博物

馆中全面铺开，大多实行了三级分级制，但也有一些馆仍然是搞两级分级制，主要是由于鉴定力量不足，鉴定水平不够高而造成的。如中国历史博物馆从一九六二年四月下旬开始至十月十五日，完成了全部一级藏品 2182 件的编目工作；中国革命博物馆从一九六二年五月开始至十月基本完成了馆藏一级品的鉴选工作；南京博物院实际上在一九六一年十月开展的书画鉴定工作中，就按照三级划分的标准来进行了，从 3 万多件书画中选出精品 87 件、较精品 1112 件；上海博物馆则从他们确定为选品的文物中，再划出一级藏品来；广西、黑龙江等省博物馆也按照三级分级制的要求，对藏品（包括自然标本）进行分级，而湖南省博物馆等实行的是两级分级制，即从藏品中挑选出一级品来。

关于博物馆的保管工作，国家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在一九六四年曾拟定颁发过《博物馆藏品保管暂行办法》，一九七八年初，经过一九七七年于苏州召开的“部分博物馆文物保管座谈会”广泛地讨论、酝酿，对中国博物馆文物保管工作的实际又进一步加以总结，提出了一些新鲜经验，国家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及时地对原有《暂行办法》进行了修改、补充和提高，重新拟定颁发了《博物馆藏品保管试行办法》，并拟定颁发了《博物馆一级藏品鉴选标准》，使遭受“十年动乱”严重破坏后的中国博物馆的藏品保管工作做到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更加科学化、制度化，从而使中国博物馆藏品的保护管理工作，在原有基础上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了对内搞活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政策，中国博物馆藏品保管工作也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新问题，特别是一九八二年底《中华人民

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颁布施行，对博物馆藏品保护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对这样一些新的情况，有些博物馆提出，希望能对《博物馆藏品保管试行办法》进行修订，充实一些内容，搞成一个正式的条例或办法，颁发施行，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同时有些博物馆还要求重新拟定一级藏品鉴选标准，提出了各式各样的拟定设想，最主要的是原鉴选标准是粉碎“四人帮”不久以后拟定的，由于时代的局限，原拟定的鉴选标准还存在着极左思潮影响的痕迹。而且，博物馆的藏品分为三级，但只有一级藏品的鉴选标准，没有二级、三级品的鉴选标准，也不够全面，因此，需要根据中国博物馆藏品收藏的实际，拟定出一、二、三级品的鉴选标准，以便使有关的规定能对应起来，便于各基层博物馆掌握和执行。这些意见无疑是很中肯的，对《博物馆藏品保管试行办法》和《一级藏品鉴选标准》进行修改和补充，无疑也是很有必要的。国家文物行政管理部门于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在福州市召开了“博物馆藏品保管工作座谈会”，总结、交流各博物馆藏品管理工作的情况和经验，在讨论、修改一九七八年颁发的《博物馆藏品保管试行办法》的基础上，研究和制定新的藏品保管办法和文物定级的标准。广泛地听取了各博物馆的意见，将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分别拟定出了《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和《文物藏品定级标准》，分别于一九八六年六月和一九八七年二月颁发实施。

新拟定的《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主要体现了以下几点：

(一)认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明确提出这个办法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有关条款制定的，实际上可以理解为这个办法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有关馆藏文物的实施细则。

(二)这个办法力图正确处理好文物保护和利用的关系，强调了既要妥善安全地保护好文物、标本，又要恰当合理地使用好文物、标本，这是两个不可偏废、互为依存的方面，即在保护好文物、标本的基础上运用文物、标本，在使用好文物、标本的过程中加强保护，促进对文物、标本保护工作的提高和发展。

(三)体现加强管理和简政放权的原则，大权集中、小权分散、分级管理、明确职责。可以归纳为：

1.国家文物局主管全国文物系统博物馆藏品保护管理工作，地方文物主管部门主管各地方文物系统博物馆的藏品保护管理工作，各博物馆管理本馆藏品的保护管理工作。必要时，国家文物局可以调拨和借用全国各博物馆的藏品；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可以调拨和借用本辖区内各博物馆的藏品，其中一级藏品的调拨，须经国家文物局批准。

2.国家文物局重点抓好一级藏品的保护管理工作，一级藏品的调拨权和取样化验权集中到国家文物局；地方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抓好本辖区内各级藏品的保护管理工作，除一级藏品以外的其他藏品的调拨权和取样化验权，一律集中到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

3.各博物馆负责本馆藏品的保护、管理和使用，为发挥馆内各级干部的积极性，分别不同情况，授予不同职责。馆内一级藏品的提用、修复、复制等，一律由馆长批准。对于其他藏品，中央馆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博物馆可以由保管部主任来审批。考虑到地、市、县级博物馆干部业务素质和管理水平相对较低，不授予保管部

(组)级干部这种权力,这一类博物馆一级藏品的提用权和各级藏品的修复、复制权,一律集中到馆长。对于藏品借出馆外,一级藏品由主管文物行政部门审批,其他藏品由馆长来确定。

(四)改变了原《试行办法》在当时条件下的一些提法,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而且用更加确切的语言文字,反映藏品保护管理工作的本质。如原《试行办法》中有“必须加强博物馆藏品的保管工作,充分发挥藏品的作用,以更好地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服务”这样一段文字,现在修改为“为了准确鉴别藏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加强藏品的保护管理,确保藏品的安全,充分发挥藏品的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有关条款,制定本办法”。这样,就更确切、更透彻一些。

(五)适当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如:保管人员的劳动福利待遇问题、藏品调拨权问题、藏品定名的原则和方法问题、藏品管理现代化问题、馆级负责人提用藏品应经同级其他负责人员同意的规定、藏品严禁出售和作为礼品的规定、奖惩问题等,对更好地保护管理藏品会起到有益的作用。增补的这些内容不是随意加上去的,它反映了广大保管干部的要求和迫切愿望,也反映出博物馆藏品保护管理工作的科学规律。

新拟定的《文物藏品定级标准》,分别以条文的形式,对博物馆收藏的一级品、二级品和三级品文物提出了鉴选的标准,但标准只能规定一些条条,实际执行中,往往掌握也不容易完全一致,总会有宽有严、有紧有松。为了尽可能地避免产生这种情况,《文物藏品定级标准》还附有对玉器、陶器、瓷器、铜器、金银器、石刻砖瓦、

法书绘画、甲骨、符碑印章、货币、牙雕、竹雕、漆器、珐琅、织绣、古籍善本、碑帖拓本、武器、宣传品、证物、文件、名人遗物等 22 种文物类别的一级文物的定级标准举例，有了这种举例，定级标准就不再是难以确切掌握的条条，而是实实在在的标准、确确实实可以掌握的尺度了。

《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和《文物藏品定级标准》的颁发施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博物馆藏品管理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使中国博物馆藏品管理工作在原有基础上得到了较大的提高。特别是一些历史较长的博物馆在藏品保护管理工作方面的经验教训，对不少中小型博物馆，尤其是许多后来新成立的博物馆，是可以引以为鉴，具有参考和参照的意义。

故宫博物院藏品的保管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留存在故宫博物院内的文物，已如前面介绍过的那样，一部分集中在延禧宫、北五所、保和殿西庑、寿康宫四个文物专库中，其余的大部分分贮于院内各处，混杂堆放，玉石不分，并且经常遭受虫蛀鼠咬、雨霉污渍，账物不符，底数不清。为了办好故宫博物院，人民政府决定将抗日战争之前的南迁文物运回故宫。这批南迁文物，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国民党政府将其中最精华的 2972 箱运往台湾台北市和仍然保存在南京朝天宫文物库房的 2176 箱以外，其余 1 万多箱陆续运回北京故宫。那时故宫到底有多少东西呢，按老账估算大约有 130 多万件，有的人估计约有 180 多万件。实际上以后经过整理得出的数字是 250 多

万件。

一九五一年六月，故宫博物院成立了保管部，逐步开始了对藏品的清查、整理工作。一九五四年在吴仲超院长主持下，故宫拟定推出了“整理历史积压库存物品方案”，一九六一年五月又提出了“以科学整理工作为中心的规定”，掀起了藏品整理和进行科学保护管理工作的高潮，大致到一九六五年始告一段落。这一阶段的工作分为两个步骤进行，即从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九年为第一个小高潮，主要工作可以归纳为两项内容，就是清理历史积压物品和建立文物专库；第二个小高潮为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五年，主要内容是对藏品进行进一步鉴别、划级，建立文物总登记账，核实各文物专库的文物分类登记账，并建立一级藏品档案。

第一个小高潮是这样进行的：整理工作先从两头开始，将珍贵的文物首先集中到指定的较好的库房内进行整理登记，将其余的大量物品集中到另外的库房内进行审查处理，该归入文物的归入文物之中，该归入非文物的归入非文物之中；同时对文物进行分类集中，设立专库度藏。具体做法是：

第一 从一九五四年四月起对新收入院的藏品建立总登记账册，冠以“新”字号。对全院 106.9 万多件文物进行原始登记，建立专库，分类排架。

第二 对 70 余万件又 30 万公斤非文物进行了反复的审查，认定为文物的即作为文物收藏，对入藏的文物进行普遍的鉴定，从非文物和一般文物中发现了大批珍贵文物。另外，还从紫禁城内的一些屋顶到地板下，从隔墙到柜橱后、从睡炕到枕头里，搜寻出不少珍贵文物，从无账、缺号的物品和次品中也发现了不少珍贵文物，

总计发现文物 2876 件，其中划为一级品的达 500 多件，如极为珍贵的战国龟鱼蟠璃纹方盘、宋龙泉窑青釉弦纹炉、宋哥窑葵瓣洗、唐卢楞伽六尊者像册、宋赵佶听琴图、明朱瞻基山水人物大折扇等等就是这一阶段被发现的，被喻为“实在是一次地上的考古发掘工作”。

第三，对审查确认为非文物的物品，造具处理清册，及时报文化部审核批准后，分批地进行了处理。这样卸掉了累赘和包袱，使文物得到了更为妥善的保护。

经过这些工作以后，使库房情况有了很大改变，从原来的 138 处约 5.2 万平方米，减少为 45 处约 1.7 万平方米，并使文物度藏条件得到较大的改善。

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五年“以科学整理为中心”的第二个小高潮，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1. 从一九六一年四月起，组织院内专家和专业工作者，根据讨论拟定的划分级别标准，把文物划分为三级，由专家对一级文物作出准确扼要的鉴定意见后，再由专业工作者进行详细编目，并进而编制出一级藏品档案。

2. 在文物划分级别工作基本完成之后，随即开展了“三核对”工作，即各类文物专库工作人员从文物分类账、度藏卡片、文物实物三个方面一件一件地进行核查，对查出的错漏，一一查明原因后进行更正，特别是划一了计件方法，纠正了过去因计件过于笼统而出现的偏差，杜绝了可能出现的漏洞，做到账、卡、实物相符合。

3. 以进行过“三核对”以后的库房分类账册为蓝本，清抄誊写出一份总登记账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故宫旧藏文物冠以“故”字顺序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故宫新收进的文物冠以“新”字顺序号。这冠以“故”和“新”两种顺序号的账册合起来就成为故

宫博物院的藏品总登记账，成为国家文化财产账。同时建立文物的借出、借入、销号、寄存等辅助账册，统由专司账目管理的文物总保管组管理，以做到账、物分管，从而杜绝了各种漏洞。

4.以藏品总登记账上所冠文物登记号，回注到各库房分类账和文物库藏卡片上去，使分类账、库藏卡与总登记账上的文物登记号对应起来，一致起来，以便于核查。至此，以总登记账为主的账册体系始告最终完成。

5.将总登记账上的文物登记号冠在每一件文物藏品上，有的直接写在藏品的特定部位上，有的写好标签拴挂在藏品上。这项工作实际进行到七十年代中期才算基本完成。

经过以上这许多项、许多年的工作，故宫博物院的藏品已基本上全部整理登记完毕，对藏品的管理基本上达到了不错不漏、有条有理、记载清楚、统计确切、易于查对、便于取用。特别是在长期的工作、长期的保管实践中，摸索、积累、总结、拟定了一系列科学的、切合中国国情和中国博物馆客观实际的规章制度，如“藏品库房安全管理制度”、“文物安全操作规程”、“文物照像制度”、“文物修复制度”、“藏品登记制度”、“文物分类大纲”、“文物计件规定”、“工作人员出入库制度”、“藏品出入库制度”、“文物征集、拨出工作条例”、“各类藏品编目细则”等等，并切实地加以贯彻执行，因而使藏品保管工作能搞得更加出色。只要看一看它的各种账册，马上就可以清楚，故宫博物院八十年代末共有藏品近100万件，其中，新中国建立以来新收进的藏品达21万多件。院属修复厂修复、复制文物1.1万多件。

中国革命博物馆藏品的保管工作

中国革命博物馆是新中国建立后设立的专门性革命历史博物馆。一九五〇年成立筹备处，设立了业务、行政两个组，藏品管理工作附属于业务组内。一九五三年正式设立了保管部，专司藏品的保护管理工作，经历过曲折的发展过程，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六年上半年）

这一阶段对藏品的管理原则是：按年度立账编号、按文物性质分类排架、按分类顺序号存放。

根据这种管理原则，在文物分类方面将文物分为：文献、实物、书、报、刊、资料、重复文物、存查文物、反革命文件、反革命实物、美术作品、党内文件、党内期刊、党内报纸、党内书籍、礼品等 17 种类别。

在账务管理方面，建立了按入馆文物批次登记的总账和按文物类别登记的 17 种分类账，并建立了征集、拨出、销毁凭证和统计报表。

在文物提取利用方面，建立了两套库藏卡和供陈列研究索查文物用的时期专题卡、人物索引卡。

第二阶段（一九五六年下半年至一九五八年）

鉴于按年度立账，账册过多；按文物性质分类，不能进行科学保养，因此决定改为以文物制作质料的自然属性分类立账和编号、库藏。但为了照顾按账册登记号顺序排架的方法，又将文物的功用和文物的大小同列为大类。根据这些原则，对库藏文物进行了改账、改号工作。

第三阶段（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七月）

这一时期，天安门东侧新馆落成，为了搞好陈列，大

量借调的文物入馆；陈列修改也很频繁，提取文物的任务相当繁重。为此，保管部成立了两个临时工作组，分别接管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文物，并经三次开架让陈列研究人员入库选择文物。这一时期，保管部进行的主要工作是：

（一）继续进行第二阶段已开始了的改账、改号、改卡工作；

（二）将全部文物由老馆库房搬到新馆库房中去；

（三）对文物进行划分级别的试点工作；

（四）对木器类文物进行按时期排架的试验；

（五）对调拨进馆的文物的临时账号，改为正式的库藏账号。

此外，还建立了有关工作职责、文物提取批准手续、安全保护等方面的一些规章制度。

第四阶段（一九六一年八月以后）

中国革命博物馆的陈列是一九六一年七月正式对群众开放的，至此，陈列修改的任务暂告一个段落，保管部的工作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时候，保管部才有可能真正安下心来探讨和总结科学的工作规律，从队伍、组织、制度、方法等方面加强建设，逐步地形成了一整套科学管理的办法和制度。采取的主要办法是：

（一）根据藏品管理工作各个环节业务特点的不同，建立登记、编目、库务3个业务组，分担不同的工作任务。

登记组：负责藏品的接收、总账登记、统计、档案管理、调拨、借入、借出、注销等手续的办理工作，偏重于行政管理。

编目组：负责文物鉴定、卡片著录、目录编排等工作，

偏重于社会科学和应用科学方面的业务范围。

库务组：负责藏品的保管、保养工作，偏重于应用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业务范围。

(二)建立健全账务管理制度。设立了藏品总登记账和内拨、外拨、处理、借出、借入等六类账册。同时还建立了“出入馆文物登记册”，一方面掌握文物出入动态，便于统计；一方面记载初步鉴选的结果，以便与各类账册挂钩。

(三)制定正确、合理、实用的目录体系，以便从不同角度满足有关研究人员索查文物的不同需要。他们搞了两套基本卡片和三套索引卡片。两套基本卡为：分类卡和时期、专题片；三套索引卡为：人物索引卡、物主索引卡、地区索引卡。

(四)对分类排架的方法进行修订和改革，改变按藏品登记顺序号排架的方法为按藏品质地和器形存放的方法。

(五)在总结工作的基础上，修订原有的各项规章制度，汇编为“保管工作手册”，发给工作人员作为开展工作的准绳。

中国革命博物馆保管部在工作实践中，六十年代时就总结、归纳出几点工作经验和体会，主要有：

第一，建立入馆文物的初步鉴选程序，严格地把文物入馆和文物入藏划分为两个阶段，是保证库藏质量，使有限的保管干部、保管设备与长期的、源源不断的藏品征集、整理工作能够相适应的重要条件。

由于征集人员的水平和征集角度不同；由于需要搜集的革命文物多数尚未经历时间的沉淀；更由于有不少文物资料往往直接来自烈士亲属、革命老人、临时举办的

展览会等等，往往不容选择，而是一锅端。因此入馆文物玉石不分、鱼龙混杂的现象是难免的。过去他们对入馆的文物资料，不论其价值、作用如何，一律作为藏品，按正规的、严谨的入藏手续全部入藏。天长日久，玉石不分的文物资料积累的就相当多，因为人力有限，登账、编目、分类、排架都赶不上，同时也挤占了文物库房的大量度藏空间，不利于对真正的文物进行妥善的管理和养护，结果就显得招架无力，十分被动。后来对入馆的文物进行初步鉴选，将真正的文物挑选出来加以妥善的管理和养护，这样，就能够把有限的人力使用在刀刃上。

第二，必须建立健全藏品总账登记制度。

藏品总登记账是博物馆进行藏品管理工作的基础，是博物馆对国家体现负责管理文化财产的职责义务的具体表现。因此，文物入藏时，必须首先在总账上逐件详细地按规定要求进行登记编号。藏品总账一般应该是经年积累形成的国家文化财产账，并随着文物世世代代地传下去。

第三，藏品统一按其制作质料的自然属性分类排架，是博物馆保养工作的一项基本原则，不能因藏品的政治、功用等社会条件而更改。

该馆过去对藏品曾按政治因素分成革命和反革命两大体系，分别编号登账。革命文物又分为文献、实物两大类。文献大类又按历史时期分为8个小类，实物大类又按质地、功用、大小分为20个小类。

反革命文物则按入库顺序杂乱堆放。这样，分类层次繁多，原则不一，给文物入藏、提取、保养等工作环节，带来不必要的工作量和困难。

此外，革命博物馆的文物来自历史生活、现实生活的

各个方面，质地复杂、大小不一、形状多样。采用按质料、功用、大小同列为大类，按顺序号来排架的方法，分类项目再细再详，也很难适应千差万别的客观实际。

但后来采用了按文物制作质料的自然属性来分类排架，上面所谈的那些弊端，基本上都被克服了。

第四，文物登记项目的内容，必须从原则上作出统一的规定，否则五花八门，繁简不一，就会影响账卡作为管理藏品的科学工具的作用。

如文物名称，过去有的只笼统地写了通称“传单”、“手枪”、“旗帜”，不能一目了然地看出它具有什么价值。或者只摘了“大家都来当红军”这个内容，未注明通称，不知是标语，还是小册子，因而都不能满足研究人员索查文物的起码要求。又如计量标准不一，同样文物譬如1函书籍，有的写作1件，有的写作×本×件，有的又写作×件。造成统计、盘库工作的困难。

后来对文物定名作出了规定，以后又形成了《文物编目条例（草案）》，对编目工作的要求，以条例的形式规定下来，统一性、规范性、准确性、科学性都大大地提高了。以文物定名来说，实物名称就包括下列各项：地区（指物品的产生地点或使用地点）、物主（指物品的制造者或使用者）、事件（指与物品有关的历史事件）、用途（指物品在革命斗争中的实际用途、作用）、通称（指物品的一般通称）。

以文字材料来说，拟定名称包括下列各项：作者（指文字材料的作者和成文单位）、事件（指与文字材料有关的事件）、原标题或内容摘要（原标题如不能概括或反映文物内容的或无原标题的，可摘其内容另行定名）、通名（指文字材料的形式）。

在编目时运用这种规范化的定名标准,对文物所起的名称就更准确、更科学、更能够反映文物的本质。作为一个使用者、研究者,如果检索出这样一张编目卡片,加上卡片的其他记述内容就会产生明晰的印象,对解决他的检索目的,就会更适用、更便利。

第五,博物馆的藏品管理工作,是由登记、编目、保管、提用等环节组成的。它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既相互制约,又相互配合,是一些矛盾的统一体。因此,制定各个环节的基本规章制度时,必须统筹考虑,使之形成一个统一、完整的科学体系。

比如中国革命博物馆,在文物出入馆和出入库方面,都有一定的把关办法,唯独对出入陈列室这一环节,曾有一段时间比较疏忽,不少文物未经登记和编目,就“升堂入室”,给藏品管理这一工作环节带来一定的混乱。又如原先没有或者没有健全文物档案的立卷归档制度,为了解决原始记录散放各处查找不便,容易失落等问题,就把它一一抄录在征集凭证和账册上,结果既增加了工作量,又使得凭证和账册不伦不类,面目全非了。

第六,保管工作的技术性、持续性强,业务范围广,既包括社会科学方面的历史学、考古学、器物学等方面的专门知识,自然科学方面的生物学、物理学、化学等方面的专门知识,又包括应用科学方面的统计学、目录学、档案管理学、库房管理学等方面的专门知识,所以,专业分工必须符合科学要求,干部队伍必须相对稳定,工作程序、步骤必须合理恰当。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专业干部能在固定的工作岗位上,专一地研究一、二项基本业务,并且在工作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增长有关专业技能、有关专业知识,发挥自觉和主动精神,一丝不苟、

持之以恒地按各项规章制度办事，有条不紊地对藏品进行科学的管理。

南京博物院藏品的保管工作

南京博物院的前身是根据蔡元培先生倡议，由中华民国政府设立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新中国成立以后改称南京博物院。该院历史比较长，藏品比较丰富，特别是一九五九年原设立于苏州的江苏省博物馆迁到南京，并入该院，藏品数量更加增多，约有 30 多万件。由于原来两个单位的保管方法、藏品分类、登记账册各有特点，不尽相同，加之新征集的藏品不断涌入，因而保管工作任务很繁重。

他们是怎样加强藏品保管工作的呢？

（一）整理工作从科学鉴定和健全“总登记账”制度这两个方面入手。

抓紧科学鉴定的目的是为了去伪存真，保证藏品的质量。具体的做法是从院内院外两个方面着手：院内是建立文物鉴定委员会，按期进行鉴定；院外是借助兄弟馆和社会上的专家来帮助鉴定文物。

鉴定委员会由院内专家和领导 13 位同志组成，分成书画、碑帖版本、陶瓷、铜器和工艺美术品 5 个组，其任务是，分别对有关文物审定真伪、确定入藏、讨论品名、时代、价值和价格。鉴定意见根据具体情况，分别载入记录本和鉴定卡，作为保管部的基本资料。

借助兄弟单位和社会专家，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利用专家来院工作或参观之际，请其协助鉴定有关文物，如商承祚先生帮助鉴定部分铜器、胡厚宣先生帮助鉴定

部分甲骨；另一种是有计划地邀请院外专家来院进行鉴定，如一九六一年十月，邀请张珩、韩慎先、谢稚柳 3 位专家来院，历时两个月，帮助鉴定古字画 38405 件，从中选出精品 87 件，较精品 1112 件。通过这些鉴定工作，不仅保证藏品质量，加速藏品登记工作，加强对文物的管理，而且还可以发挥藏品的作用，减少积压。如书画经过了 3 位专家的鉴定后，除了决定分级入藏外，对余下的部分，按保留资料、下拨、利用、出口、剔除等不同情况，分别登记造册和进行处理。

把好藏品总登记这一关口，意义也十分重要。从文物一进馆就完全按照科学的方法处理，即依照鉴定、登记、清洁、修整、照相、制拓片、消毒、入库这 8 个程序进行，有效地保证了新藏品的质量，不仅使对新藏品的入藏程序全部规范化，而且为逐步整理登记旧藏创造了条件，提供了保证。这样做的结果，使新收的文物件件经过鉴定，件件有登记卡，件件经过消毒，而且登记卡上都贴上了文物现状照片，也能及时点交给库房保管员，达到了随收、随登、随交的目的。

（二）实现专库、专人、专业。

南京博物院设立了两种库房，将院本部大院之内的库房当作主要藏品的保藏库，将远离院本部的朝天宫分库作为储用藏品的保藏库。对于前者，该院当作特种形式的陈列室和科学研究室看待的，它既能达到藏品的分类度藏，又能做到系统开架便于研究。因此，将其划分为考古发掘品库、书画库、瓷器库、工艺美术品库、革命文物库、碑帖室等专门库房，并明确专人管理。专库保管员，既是这类藏品的保管员，又是这类藏品的编目员和科学研究工作者，而文物鉴定委员会中的有关专门小

组就成为辅导保管员学习业务的导师。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一专库，既是保管员的工作室，也是研究室和学习室。管什么就学什么、研究什么。实践证明，这个办法是提高整理工作质量、提高干部业务水平的好方法。

对藏品排架方面，该院注意到排架工作要使藏品具有系统性，并为开展科学研究提供方便，为保管员学习专业知识创造条件。如考古发掘品库，上架的原则是：先时代、次地区（墓葬、遗址）、再次质料、更次器形。瓷器库上架的原则是先时代、次窑别、再次器形、更次色彩。这样排方位的好处，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是便于看到发展，二是便于看到每一历史时期的特点及相互关系，三是便于保管和提取。

至于储用藏品的保藏库，则放置一些复份文物、文物资料，以及尚未经过系统整理的或是一时尚用不着的其他文物，作为院里的备用藏品。当然，备用藏品并不是无用之品，在主要藏品的整理工作理出了一个大的脉络以后，就要在一边继续进行主要藏品保护管理的同时，一边抽出适当的力量去加强备用藏品的整理、开发和利用的工作，以适应博物馆工作发展的需要。

（三）加强藏品保护科学技术研究，运用传统的和现代的保护技术、方法，加强对藏品的保护。

为了加强这方面的工作，该院设立了技术部，建立了碳 14 试验室、器物保护试验室；开办了文物修复厂，设置了装裱车间，器物修复车间和工组。努力运用传统的和现代的技术成果，积极加强对文物的科学保护工作，并进行竹木漆器脱水，金属文物防锈，化学药剂防虫、防湿，丝织品、纸张加固等等科学试验，取得了较好的实效，有些成果还居于全国的前列，如丝网膜加固纸张

的试验，就开创了纸质文物保护的一条新路子。

（四）加强库房建设，保证库房绝对安全。

该院根据建筑本身的特点，用主体建筑底层半地下室建筑物作为库房，一九七九年以来，花了大力气维修和改造库房，地面和墙壁加设防潮层，四壁不开窗户，也不设通风口，并将毗邻库房的其他部门的办公室、工作室迁开，进而又将通向库房的各条通道，都安装上铁门，予以关闭，特殊情况时才打开，平常只开启一条通道，作为保管部的日常出入口，从而使库房与外界相对隔离，形成一个封闭式的文物库房区。这样做不仅仅在于安全和保密，更重要的是文物库房集中，便于全面控制，有利于采取各项集中管理措施，使文物库房成为相对独立的体系，达到保管部工作的系列化。如库房区电路按照文物库房特定的要求敷设，使每一个库房都能自行控制电源，库房区走廊的照明，也由独立的线路控制，再加以装设总闸，也能进行集中控制。又比如，由于加设了防潮层，又不开窗，也无其他部门进出，梅雨季节就便于控制进库次数，加之采用吸潮机去湿，使温湿度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相差不是过大，从而为保护藏品创造了一个比较好的自然环境。

（五）建立健全各种规章制度，切实保障藏品的安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该院共制定过 76 种规章制度，成为工作行动的规范。可以说各个业务部门和后勤部门，各种业务方面都订出了制度。让每一个部门、每一位工作人员明确自己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应该怎样去做，通过各种规章制度，明确了各个部门的责任和权利，并使各个部门的工作相互沟通、相互衔接起来，使每一位工作人员办事都做到有章可循。

上海博物馆藏品的保管工作

上海博物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成立的一个艺术博物馆,藏品门类全、数量多,现有藏品约 55 万件,是中国仅次于故宫的一个大的艺术博物馆。

五六十年代,他们的藏品保护管理工作是这样进行的:

(一) 对馆藏文物进行清理分级。

进入博物馆的物品,一般说来应该是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和标本,但是在实际工作中,特别在接管和捐献的物品中,往往杂有一些文物价值很小,甚至没有什么文物价值的东西。上海博物馆对于进馆的物品,首先加以初步的清理区分:凡符合博物馆性质、任务或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编入文物,其余的一律编为参考品,其中的图书资料则移送图书资料室。

在文物中,有极珍贵的、比较珍贵的和只具有一般保存价值的。前两个部分被称为“选品”,重点加以保管,以便于利用和加强保管。又将“选品”中最珍贵的部分挑选出来,定为一级品,格外加以特殊的保护。只有一般保存价值的被称为“参考品”。参考品中,有可供本馆研究和学习用的材料,有可供调拨的文物,亦有非文物。

对非文物的处理,最重要的一环是鉴定,如果鉴定有疏忽、错误,不仅会造成文物损失,还会造成不良的政治影响。所以除组织馆内专业人员反复鉴定外,还建立专门组织吸收外单位和社会上有影响的人参加,进行复鉴,并采取一致通过的办法,只要有一人不同意,即不作为非文物,以示慎重。

经过这些工作以后，达到了以下效果：

1.对博物馆藏品的情况有了更清楚的了解，使基本藏品精炼，避免了庞杂。

2.使各级文物得到适当的利用，并使呆滞在该馆的文物和非文物也充分发挥作用。这一时期，他们曾调拨给20个兄弟单位各类文物1万余件，也曾对挑选出的非文物进行过集中的处理。

3.使保管人员能以更多的力量做好基本藏品的保护管理工作，对基本藏品中最精华的“一级藏品”能做到更精心的养护。

（二）建立一套保管制度，确立正常的工作秩序。

严密的保管制度是做好文物保护管理工作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之一。该馆不断地补充、修改保管制度，使它逐步臻于完善，既求严密，又求简单扼要，既要有利于文物的保护管理，又要手续简便，有利于各项业务工作的顺利进行。

1.在账、卡、物方面。

该馆有文物收入清单、文物总登记账、参考品总登记账；藏品编目登记卡、一级藏品编目登记卡、方位卡、藏品书画分类卡；文物提取及归还单、修复单、拨交单等等。其中文物收入清单既是收入凭证也是入库凭证，装订成册以后又代替了收入簿。方位卡按分类顺序排列，又成为文物的分类账。

具体的使用方法是：文物入馆以后，先根据原始的单据编制收入清单，然后填制各种卡片，再登入总账。

必要的账、卡、单据是不可缺少的，它是有效的管理文物的重要手段之一，否则就会产生漏洞，不能保证文物的安全。

2.在藏品编目方面。

编目卡的项目要求明确,内容力求充实,定名方法统一。搞出各类文物的“定名凡例”,以求得一致,计件要准确,在计量标准方面也作出统一规定。对各项栏目,诸如款识、形制特征、题跋者、收传印记及著录书目等,尽可能地加以记述。

3.在库房排架管理方面。

将文物按质地和使用情况,分为书画、织绣、竹木器、漆器、铜器、陶器、瓷器、珐琅器、玉器、石器、刻石……等等19类,根据文物的保管要求、数量多少和库房条件——温度、湿度、光线、通风及面积大小等情况,分别设立单独库房或联合库房。如系联合库房,也设不同专柜存放不同类别的文物。这一方面是为了管理和取用的方便,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护,如瓷器的囊匣容易生虫,如与书画、织绣品放在一起,反而会威胁它们的安全。

对文物的排架,是根据提用经验和每类文物的具体情况分别确定出来的。如书法和绘画就以时代、画派(明四家、四王吴恽、四高僧、扬州八家、金陵八家等等)作者,分轴卷册来存放;瓷器以时代、窑口、明以后再分釉彩来存放;铜器先分战国以前和汉以后两大部分,然后各按器形再分;铜镜集中分朝代存放;特大件文物另行集中存放等等。

博物馆的文物保管工作,大体可以分为文物征集编目、藏品库房管理、文物保护修复以及陈列室展品的安全这样四个方面。上海博物馆建馆初期,这四个方面的工作统归保管部管理,后来六十年代把文物修复从保管部分离出来,设立了文物修复工厂和科学实验室;七十年代又把征集编目从保管部划分出来,归陈列研究部领

导；八十年代又设立了电脑室和文物修复技术研究室，又将陈列室保管工作承包给市保安服务公司，划归保卫科领导。至此，文物保管工作已由保管部、文物修复部、文物保护技术实验室、电脑室、各学科部门以及保卫科分别承担。其进行调整的基本思想是：文物的编目工作属于学术研究，文物的保管属于管理和技术工作，两者在性质上应予区分。把鉴定断代和分类编目分归各学科部负责，而保管部主要是单纯的管理和保护。修复则分别由科学实验室和文物修复部负责，文物的安全防范工作则由保卫部门负责。这样分工明确，专司其职，有利于保管工作的提高。

七十年代末期以来，上海博物馆主要抓了几项工作：

（一）加强与文物收藏家的联系，大力开展文物征集工作。

上海是文物收藏家云集的地方，有不少著名的书画、陶瓷、青铜器、钱币等收藏家。上海博物馆自建馆以来，一直重视文物征集工作，主动地、积极地联系那些文物收藏家，关心他们，团结他们，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同时也对他们进行工作，动员他们捐献或出售文物。从政策上坚持两条：一是决不强索，二是对捐献者发给奖金或进行奖励，对出售者秉公作价，因此取得了许多收藏家的支持。从馆内来讲，文物收购要经过各学科部门和文物收购鉴定委员会两个层次的鉴定，才能生效。与此同时积极向主管部门和当地有关部门积极争取经费，以保证这项经常性工作的顺利开展。据统计，从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五年共征集文物 7.7 万多件，其中有 47 人捐献文物 4 万余件，占全部征集数的 64%。其中有许多是不可多得的珍品，如刘靖

基捐献的宋吴琚行书五段卷、元金笄山林曳杖图轴、元倪瓒六君子图轴都是精品佳作。邱辉捐献的近百件西周青铜器，也是极为重要的精品。徐景淑捐献的商鞅戟和龚旭仁出让的商鞅量是传世仅存的两件商鞅器。孙伯渊捐献的宋拓张长史郎官石记是海内孤本……等等。为此上海博物馆共发给捐献奖金 35 万元。收购的 3 万多件文物中，书画就占 1.8 万多件，花去收购费用 150 多万元，这些收购奖励费用均由地方财政经费支付。

(二)文物编目与库房管理相对独立，提高了鉴定断代和分类编目的质量。

八十年代末，上海博物馆的保管部的业务，只是单纯的库房文物的管理和保护，编目工作由各学科部门在鉴定和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这样做是有好处的：第一，由于各学科的编目人员参加文物收购鉴定委员会的工作，有机会了解文物进馆、鉴定、评价情况，各学科部门还存有有关藏品的资料，包括卡片、照片、拓片等可以利用，并能较快地掌握本专业的信息，因而有利于编目质量的提高。第二，对于各个学科部门来讲，由于每件文物都经过自己的编目，因此对本专业的藏品很熟悉，在筹备陈列展览时，就能很及时地将新收的文物补充进去，陈列出来；在编辑图录时，能准确地选择藏品资料，因此也就带动了其他业务工作，提高工作效率。

(三)对文物保护工作，贯彻了防治结合的方针。

文物受损的原因无非是两条：一是自然损坏，二是人为损伤。对于人为损伤，可以用加强责任心、改进操作技术去解决；对于自然损伤，就要从防和治这样两方面去解决，以防为主、防治结合。

上海博物馆设立文物保护技术研究室，侧重在防，重

点是研究文物损害的原因及其科学保护的措施，研究文物防潮、防干、防霉、防虫、防光、防锈、防污染等安全措施。设立文物修复部和文物修复技术研究室侧重在治，重点是总结传统修复、装裱方法，提高文物修复和装裱技术。

这几个部门都采取了坚持以现代科学技术和传统技术、工艺相结合，坚持文物保护科研人员同有实践修复经验的老师傅相结合，同外单位广泛开展技术协作的方法，把新的科学技术、新的修复技艺应用到文物保护工作上，并且取得了很多成果。如在紫外线对文物的损害，青铜器粉状锈的处理，明墓出土粘连在一起的说唱本的揭开、修复，热释光测定陶瓷器年代，以及饱水出土漆木器的冷冻干燥、宋代漆器内胎制作工艺、黄柏木杀虫有效成分提取、中药气相防霉剂的运用、软 X 光射线对书画文物的无损检测等等研究项目，都取得了成功，不仅仅是通过了技术鉴定，而且已经推广、运用到文物保护工作的实践中去。

（四）增添安全防范设备，加强了安全管理力量。

为了加强文物库房、陈列室的安全保卫工作，上海博物馆采取了增添防范设备和加强人员并重，以充实看管力量为主的办法。对陈列室的保管工作，承包给了市保安服务公司，每天由他们派 20 名身着制服、带报话机和警棍的安全保卫人员在进门口和陈列室值班巡逻。这样，不但加强了陈列室的安全保卫力量，也使群众工作部的工作人员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宣传教育工作中去。

该馆还装设了闭路电视监视器、声控监听器、无线遥控报警器和自鸣防盗报警器等安全保卫设备，形成了多层次的立体防范系统。这些防盗报警设备装设后，发挥

了很好的作用。如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三日下午，监控人员在值班室荧光屏上看到一个犯罪分子正在作案，立即赶往现场，只用一分钟就抓获了盗窃分子。又如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一日晚，控制室接到报警讯号，立即组织人员到报警范围内搜查，当场抓获正在作案的犯罪分子。

中国博物馆的收藏

中央直属博物馆的收藏

一、国家文物局直属的三大馆

(一)故宫博物院是中国规模最大、藏品最丰富的一个国家级博物馆。它以明清两代皇宫为院址，以皇宫旧藏为基础，共有藏品近百万件，约占全国文化系统博物馆藏品总量的八分之一，占全国首位。一级品 8000 余件，亦占全国首位。藏品分历代艺术品和宫廷文物两大类：历代艺术品包括绘画、法书、铭刻、雕塑，金属器、陶瓷、织绣、其他工艺 8 大类别 36 细项；宫廷文物包括珍宝、典制文物、清代图像、宫殿铺陈、服装、生活用具、宗教文物 7 个细项。

历代艺术品中，以绘画、法书、瓷器最为丰富，精品亦多。晋唐宋元的传世书画，除台湾故宫博物院外，大部分精品都收藏于故宫。书画方面有宋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真迹、唐代韩《五牛图》、西晋陆机《平复帖》、东晋王《伯远帖》、唐摹《神龙兰亭叙》等。陶瓷方面

有宋元明清的官窑瓷器，各窑址都有精品，尤以元代青花、明代彩瓷、清代康乾时期官窑瓷器最富特色。其他类别中，亦有很多藏品在全国首屈一指。如铭刻中的石鼓文，为先秦遗物，系存世至今最早的刻石文字；朱碧山银槎，为久享盛名的明代工艺精品；清代织绣品、明清珐琅器和文房四宝、明代景泰蓝、清代广东贡品等，都以故宫收藏为精为富。

宫廷文物主要指明清两代皇帝、后妃的生活用具及皇朝典章制度等文物，这是最体现故宫特色的一大批藏品，更为其他博物馆所匮乏。其中典制文物类的卤簿仪仗、乐器、经册、武备，服装类的冠服、佩饰，生活用具类的医药、饮食起居、妆奁、玩具、钟表、灯笼等，对研究明清宫廷史和典章制度都具有重要历史价值。

(二)中国历史博物馆是中国通史性质的国家级历史博物馆。它收藏自一百七十万年前原始社会至一八四一年鸦片战争前的 30 余万件历史文物，包括考古发掘文物、传世文物、文献档案等，能较系统地反映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发展的概貌，范围包括政治、经济、科技、思想、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每个历史阶段，都收藏有阐明历史或反映时代发展水平的文物，如远古人类始祖元谋人、兰田人的石器工具，旧石器时代马坝人、丁村人、长阳人的石器和陶器，新石器时代的彩陶、黑陶、白陶及生产工具，商代的青铜重器司母戊方鼎，西周的虢季子白盘，春秋时期的越王勾践剑，以及封建社会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各朝各代体现时代特色的文物。在品类方面，钱币和科技实物的藏品比较系统、典型。

(三)中国革命博物馆是中国革命通史性质的国家级

革命博物馆。它收藏近、现代的革命文物 12 万余件，包括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从事革命活动的照片、实物，反映各个革命时期重大事件的文献、报刊、实物等，借以展示近、现代的革命发展史。其中以表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藏品最为丰富和系统。

二、其他系统办的国家级博物馆

(一)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办，属国家级的表现中国革命军事史的专门性博物馆。它主要收藏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和人民解放军军史方面的文物资料，以及中国兵器发展史的文物资料，计有实物、照片、文献等藏品 13 万多件。其中以反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文物最为丰富、全面。

(二) 地质博物馆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国家级的地质科学博物馆，属中央地质部和中国地质科学院领导。它收藏国内外各类地质标本近 10 万件，包括各类珍贵矿物、岩石、古生物标本和化石。许多藏品，在阐明矿床资源、地球形成、地层结构、古生物群区域特征、矿物性质、矿床地质特色等自然科学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科学价值。其中如巨型山东龙为世上少数完整恐龙化石之一。

综合类博物馆的收藏

一、省级综合性博物馆

中国大部分省、市、自治区级博物馆，都属于包含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方面内容的综合性博物馆，并形成

鲜明的地方特色，故亦称地志博物馆。山东、浙江、安徽、福建、河北、山西、黑龙江、内蒙古自治区、甘肃、吉林、青海、云南、贵州、湖北、江西等省级博物馆，都可归入此类。现扼要介绍其中较著名并藏品较富有特色的博物馆。

（一）湖北省博物馆藏文物 20 余万件，其中一级藏品 300 余件。藏品来源于征集和考古发掘，以历史文物中的古代艺术品最为精美。

馆藏历史文物中，较重要的有原始社会晚期屈家岭文化遗址出土的蛋壳彩陶、彩陶纺轮、磨光石器、陶器和骨器；黄陂盘龙城商代城址和墓葬出土的大铜鼎、大铜钺、大玉戈等礼器；江陵楚都、当阳楚城内出土的青铜礼器、彩绘石编磬、彩色漆木器、竹器、陶器和竹书；楚郢都出土的越王勾践青铜剑；大冶铜绿山古矿冶遗址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型铜斧等生产工具和竹木藤器；隋州市郊曾侯乙大型墓葬出土的战国时期成套乐器、青铜礼器、兵器、金器、玉器、漆木竹器和竹筒；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漆器等。其中曾侯乙墓出土的 7000 多件文物尤其是成套乐器，轰动中外，多次赴国内外展出，乐器演奏录音及复制品畅销海外，文艺界也争相编排相配的舞剧。

革命文物方面，较珍贵的有中国共产党创始者董必武、陈潭秋等同志的遗物；党在湖北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物、文献和照片；黄州出土的太平天国大铁炮；武昌起义一些重要领导人的遗墨、十八星旗、军政府的文告和大量文献、照片等。

（二）浙江省博物馆收藏历史文物、革命文物共 5 万余件，其中以历史类的文化艺术藏品著称。

历代艺术品中，富有特色的有：原始社会时期河姆渡文化、马家滨文化、良渚文化出土的各种文物。如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骨耜、稻谷、纺织工具、漆碗、双鸟纹牙雕、彩陶等，都十分罕见；马家滨文化的罗家角遗址出土刻花白陶，系首次发现；良渚文化中的丝麻织品和花生、芝麻等作物种子，为中国最早存物。商周时期青铜器，既具明显的地方风格，又带有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如商饗鬯纹分裆鼎、西周云雷纹铙和簋、春秋时期的越王剑、越王石矛、越王州勾剑、吴配儿钩以及竞渡纹靴形钺等，都是弥足珍贵的地区性文物。而竞渡纹靴形钺的纹饰，又与广西、云南等地的某些铜鼓花纹很接近。青瓷出土数量众多，自东汉以迄明清，几乎各个历史时期都有很多还带有纪年，如唐末五代余姚窑金银镶口的青釉瓷器，过去仅见记载，从未见过实物，从五代吴越国王和王室成员墓葬出土的瓷器中，得到了不少这类青瓷，从而揭开了青瓷史上的谜底。浙江各地古塔中发见的文物，极为珍贵。如龙泉古塔中的唐代净土变图，五代雷峰塔经卷、北宋慧光塔明道二年刻经、大中祥符年间写经、庆历年间堆油泥塑舍利函和双面刺绣等，都为研究唐宋时期文化艺术提供了重要资料。书画藏品中，元代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残卷、朱因的白描纸本《劫钵图》卷，均属稀见，而明清书画数量更多，仅近代黄宾虹的作品就达 1000 多件。

革命文物中，以太平天国时期藏品最为丰富，计有 125 种 1352 件。其中李大明、柴大妹的合挥等，是研究太平天国婚姻制度的珍贵史料；侍王李世贤在浙江太平和浦江颁发的两件谕旨，为太平天国后期重要文献。其他如辛亥革命时期秋瑾的《精卫石》原稿 1 至 5 回，周

恩来一九三九年为东源小学的题词“中华民族新希望”和为曹天凤手录沈复生诗联一副，也都具有重要历史价值。

(三)甘肃省博物馆藏有历史、革命、民族、自然等方面的文物、资料和标本约9万件，其中历史文物占三分之二，彩陶、汉简和佛教艺术品，是最能体现该馆特点的文物。

彩陶藏品包括的文化类型之多和纹饰之精美是罕见的。文化类型计有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仰韶、马家窑文化和金石并用时代的齐家、四坝、辛店、沙井等文化。纹饰精美的代表作品有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人头形器口彩陶瓶、鲵鱼纹陶瓶、马家窑类型的尖底旋纹彩陶瓶，半山、马厂类型的若干彩陶壶、瓮等。

汉简藏品包括甘肃省几次出土的重要竹简。如一九五九年武威发现的仪礼简和王杖简，一九七二年武威出土的医方药简，以及总数达2万枚以上的居延，敦煌木简。

佛教艺术方面，有十六国至隋唐时期的石造像碑、塔，200余卷敦煌写本佛经等。

另外，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汉代铜车马，尤其是三足腾空的马踏飞燕，以巧妙的艺术构思和精微科学的力学结构，受到国内外的重视和赞赏。嘉峪关魏晋墓出土的50多块壁画砖，描绘出行、骑射、宴饮、放牧、打场等现实生活场景，简洁生动，不仅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而且填补了魏晋画像砖之缺。

(四)山东省博物馆收藏有历史文物14万件，资料13万件，自然标本7000件。历史文物最富特色。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齐鲁文化的遗物相当丰富，特别是龙山文化的蛋壳黑陶为稀世之珍。临沂市银雀山出土的

西汉竹简为镇馆之宝，其中《孙臆兵法》弥补了文献阙佚，判决了千年之争。《元光元年历谱》，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最完整的古代历谱。汉代画像石、嘉祥隋代壁画和明代朱檀墓出土器物，也都令世人瞩目。

(五)云南省博物馆共有馆藏文物4万余件，其中历史文物2万余件，革命文物7000余件，民族文物近万件。藏品虽然不多，却颇具特色。如在古脊椎和古人类化石方面，两个“腊玛古猿”的头骨化石，是研究人类起源的极珍贵资料，已引起国内外极大重视；旧石器时代的“元谋猿人”牙齿化石，是中国发现的最早的猿人化石，距今一百七十万年，较“北京猿人”还早七十万年，另外还有属于“古人阶段”的“西畴人”和属于“新人阶段”的“丽江人”等，也都是十分重要的远古人类化石；独具一格的云南青铜文化，不仅有大量兵器，还有不少生产工具、生活用具、乐器、装饰品，以及人物、动物的各种浮雕、圆雕等，对研究云南古代奴隶社会，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实物资料。楚雄出土的铜鼓，是中国最古老的铜鼓；唐宋时期云南少数民族建立的南诏、大理地方政权的文物，对研究这段时间、这些地方政权的历史、社会，也具有重要价值，可弥补史籍的不足。

二、市、县级综合性博物馆

中国属于综合性的市、区、县级博物馆，数量很多，它们虽是区域范围较小的地志博物馆，但也各具特色，并有不少精品著称于世。镇江博物馆、苏州博物馆、南京市博物馆、重庆市博物馆、南通博物苑、长沙市博物馆、开封市博物馆、济南市博物馆，以及庐山博物馆、哲里木盟博物馆、商丘博物馆等，都属于这一类型。这里介绍其中主要者。

(一)苏州博物馆藏品近3万件,以出土文物、古代书画、古代工艺品为主。出土文物方面,较著名的有:西周至战国的青铜器、几何印纹陶、原始青瓷等,具有江南地方风格,其中吴国青铜耕战工具最为突出。五代墓出土的秘色窑青瓷扣金碗、铜俑、陶俑;苏州虎丘塔发现的五代越窑青瓷莲花瓶,北宋木雕经箱、刺绣经袱,北宋瑞光塔发现的珍珠舍利宝幢,绘有四天王像的北宋祥符六年内的木函,唐宋写经,北宋雕版印刷经卷、嵌罗甸漆匣等等,都是国内少见的珍品。四大宋碑原石中,南宋绍定二年刻的“平江图”,为宋代苏州城市布局图,淳熙七年黄裳所绘“天文图”、“坠理图”、“帝王绍运图”,是中国最早的星象,地理实测图。

书画方面的收藏也很丰富,元以来著名画家如王蒙、夏昶、沈周、文徵明、唐寅、祝允明、董其昌以及“清初四僧”、“四王吴恽”、“扬州八怪”、“四任”等人,都有代表作藏馆,为江南地区书画收藏甚富的一个博物馆。

工艺品方面,有苏州竹、木、牙、角、玉、砖等雕刻品;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宋至明清的泥塑;反映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苏州经济碑刻拓片等。

(二)南通博物苑创建于一九〇五年,创办人张謇,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个博物馆。收藏文物2万多件,资料1.1万多件。书画方面较珍贵的有清代李方膺《梅花图》卷,上有署款“乾隆二十年四月初六日写于金陵借园虎溪桥”,为研究其生卒年月提供了新证据;还有清代黄慎画的《丁有煜像》卷,上有丁自题诗传和郑燮、袁枚的跋,为名家合璧佳作。瓷器方面,有唐代越州窑的青瓷皮囊式水壶,形状与契丹族革囊水壶相似,是汉族仿辽瓷的产品,反映了当时民族文化的交流;明万历年

间南通名医陈实功的一件白地青花瓷乳钵，为陈氏唯一存世的医学工具。还有罕见的清代坊牌和汉代盘铁，为研究滨海地区盐业史的珍贵文物。一些关于馆史的文物资料，是研究中国博物馆发展史的重要材料。

(三)重庆市博物馆藏有历史文物 6 万余件，其中一级品 347 件，以陶瓷器、书画、汉代雕刻艺术品和钱币居多。汉代雕刻艺术品中，石刻、画像石、画像砖的内容非常广泛，形象地反映了汉代社会生活的各方面状况。书画收藏以明清及近代四川籍名家作品居多。瓷器、钱币藏品都比较系统、完整。

馆藏的自然标本共 6 万余件，其中以古生物化石标本龟鳖类和恐龙化石标本较丰富，4 具恐龙型整型标本和 2 件鱼鳖类标本，均为新属、种，堪称世界上发现最早，最完整的标本。地矿标本，种类齐全；植物标本，很多是很难采集到的。

历史类博物馆的收藏

历史类博物馆可分古代史和革命史两部分。古代史方面，中国通史性质的博物馆为中国历史博物馆；地方古代史类博物馆较重要的有南京博物院、陕西省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四川省博物馆、河南省博物馆、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广州市博物馆、天津历史博物馆等；专史类博物馆较著名的有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天津三条石历史博物馆等。

一、省级历史类博物馆

(一)南京博物院原属于江苏地方通史性质，八十年代末改为长江下游地区性历史性质的博物馆，兼容历史

和艺术两方面内容。藏品近 40 万件，其中一级品 677 件。藏品主要有考古发掘的陶器、瓷器、铜器、木漆器，传世的书画、织绣、文献、金石、拓片、工艺品等。

考古发掘的重要文物有：距今四五万年前更新世人类化石“泗洪人股骨化石”；三万年前的打制石器 200 余件；新石器时代的精美彩陶和各种生产、生活用具；六合程桥出土的春秋末期铁丸、铁条，它是现知中国最早的生铁；涟水县三里墩西汉墓出土的战国时期错金银铜牺尊，造型、纹饰都极精美；徐州出土的东汉王侯墓银缕玉衣及遍体鎏金的神兽铜砚盒，为江苏地区重要的汉代出土文物；高邮西汉大墓，为一座大型岩坑竖穴“黄肠题奏”椁木式墓，对研究汉代的丧葬制度和木构建筑具有重大意义；六朝大墓出土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等模印砖画，是六朝绘画史的重要实物资料；南京祖堂山南唐二陵发掘的文物，以及唐代扬州城及手工业作坊遗址的清理发掘品，对研究隋唐五代江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传世文物以书画最丰富。享有声誉的佳品有：宋代朱熹的字卷，阎次年《牧牛图》，赵佶《鹊图》，元代黄公望《富春大山图》轴，明代徐渭《杂花图》等。

(二)陕西省博物馆收藏文物 84000 余件，其中一级品 300 余件。时代以周、秦、汉、唐朝文物居多，类别以西周青铜器、秦汉砖瓦、汉唐石刻、唐三彩、唐墓壁画、碑石、陶俑、铜镜和金银器 8 类文物较多。

西周青铜器中，扶风齐家村出土的日己觥、日己方彝、它盘、它 ；泾阳高家堡早周墓出土的铜器群都极为重要。

陶俑方面，临潼秦始皇兵马俑陪葬坑的发掘，为该馆

增添了许多栩栩如生的陶人、陶马；唐三彩中，三彩驼背乐舞俑、三彩仕女俑等都为国内罕见珍品。

唐墓壁画，馆藏约 1000 平方米，其中以章怀太子，懿德太子和永泰公主墓出土的壁画，最负盛名。

金银器中，比较重要的一批是西安何家村窖藏中发现的一千余件文物，为研究唐代的政治制度、宫廷生活、医学发展和冶金技术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位于馆内的西安碑林，是中国保存碑石较多和较早的场所，计有由汉至清的各种碑石、墓志 1000 多块。一些碑文如《开成石经》、《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唐不空和尚碑》、唐中尼合文的《陀罗尼经幢》等，都具有重要史料价值。而更多的是书法艺术高超的名碑，书体俱全，名家荟萃，堪称中国书法艺术的宝库。如真书有欧阳询《皇甫诞碑》、褚遂良《三藏圣教序碑》、颜真卿《颜氏家庙碑》、柳公权《玄秘塔碑》；草书有智永《真草千字文》、怀素《千字文》、张旭《断千字文》；隶书有《曹全碑》、《周易残石》；篆书有李阳冰《三坟记》等。

汉唐石刻文物分陵墓石刻和宗教石刻两类。其中东汉石兽、画像石，唐蹲狮，李寿龟形墓志、犀牛，唐昭陵六骏和残菩萨像、武士像等，都是驰名中外的中国古代雕刻瑰宝。

(三)广东省博物馆收藏地方历史文物为主，包括古代文物和艺术品及近、现代革命文物计有藏品 12.4 万余件。较珍贵的有广东石湾窑的明、清各家的作品，潮州笔架山窑址出土的宋代瓷佛像座和佛像，宋代画龙名家陈容的巨幅立轴《墨龙图》，以及广东明清两代著名书画家的作品。

(四)四川省博物馆收藏本省文物为主，共计藏品约

15 万件,其中一级藏品 419 件。重要门类有石器、陶器、青铜器、画像砖、陶俑、书画、工艺品、少数民族文物等。

旧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较珍贵藏品有:资源、汉源等地出土的旧石器时代的石器;巫山大溪、忠县、广汉、雅安、夹江等地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石器、陶器;成都、彭县、广汉等地出土的殷周时代的青铜、甲骨;八十年代末广汉县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商代青铜人像、人头像、面具,以其奇特的造型,神秘的内涵,震动了国内外学术界,对研究古代巴蜀文化提供极为重要的资料。

战国和秦代的巴蜀铜兵器及铜容器,亦引人瞩目。如成都百花中学出土的水陆攻战图壶、涪陵小田溪出土的错金编钟 14 件和错银铜壶,都精雕细镂,制作技艺高超;新都蜀王墓腰坑中出土的铜器达 170 多件,是研究古代四川古代历史的重要实物。

汉代以画像砖及陶俑最负盛名。四川各地出土的汉画像砖,题材丰富,从日常生活到神话故事,达数十种之多,其中盐井、收获、弋射、宴饮、舞蹈、杂技等砖,尤富生活气息。陶俑也达数十种之多,其中说唱、持锤、扬箕、歌舞俑,造型生动,气质淳朴,堪称汉俑中的精品。

宋元明清藏品以书画为主,其中有不少名家的精品。如宋徽宗的《腊梅双雀图》、宋孝宗的诏书、宋人的《花灯侍宴图》、元代唐棣的《长松高士图》等。明清时期的工艺美术品收藏亦不少,计有玉器、玛瑙、犀角杯、漆器、缂丝、刺绣、金银珠翠饰品等。

(五)湖南省博物馆属于地方历史类型博物馆,以古代历史文物著称,共有藏品 10 多万件,其中一级藏品

865 件。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是该馆最精美的一批藏品。其中有完整绚丽的漆器，精湛繁多的纺织品，薄如蝉翼的素纱衣、画技高超的《软侯家属墓主生活图》大型帛画、研究价值很高的帛书和简牍、世界上最早的地形图和驻军图，以及各种兵器和乐器、大量的农畜产品和中草药等等。这些涉及汉代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实物，为世人提供了十分重要而丰富的形象资料，受到国内外人士的普遍重视。

馆藏的其他古代文物，也有很多精品。如新石器时期安乡县汤家岗大溪文化墓葬中出土的印纹白陶盘，为中国迄八十年代末所发现的最早的印纹白陶；商周青铜器中的商代象尊、戈卣、人面纹方鼎、牺首兽面纹尊、鸮卣、象纹大铙和西周蕉叶纹、仿竹制簋形器等，都是富有地方特色的著名青铜重器；丰富多采的楚文化中，有现知最早的纸绢画，即战国楚墓出土的《人物龙凤帛画》和《人物御龙帛画》，有春秋晚期铸造的铁鼎、铁口锄，有战国时期华美的漆器、绚丽的丝织品、精致的铜镜等；瓷器方面，有东汉至初唐的湘阴窑青瓷器，唐至五代的长沙窑釉下彩瓷器和白瓷，元代的青花瓷器等；书画方面，有传为唐褚遂良摹兰亭序墨迹，宋代《山林赏雁图》，以及明代沈周、仇英等名家作品。

该馆收藏的近现代革命文物也很丰富。如近代有太平天国、湖南天地会、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文物资料，现代有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人在湖南的早期革命活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秋收起义、湖南年关暴动、平江起义、红军长征等方面的文物资料。

二、地方古代史类博物馆

(一)天津历史博物馆收藏有古代史、近代史、革命史方面的文物约 10 万件。甲骨和货币藏品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甲骨多为过去著名收藏家如王懿荣、王襄等人的旧藏,价值很高,如有关月食的卜辞、捕获犀牛的卜辞,为研究殷商时期天文、气象的重要资料。货币从最早的贝币到清代制钱,基本系统成套,其中如“簠邦刀”,为全国所仅有,战国时期的“梁”、“半”、“八朱”等钱权,也未曾见之著录。

其他比较突出的藏品,古代文物有东汉延熹八年(公元一六六年)雁门太守鲜于璜碑,是中国保存完整、存字最多的一通汉碑;铜器方面有全国著名的“楚王感鼎”等楚器 10 件,以及西周的“夔龙纹禁”、秦朝的“旬邑权”等;近现代文物有义和团天津“离”字大师兄沈德生的战刀和霸县信安镇“乾”字团木戳记,李大钊一九一三年在天津主编的刊物《言治》,周恩来在天津从事革命活动的珍贵文献如南开大学刊物《校风》和《敬业》、《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警厅拘留记》等。

(二)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是纪念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专史类博物馆,已有太平天国文物和复制品、文书、碑刻等数千件,能较系统地展现太平天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其中有不少珍贵文物,如甲寅四年渡船规条碑、官印、田凭、征粮告示等;还有《钦定士阶条例》、《钦定军次实录》等国内孤本。

三、革命史类博物馆

此类博物馆包括全国性的和地方性的两大类。全国性的有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地方性的有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吉林省革命博物馆,黑龙江省革命博物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皖西革命博物馆、

闽西革命博物馆等。这类博物馆主要收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三个历史时期的文物、文献、照片等资料。由于它不是以特定的纪念性遗址或遗迹作为馆址，故有别于革命类的纪念馆。

(一)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以反映广东地区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这个历史时期的革命斗争为主要内容，重点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该馆收藏文物、文献 1.3 万多件，历史照片 1.3 万多张。较珍贵文物有：一九二七年广州起义时的“打倒帝国主义”和“工农兵起来，拥护苏维埃政府”两条标语；广州起义时用过的怀表、指南针；中共广东区委办党校的教材《训练材料第二集》；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潘学吟的毕业证书；陈毅在粤北领导游击战争时用过的皮箱；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从东北打到海南岛的功臣炮和“威震敌胆”旗帜等。

(二)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研究、宣传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事迹及其意义的专门性博物馆，主要收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有关实物、文献。重要藏品有：朱德使用过的机关枪，毛泽东帮助老乡挑水用的水桶，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财政部长余贲民用过的铁皮箱，以及红军在艰难时期坚持斗争用的两面刀、迫击炮、碾药工具等。

文化、艺术类博物馆的收藏

这类博物馆，主要收藏绘画、书法、陶瓷、织绣、雕塑、工艺、摄影、戏剧、音乐、舞蹈、文学、电影等文

化艺术方面的文物资料和遗存珍品。有各时代、各民族、各地区的，也有综合性的或专门性的；有全国性的，也有地方性的。上海博物馆是以收藏古代文化艺术品为主的艺术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则是以收藏古代艺术品为主的省级艺术博物馆；地方性的较出名的文化艺术类博物馆有天津市艺术博物馆、洛阳古代艺术馆、北京艺术博物馆、咸阳博物馆等。专门性博物馆更多，已建立的有天津戏剧博物馆、苏州戏曲博物馆、苏州砖刻博物馆、苏州丝绸博物馆、苏州刺绣博物馆、南通纺织博物馆、浙江越剧博物馆、上虞越瓷陈列馆、北京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河南省石刻艺术馆、南阳汉画像石刻艺术馆、洛阳关林石刻艺术馆、徐州汉兵马俑博物馆、淄博琉璃博物馆、临汝汝瓷博物馆、山西沁县石刻艺术陈列馆、景德镇陶瓷历史博物馆、广东民间工艺馆、镇远青龙洞贵州古代建筑文化陈列室等。另外，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的美术馆，除作为文化艺术专题展览场所外，一般也兼有收藏艺术品的博物馆性质，如中国美术馆、上海美术馆等。许多综合性的、历史性的、遗址性的、纪念性的博物馆，也有侧重收藏文化艺术文物的，如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陕西省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秦兵马俑博物馆、徐悲鸿纪念馆等。一些古代文化艺术遗存宝库，如敦煌莫高窟、云岗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大足石窟等，虽是属于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亦堪称珍藏古代艺术瑰宝的博物馆。总之，中国数千年文明古国遗存下来难以数计的古代文化艺术珍品，为建立和发展文化艺术类博物馆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随着博物馆事业的发展，这类专门性的文化艺术博物馆，正方兴未艾，

前途无限。

以下择要介绍这类博物馆中的著名博物馆。

一、综合性艺术博物馆

(一)上海博物馆是全国性的古代艺术博物馆,以收藏众多、精美的古代艺术珍品闻名于世。馆藏文物主要靠解放后征集,有藏品 11 万余件,以书画、青铜器、陶瓷器最称精美。书画藏品中著名的有:唐孙位《高逸图》,宋郭熙《幽谷图》、王诜《烟江叠嶂图》、赵佶《柳鸦芦雁图》、梁楷《八高僧图》,元钱选《浮玉山居图》、王冕《墨梅图》、王渊《竹石集禽图》、张渥《九歌图》、王蒙《青卞隐居图》、张中《芙蓉鸳鸯图》、明戴进《春山积翠图》、孙龙《花鸟草虫》册、文征明《真赏斋图》、唐寅《秋风纨扇图》、仇英《倪瓒像卷》,以及东晋王羲之《上虞帖》、王献之《鸭头丸帖》、唐怀素《苦荀帖》,宋苏轼《答谢民师帖》、黄庭坚《华严经疏》、米芾《参政帖》,元赵孟頫《草书千字文》、鲜于枢《韩昌黎送李愿归盘谷序》等。青铜器中,四羊尊是传世名器,透光镜为稀世之珍,商鞅戟和商鞅量是传世仅存的两件商鞅器,浑源出土的牺尊,不仅是浑源彝器群中最杰出的一件,也是国内唯一遗存的春秋时期牺尊。陶瓷器中,以唐宋元明清的名窑瓷器著称于世,如唐代邢窑和五代定窑白瓷,唐代邛窑的釉下彩,明宣德的官窑白釉、德化窑等。其他工艺品如竹刻、织绣等也有很多精品。

(二)辽宁省博物馆属于历史艺术性质的博物馆,而以古代艺术品著称。馆藏文物 5 万余件,其中书画最负盛名。传世书画珍品有唐代周昉的《簪花仕女图》、五代董源的《夏景山口待渡图》、南宋徐禹功的传世孤本《雪中梅竹图》、唐怀素《论书帖》、欧阳询《梦奠帖》等,

而叶茂台辽墓出土的两幅重彩山水、花鸟画，则是极难得的出土书画中的精品。

丝绣类藏品中也有不少精品。如宋刻丝《紫鸾鹊谱》、南宋朱克柔刻丝《山茶牡丹》、宋绣《瑶台跨鹤》等，都是宋代刻丝、刺绣中的代表作。陶瓷类藏品则以辽瓷最为名贵，其中以具有北方游牧民族特点的、各种形制的鸡冠壶、凤首瓶等和带有浓厚地方特色的辽三彩等为代表。古货币方面，藏有清代著名古钱学家李佐贤搜集的中国古代货币，为研究中国货币史的重要资料。馆藏的明代重彩绘制的许论《九边图》和李应试刊本利玛窦世界地图——《两仪玄览图》，则是国内古地图中的孤本。

馆藏的少数民族出土文物也颇具特点。如出土于巴林右旗的辽陵哀册，其中两合刻有契丹文字，是研究契丹族历史和语言文字的重要资料；叶茂台辽墓除出土两幅古画外，刻丝金龙纹被面，也是难得的辽代织绣珍品；另外，先后发掘的匈奴、鲜卑、契丹族的文物，北燕冯素弗墓的出土文物，都具有鲜明的少数民族风格。

(三)天津市艺术博物馆是一个以造型艺术为主的专业博物馆。藏品收集既立足地方，又面向全国，历代艺术珍品和当代佳作兼收并蓄。历代艺术品主要有绘画、书法、陶瓷、铜器、玺印、砖瓦、石刻、碑帖、砚台、漆器、珐琅、竹木牙石雕刻和其他工艺品，反映天津地区特色的藏品主要有杨柳青年画、“泥人张”彩塑、木雕、刻砖、风筝、剪纸等民间艺术品。

馆藏文物以绘画最负盛名，精品有北宋范宽的《雪景寒林图》、张择端的《金明池争标图》，南宋扬无咎的《梅花》册页，赵孟坚的白描《水仙》卷、苏汉臣的《戏婴图》，元吴镇的《竹石图》轴、钱选的《花鸟》卷等，而

元代边鲁的《起居平安图》轴、陈选的《岩阿棋树图》轴，则更是极为珍贵的存世孤本。明清作品中如朱奩的《荷上花》长卷、袁耀的《蓬莱仙境》通景大屏，都堪称巨构佳作。

书法藏品也很丰富。其中如王羲之的《寒切帖》、隋代《大般涅槃经》等，均弥足珍贵。

铜器中有著名的西周“克罇”、“克钟”、“克鼎”、“太师鼎”、“太保鼎”等；“泥人张”彩塑中，有早期传神佳作如张铭山的肖像作品和张玉亭的《钟馗嫁妹》等。其他的古代和民间工艺品，也都丰富而各具特色。该馆的各类艺术收藏，在国内外均享有盛誉。

二、专门性艺术博物馆

(一)洛阳古代艺术馆属古代雕刻艺术馆，主要收藏石刻，共1300余件，其中碑刻墓志1100余件，石刻艺术100余件，汉画像砖100余件。

洛阳碑刻墓志的出土数量居全国之首，该馆藏品中有众多精品。如中国第一所“大学”的标准数本——熹平石经和正始石经，唐著名隶书家史惟则书的《管元惠神道碑》，以及自东汉至明清许多由名人、名家撰文、或由名书法家书写的碑刻墓志，不仅是珍贵的书法艺术原作，也是十分重要的史料。

石刻艺术包括东汉至明清的作品，其中也不乏精品。如东汉王侯墓前的石辟邪、西晋骠骑将军韩寿墓表、北魏皇陵前的石狮和石翁仲、隋东都皇宫门前的石狮、唐代上阳宫内的泻水石蟾蜍、北宋宗宁五年的刻有二十四孝图的张君石棺、北宋元七年的张金宝功德造像“泗州大圣”、明张阁老墓前的石马、石人等。

(二)景德镇市陶瓷历史博物馆有藏品近万件，主要

收藏与景德镇陶瓷历史有关的实物和文献资料，也收集有古今景德镇陶瓷美术家和古代书画名家的书画作品。其中以明清时期景德镇烧制的官窑瓷器藏品最引人注目，如数百件永乐、宣德时期的御窑瓷器，曾引起国内外震动。

(三)北京大钟寺古钟博物馆馆址大钟寺，原悬挂着一口特大的铜钟，明永乐年间铸造，号称“钟王”，后广为征集古钟，自原始社会陶钟至民国年间道钟，集至数百口，形成“钟林”，遂成为中国第一座展现古钟发展简史的专业博物馆。

馆藏古钟中，“钟王”堪称世界古钟之最。与世界同类大钟相比，具有“五绝”：1.形大体重，历史悠久，它铸造于一四二 年前后，与世界同类大钟相比，年代最久远。通高 6.75 米，最大直径 3.3 米，重约 9.3 万斤，是世界上最大最重的古钟之一；2.钟上布满铭文，总计 23 万多字，堪称世界上文字最多的大钟；3.具有一流的声学特性，音调和谐，低音频率丰富，能产生拍频，钟声有起伏变化，时远时近，声音可传百里；4.先进的力学结构。仅用一根 1 米长、14 厘米高、6.5 厘米宽的铜穿钉，就能悬挂起 40 多吨重的大钟；5.高超的铸造工艺。它采用中国传统的地坑泥范法铸造，合金比率中，含锡比率曲线是最佳的，有力保证了强度和硬度，几个世纪以来，经重击、敲打仍不失音质之完美。

馆内收藏的其他古钟，可以系统地反映中国古钟的发展历史。先秦的各类古钟中，有距今五六千年、现存最古老的龙山文化陶钟，以及商代的青铜铙、西周的编钟等；秦汉以后，则以朝钟、佛钟、道钟为主，众多的品类不仅对研究古钟艺术、而且对研究宗教、政治、民俗

等社会现象，都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

(四)南阳汉画像石刻艺术馆是国内最大的一座专门收藏汉代画像石刻的艺术博物馆。藏品十分丰富，画像石总数已达 1200 多块。画像石表现的内容相当广泛，有反映汉代科学成就的，如对天象观测的记录或有关天文的神话故事；有展现汉代艺术生活的，如舞蹈、角抵、杂技等百戏；有描绘现实生活的，如车骑出行、宴饮、拜谒、田猎、侍奉等；有体现汉代思想意识的，如儒家、黄老、讖纬迷信思想等。这些画像石，受到国内外的历史、考古、哲学、音乐、舞蹈、戏曲、杂技、美术、体育、古建、自然科学等许多门类学者的高度重视。

民族、民俗类博物馆的收藏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其历史遗存既有时代性，又有地方性和民族性。结合民俗学和民族学，各类民俗博物馆和民族博物馆也在中国大地上相继诞生，八十年代以来更呈迅猛发展的趋势。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已经建立了不少以反映某一民族的通史、或某一民族在某一地区或某一时期的社会历史面貌为内容的博物馆，如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博物馆、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四川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博物馆、云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博物馆、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民族博物馆、贵阳黄果树滑石哨民族村寨博物馆、贵州黄平飞云崖民族节日陈列室、海南岛自治州黎族苗族民族博物馆等。而反映某一地区的人民在生产、生活、文化、风俗习惯及衣食住行等方面特点的民俗博

物馆，也在不少地方陆续建立，如苏州民俗博物馆、天津民俗博物馆、河南周口市民俗博物馆、山西丁村民俗博物馆、山西祁县民俗博物馆、延边龙井县朝鲜族民俗博物馆等。

一、民族类博物馆

(一)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是一个专题性民族博物馆。共收藏彝族文物 2000 余件，包括生产工具、生活用具、服装、佩饰、兵器、法具、经书以及彝族老红军的遗物，主要反映民主改革前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的历史和该族的文化特征，具有鲜明的民族和时代特色。

(二)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博物馆属于地方历史性博物馆，但藏品主要是反映当地民族、民俗的社会历史，馆藏 4500 多件文物中，本地区出土的历史文物计有 2600 多件，民俗文物 1000 多件，另有革命文物 800 多件。其中引起国内外重视的藏品主要有：唐代渤海国的遗物，如和龙县的渤海贞孝公主墓壁画，为首次发现的渤海时期的壁画；金末东夏国南京城遗址——延吉城子山山城以及东夏国时期的多方铜印，为金朝珍贵的出土文物。

(三)民族文化宫展览馆一九五九年始建时称民族文化宫博物馆，后改现名，然仍具博物馆性质。馆藏各类民族文物 3.6 万余件，国内 55 个少数民族的文物均有收藏。每年都自筹或合办 10 余个少数民族专题展览，成为国内展示民族文物的中心。

(四)中央民族学院民族博物馆中国规模较大、历史较长的一个民族类专业博物馆。馆藏全国 55 个少数民族的文物 3 万余件，品类包括锦旗、革命文物、土特产品、生产工具、生活用品、服装、皮毛、古器物、历史文献、珠宝器、武器、乐器、宗教用品和其他类等 14 大类。

该馆藏品的特点，一是族属、内容全面丰富，各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精神风貌都有物品遗存；二是各民族民间传统服装、装饰品众多，其中壮、满、仡佬等民族服饰历史已达百年甚至三百年以上；三是许多藏品具有重大的历史纪念意义；四是不乏具有很高历史与艺术价值的珍品，如蒙古、藏贵族用的金银器、藏族的唐卡、黎族丧葬用品龙被、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的宗教器具和典籍等；五是高山族的文物数量大、精品多，在大陆首屈一指。

（五）中南民族学院民族学博物馆坐落在武汉南湖，是直属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领导的综合性大学——中南民族学院内的一个博物馆。为配合教学和民族学研究，专门收藏民族文物，计有苗、壮、侗、黎、瑶、畲、土家、高山、仡佬、毛南、京、回、傣等中南 13 个少数民族地区的文物，共计 940 多件。其中珍贵文物有：壮族的铜鼓、苗族的银凤冠，以及反映各民族悠久历史的新石器时代的石斧、石镞、石铲等。

（六）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坐落在哈尔滨文庙。藏品 3000 多件，其中有许多珍品，如赫哲族的捕鱼工具；鄂伦春族的狩猎用具；鄂温克族的萨满服；满族的旗袍、祖像；蒙古族的餐具、药袋等。

二、民俗类博物馆

（一）天津民俗博物馆馆址为天后宫，在修复、展现天后宫原貌同时，收集了大量天津地区的历史民俗文物，其中有天后宫铜印、千秋代，明代城砖、潞河漕运图、漕运图，以及天后宫皇会、婚姻生育、民间游戏、民间艺术等方面的民俗文物。

（二）山西祁县民俗博物馆馆址是一座具有清代建筑

风格的民宅——乔家大院。馆藏文物共有 5000 余件，绝大部分是与本地区的民情风俗有关的实物和文献资料，其中有明代精巧的木器家具，清代的木雕龙灯、花轿和轿车，乾隆年间的家谱，民国初年的绳祖帘，以及古代书画作品等。这些实物与民宅原状和复原仿制品相结合，形象地反映了清末民初时期祁县地区的婚丧嫁娶、人生仪礼、衣着服饰、时序节令、民间文艺等民俗风情。

历史遗址类博物馆的收藏

这主要是指在历史遗址和遗迹、古陵墓和宫殿基础上建立的博物馆，是为了再现当时的历史原貌或社会生活情况，不带有纪念性质，它有别于在纪念性遗址和遗迹基础上建立的纪念馆。

这类博物馆大致可分为宫殿遗址、古陵墓和其他历史遗址和遗迹三大类。在宫殿遗址上建立的博物馆有北京故宫博物院，沈阳故宫博物院，长春伪满皇宫陈列馆等；古陵墓博物馆有北京定陵，陕西乾陵、茂陵、昭陵，北京大葆台汉墓，广州南越王墓，四川乐山崖墓，河南古墓博物馆等；其他历史遗址和遗迹博物馆有西安半坡、安阳殷墟、秦始皇兵马俑、临淄齐故城、长城、承德避暑山庄、广西柳州白莲洞洞穴、湖北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博物馆等。

一、宫殿遗址博物馆

(一) 沈阳故宫博物院馆址是清入关前的皇宫。馆内有传世文物 1.6 万多件，出土文物 5100 余件。较重要文物有一六三一年制造的传令凭证信牌、努尔哈赤的宝剑、皇太极的腰刀；辽代的“石经幢”、元代的“沈阳路城隍

庙碑”；明清以来各流派的绘画代表作；新乐遗址和郑家洼子青铜短剑墓出土的文物，尤其是新乐出土的煤精制品和木雕鸟，为国内罕见。

(二)长春伪满皇宫陈列馆馆址是伪满洲国傀儡皇帝溥仪的宫廷。除修葺复原伪皇宫原状外，还收藏伪满洲国时期的文物近 7000 件，其中包括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证物，如占领长春后发布的布告、日本在乡军人会会员章、日本天皇致溥仪电文稿；东北人民惨遭奴役和迫害的证物，如劳工身份证、生活必需品配给通帐等；伪满洲国遗物、如溥仪手批奏折、文件、访日纪念章、伪满钱币、邮票等；伪满宫廷用品，如象征权力的白熊皮、溥仪专用的大衣柜，宫内屏风、沙发、餐具、装饰瓷器等；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遗物，如辽宁民众救国会军用流通债券等。这些藏品，对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激发爱国热忱、了解伪满州国历史，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古陵墓遗址博物馆

(一)北京定陵博物馆建筑是明代第十三个皇帝明神宗朱翊钧（年号万历）及孝端、孝靖两皇后的陵墓。藏品都是定陵地下宫殿出土的文物，约 3000 余件。其中以丝织、金银、玉、瓷器为主，金银器数量最多。万历的金冠，全部用金丝编成，制作精致，二龙戏珠装饰姿态生动，全国独此一顶，极为珍贵。凤冠共出土 4 顶，分别为六龙三凤、三龙二凤、九龙九凤、十二龙九凤，冠上分别饰有花丝金龙、翠凤、珍珠与宝石组成的花卉，整个凤冠计有珍珠 5000 余颗，宝石 150 余块，珠光宝气，富丽堂皇，亦极名贵。其他文物也都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或历史价值。

(二)北京大葆台汉墓博物馆大葆台 1、2 号西汉墓是西汉中晚期燕王(或广阳王)及其王后的陵墓,一九八三年在 1 号墓原址建立博物馆。

该馆复原的墓室原状,中心建筑梓宫、便房和黄肠题奏,属于汉代皇帝和诸侯王的葬具体系,为中国首次出土的形制,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墓道北端出土的西汉侯王车驾——3 辆“朱斑轮青车”和 11 匹马的骸骨,是反映西汉车制和帝王殉车马制度的珍贵实物。同时出土的 400 多件随葬品,包括铜器、玉器、玛瑙、铁器、漆器、骨角器、丝织品等,也都具有较高艺术性。

三、其他历史遗址博物馆

(一)西安半坡博物馆半坡遗址是黄河流域一个典型和比较完整的母系氏族公社的村庄遗址,距今六千年左右。该馆遗址室保存了约 3000 平方米的原始村落居住遗迹,展示了原始人的生产水平、社会制度和生活居住情况。同时收藏文物 3 万余件,其中石器 1.2 万余件,陶器 1.4 万多件,骨角蚌器 3700 多件。另收藏人骨个体标本 200 余具,古生物化石和古人类化石标本约千余件。这些文物,除半坡遗址出土的 4870 余件外,其余 2.5 万余件都从其他遗址发掘所得,历史时期包括旧石器、中石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老官台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以及商代文化等,能较系统地展现原始社会的历史进程。

(二)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位于陕西临潼县,是在秦 1 号兵马俑坑上建立的。秦俑 1 号坑是以步兵为主、战车相间的长方形军阵,估计共有兵马俑 6000 多件,现仅发掘七分之一,出土陶俑 1087 个,陶马 32 件,战车 8 乘。这些陶俑、陶马和战车,都同原物一样大小,陶俑

高约 1.8 米，陶马高 1.5 米，身长 2 米，均有彩绘，并配以实战兵器。秦兵马俑坑所展现的宏大严整的军队阵列、谨严写实的雕塑艺术手法、成熟发达的陶俑烧制和青铜冶炼技术、个性鲜明又气势夺人的兵马俑形象，以及涉及秦代政治、军事、思想、文化、科技、艺术各方面的丰富内涵，使中外观众叹为观止，被人们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名倾中外，誉满全球。

(三)避暑山庄博物馆馆址避暑山庄，原是清代皇室的热河（今承德）行宫。该馆保留、复原了避暑山庄的清式宫廷园林建筑和帝后驻 的生活原状，同时收藏了文物近 3 万件，碑刻 21 通，历史典籍、图书资料 28304 部册。反映宫廷生活的有御用瓷器、珐琅、挂屏、漆器、丝织品、家具、武备、帝后书画墨迹及生活用品，还有历代历史文物和北方各民族、民俗文物，有些文物属罕见珍品，如燕明刀币和冀热辽边区通券等历代钱币、汉大型陶器、宋辽金元明时代的地方印绶等。

(四)湖北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博物馆是在湖北黄石市铜绿山古矿冶遗址上建立的。已发掘古代采矿场 7 处，已清理出西周至西汉千余年间不同结构、不同支护方法的竖井、斜井、盲井 300 多座，平巷近百条，鼓风炼铜竖炉 12 座，同时出土了用于采掘、装载、提升、运输、排水、照明、选矿的铜、铁、竹、木、石制生产工具，冶炼遗物及陶鬲、陶瓮等生活用品上千件。它是中国迄今已发掘的古铜矿中时代最久远、生产时间最长、规模最大、采冶工艺水平最高、内涵最丰富的一处古矿冶遗址，为研究古代矿冶业、青铜文化、楚文化及科技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自然、科技类博物馆的收藏

此类博物馆在中国还不很发达,大多由有关的科技部门筹建。其中可以分为自然和科技两大类,科技类又可分为科学技术和科学技术史两种。

自然科学类博物馆中,属于综合性的有北京自然博物馆、天津自然博物馆、上海自然博物馆、大连自然博物馆、重庆自然博物馆等;属于专门性的有自贡恐龙化石博物馆、青岛海产博物馆、中国农业博物馆、中国地质博物馆、北京天文馆、北京古观象台陈列馆、南京地质博物馆、甘肃地质博物馆、广东地质矿产博物馆、广西地质矿产博物馆、中国煤炭博物馆等。

科学技术类博物馆中,属于综合性的有中国科学技术馆;属于专门性的有中国铁道科技馆等。

以下扼要介绍其中有代表性的各类博物馆。

一、自然类博物馆

(一)北京自然博物馆馆藏标本 8 万余件,其中珍贵标本 230 件,门类可分动物、植物、古生物、古人类四大类。

动物标本包括无脊椎动物、昆虫、鱼类、两栖爬行类、鸟类、兽类等。各类又按门、纲、目、科、属、种系统排列,总共 6.4 万余件,其中无脊椎动物和鸟类标本最多。

植物标本分为孢子植物、种子植物两大类,共计 1.6 万余件。其中河北、五台山、天山标本占优势。海藻以西沙群岛为多。

古生物标本包括古动物和古植物两大类,共存约

3000 件。其中恐龙化石占优势，还采集到大量铲齿象及食肉标本，并有数件珍贵的上猿标本。

古人类标本数量不多，其中有巨猿牙齿等珍贵标本。

(二) 大连自然博物馆收藏各种自然标本近 5 万号，其中动物 2 万件，植物 2 万号，岩矿 6000 号，古生物化石近 2000 号和数量可观的古莲子标本。

海洋生物标本收藏丰富，体现了地方特色。其中有体长 17.1 米、重 45 吨的黑露脊鲸，体长 18.4 米、重 34.7 吨的长须鲸，都是罕见的大型鲸类标本；另有成套的海洋哺乳动物标本，如海狗、海豹、海牛等。

植物标本中，既有大量海洋植物，如成套的大连沿海褐、绿、红藻类标本，也有内陆珍贵的植物，如顶刺藻类、东北红豆杉，金县鼠李、老铁山腺毛茶藨等。

古生物化石标本中，有渤海海底发掘出来的鹿、象、犀牛化石标本，保存完好的海胆化石，世界闻名的最早食虫类“远藤兽”化石等。

(三) 重庆自然博物馆收藏标本有 10 万件左右。其中以恐龙化石标本最具特色，不同门类、不同时代的恐龙化石均有收藏，已装架的骨架标本达 10 具之多，还有百余件恐龙足印化石标本及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永川龙头骨。

古生物标本中，侏罗世龟鳖类化石收藏也较多，代表作有维氏中国鳖及成渝龟。

古人类标本中，有中国和亚洲发现最早的、距今一百八十万年前的、更新世早期人类化石，以及同时期的巨猿动物群化石。

动物标本中，有西南地区珍稀动物如大熊猫、金丝猴、牛羚、雪豹、毛冠鹿、大鲵等标本。

(四)自贡恐龙博物馆四川盆地南部的自贡地区,是中国重要恐龙化石产地之一,迄今已发现五十余处。其中以大山铺恐龙化石点最著名,这里埋藏着以恐龙为主,包括陆生、水生、两栖和空中飞行的古脊椎动物群,属于距今约一亿六千万年前的侏罗纪中期,这个时期的恐龙化石,世界上发现数量既少,也较零碎,而此处却埋藏丰富、属种众多,并且保存集中完好,已采集的即数以百计。化石分别属4个纲、11个目、15个科和18个属种,半数以上是新属或新种。珍品有长数米到20米的蜥脚类恐龙,保存完好的剑龙,体型细小的鸟脚类恐龙,早期肉食类恐龙;恐龙的伴生动物中有天空飞行的爬行动物翼龙,水中生活的爬行动物蛇颈龙,世界上最晚绝灭的迷齿类两栖动物,以及各种鱼类和龟化石等。

(五)青岛海产博物馆前身是青岛水族馆和山东产业馆,一九五五年改为青岛海产博物馆。馆藏标本共有1950余种、2万余件。以展出活动物为主的水族馆中,有活动物50多种,中国南极考察队从南极带回的巴布亚企鹅和一对南极象形海豹,深受观众喜爱。以展出海洋生物标本为主的陈列馆中,也有很多珍品,如北海狮和北海狗标本、抹香鲸标本,以及精美的植物和动物资源等。

(六)中国农业博物馆以展现、研究农业历史和农业资源为目的的专业博物馆。藏品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大系统。从年代上看,既有几万年前的化石标本和近万年的农业历史遗物,也有产自现代的栽培植物标本;从质地上看,有金石、陶瓷、竹木、字画、纤维、皮革等等;从门类上看,涉及农业历史文物和农林牧副渔各类标本,其中以野生动、植物和栽培作物标本最具特色。

该馆至今收集的文物、标本、资料达 10628 件，其中一些藏品具有极高的观赏和研究价值，如反映悠久农业历史的距今七千年的稻粒和骨耜，以及表明畜牧业发展的新石器时代的牧畜骨骼，商代的猪尊，汉代的各种栽培作物的遗迹和各式铁农具等；自然标本中有“活化石”之称的银杏、银松等标本资料，以及闻名世界的大熊猫、金丝猴、扭角羚、梅花鹿、丹顶鹤等野生动物标本；栽培植物中有野生大豆资源标本，水稻矮秆品种和杂交水稻，玉米新类型“四路糯”，以及中国特有的分枝型小麦“小佛手”等；水产资源中有白暨豚、中华鲟、扬子鳄等。

(七) 中国地质博物馆是一座大型地质专业博物馆。藏品总计近 10 万件，其中区域地质标本 2 万余件，矿物岩石标本 1.6 万余件，矿床标本 3 万余件，动植物化石 2 万余件。

藏品中有许多稀珍标本，如巨型山东龙为世界上少数完整恐龙化石之一；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文化遗址发掘的石器、骨针、石珠和骨质饰物等，是研究山顶洞人文化最珍贵的资料；辰砂王晶体重 237 克，体积 $65.4 \times 35 \times 37$ (毫米)，为矿物中珍品；蓝铜矿晶体产于广东阳春县石 铜矿，在中国唯此一处发现，在世界上也属罕见。还有大量产于中国的最早古脊椎动物化石、琥珀昆虫化石，以及珍贵的云南元谋人牙齿等。

二、科技类博物馆

(一) 中国科学技术馆是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领导的国家科学技术馆。主要收藏反映中国古代传统科技成就的文物和模型，以及反映当代科技成就的有关力学、热学、机械、光、磁、信息和核能的模型等。

(二) 铁道部科学技术馆前身是铁道部中央技术馆, 收藏有各个历史年代的蒸汽机车 20 余台, 包括英、美、日等国生产的十几个品种, 其中有一八八二年从英国购进的、中国现存最古老的 号蒸汽机车。

纪念类博物馆的收藏

这类博物馆, 是纪念重要历史人物和重要历史事件的专业博物馆。它的建立, 必须具备两个前提: 一是有特定的纪念性遗址或遗迹作为存在的条件; 二是对象应是具有纪念意义的杰出人物或重大事件。

中国已经建立的纪念性博物馆, 可分为历史纪念馆和革命纪念馆两大类, 以革命纪念馆为主。革命纪念馆, 遍及全国各地, 在对群众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方面, 起到了很大作用。

一、历史纪念馆

这类纪念馆的纪念对象包括历代杰出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历代杰出人物包括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等。迄今已建立的名人纪念馆以科学家和文学艺术家居多, 主要有: 湖北秭归县屈原纪念馆、湖南耒阳蔡衡纪念馆、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安徽亳县华陀纪念馆、九江陶渊明纪念馆、绍兴兰亭王羲之纪念馆、四川江油李白纪念馆、四川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广东潮州韩愈纪念馆、四川眉山三苏祠博物馆、江西修水黄庭坚纪念馆、杭州岳王坟和岳飞纪念馆、河南汤阴岳飞纪念馆、江西抚州王安石纪念馆、山东济南李清照纪念馆、江西奉新宋应星纪念馆、绍兴沈园和陆游纪念馆、山东济南辛弃疾纪念馆、浙江温州文天祥纪念馆、河北

邢台郭守敬纪念馆、云南晋宁郑和纪念馆、福建厦门郑成功纪念馆、福建南安郑成功纪念馆、湖北蕲春李时珍纪念馆、山东淄博蒲松龄纪念馆、福州林则徐纪念馆、湖南浏阳谭嗣同纪念馆、北京詹天佑纪念馆、广东花县洪秀全故居纪念馆等。重要历史事件纪念馆有：广东东莞虎门抗英纪念馆、广州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纪念馆、天津义和团纪念馆等。现择要介绍其中几个纪念馆。

(一) 四川江油李白纪念馆李白纪念馆在国内有多处，但以江油筹建较早、规模较大。江油是李白故乡，存有 30 余处李白遗迹、遗址，收藏了有关文物 3967 件，其中有《唐李先生彰明县旧宅碑》、《敕赐中和大明寺住持记》等一级藏品 12 件。元明清历代李白著述版本 1900 册，还有明清至现代的书画家墨迹 562 件。(二) 山东淄博蒲松龄纪念馆在蒲松龄故居基础上建立，恢复了故居的民宅原样式，馆外保留有蒲松龄墓园和柳泉生活遗址等。收藏有关文物、资料 8000 多种，较重要的有：康熙五十二年朱湘麟绘蒲松龄肖像和蒲松龄的手稿、印章等。

(三) 福建厦门郑成功纪念馆馆址在厦门鼓浪屿日光岩麓，是郑成功扎营屯兵和指挥操练水师的地方。馆内收藏众多有关郑成功的实物、文献、照片和绘画，其中有：郑成功的族谱、少年读书时期的文物，郑成功军队的藤盔、藤牌、大炮等兵器，厦门演武亭遗址出土的“练胆”石刻，闽南等地出土的郑氏部将关防，郑荷水师交战图和荷兰投降图等珍贵照片，郑成功开发台湾时的有关文献照片，郑成功的画像、笔迹、玉带、袍服、丝履，郑成功铸造的铸有“朱成功”字样的银币和“国姓大木”等银币以及南安郑氏陵墓出土的墓志铭拓片等。

另在郑成功的故乡南安县，也建立了“郑成功纪念

馆”，收集了郑成功的头发、手迹、靴鞋面、玉带、夫妇原始画像，以及有关的矛、盾、刀枪、土炮、国姓瓶、军饷银币等珍贵文物。

（四）河北邢台郭守敬纪念馆郭守敬是元代杰出的科学家，纪念馆坐落在当年郭氏从事治水活动的达活泉公园内。收藏有文物、资料、图片、题词等 1500 多件。

二、革命纪念馆

此类纪念馆以纪念辛亥革命及嗣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的重大事件和伟大人物为主，包括了杰出人物和重大事件两个方面。

杰出人物以革命家、政治家居多，也包括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已建立的主要纪念馆有：广东中山故居纪念馆，北京宋庆龄故居，上海孙中山、宋庆龄故居，南京中山陵孙中山纪念馆，广州廖仲凯、何香凝纪念馆，绍兴秋瑾故居，杭州章太炎故居，河北乐亭李大钊纪念馆，常州瞿秋白故居，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湖南宁乡刘少奇同志纪念馆，四川朱德故居纪念馆，淮安周恩来故居，湖北红安董必武纪念馆，湘潭彭德怀纪念馆，广东惠州叶挺纪念馆，贵州安顺王若飞旧居，吉林杨靖宇将军纪念馆，北京鲁迅博物馆，绍兴鲁迅纪念馆，上海鲁迅纪念馆，桐乡茅盾故居，河北唐县白求恩纪念馆，北京徐悲鸿纪念馆等。

重大事件的纪念馆为数更多，从辛亥革命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每个历史阶段的重大事件都建有纪念馆给以反映，并多以遗址、遗物来展示当时历史情况。按历史时序，已建立的主要纪念馆，反映辛亥革命的有：湖北辛亥革命纪念馆、南京雨花台及烈士事迹陈列馆等；反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有：上海中共“一大”

会址纪念馆、嘉兴南湖纪念馆、黄埔军校纪念馆、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广州农讲所旧址纪念馆、武汉二七工会旧址纪念馆等；反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有：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宁冈井冈山会师纪念馆、瑞金革命纪念馆、江西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福建古田会议纪念馆、遵义会议纪念馆、洪湖革命纪念馆、长汀革命纪念馆、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等；反映抗日战争时期的有：延安革命纪念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山西武乡八路军总部旧址纪念馆、安徽泾县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盐城新四军纪念馆、西安事变纪念馆、清苑县冉庄地道战纪念馆、辽宁平顶山殉难同胞遗骨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等；反映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有：河北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锦州辽沈战役纪念馆、淮海战役纪念馆、重庆红岩村纪念馆、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东北烈士纪念馆等；反映新中国建立以后的有：丹东市抗美援朝纪念馆、旅顺监狱旧址、浙江椒江解放一江山岛纪念馆等。

下面介绍几个较重要的革命纪念馆。

(一)广东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广东翠亨中山故居是孙中山先生在一八九二年亲自设计制图建造的，纪念馆保留了中西结合的建筑原状及孙中山的卧室、书房、客房，以及母亲和大哥的住房，还收藏了孙中山遗物 60 多件，各种电文、呈文等原件 600 多件，文物 500 件，照片 1000 余张。

(二)北京宋庆龄故居原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的府邸，即摄政王府公园。宋庆龄自一九六三年迁居于此，直至一九八一年逝世。故居主楼为宋庆龄生前起居之处，小会客厅、小餐厅、卧室兼办公室、

起居室和书房等，均保持原貌。收藏和宋庆龄生平有关的历史照片和文物资料，展出宋庆龄生平的历史照片近400张，文物资料300多件，系统地展示了宋庆龄光辉的一生。

(三)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坐落在湖南湘潭县韶山冲内，原是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的故居。该馆共收藏文物、历史资料和照片6000多件，其中有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睡过的床，劳动时用过的水桶、水车，读过的《诗经》、《论语》，早期的著作、照片，一九二七年在韶山考察农民运动用过的方桌，当时一些革命组织的文件、记录、传单，毛泽东任理事时的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班同学录，任教官时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官学校第二期同学录等。

(四)四川仪陇朱德同志故居纪念馆坐落在朱德家乡旧居四川仪陇县，收藏反映朱德光辉一生的文物共1217件，重点突出朱德青年时代在家乡、泸州和加入共产党以前的活动。其中有朱德在护国战争时期用过的地毯、烛台、砚台，南昌起义中用过的白玉瓷瓶，抗战时期在太行山创办的黄崖洞兵工厂生产出来的地雷等。

(五)江苏淮安周恩来故居坐落在淮安县城西北隅的驸马巷内，是东西相连的两个普通的老式宅院，周恩来在此度过了出生后的12个春秋。故居收藏有周恩来童年用过的裁纸刀、在梅园新村穿过的背心、在十三陵水库工地劳动时穿过的蓝咔叽布套服、视察黄河大堤时穿过的短袖衬衫、给家乡人民的亲笔信等珍贵实物。

(六)北京鲁迅博物馆坐落在北京阜成门内大街路北，是鲁迅先生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居住的地方。该馆保留了鲁迅故居的原貌，并在故居旁修建了陈列厅，收藏了鲁迅先生的文稿、诗稿、译稿1000多页，书信

1200 多封，辑录古籍 2200 多页，以及全部日记和其他上千件鲁迅遗物，是国内收存最完备的单位。

(七) 徐悲鸿纪念馆原先坐落在北京东受禄街 16 号徐悲鸿故居，一九六七年在新街口北大街另建新馆。该馆收藏了数百幅徐悲鸿先生创作的作品，包括素描、油画、国画等，其中有许多闻名中外的代表作，如油画《田横五百士》、《奚我后》，国画《九方皋》、《愚公移山》、《奔马》、《群马》、《漓江春雨》、《巴人汲水》等。还有徐先生生前征集的许多古代绘画作品，其中有遐迩中外的宋代武宗元《八十七神仙图》卷。

(八)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馆址武汉市红楼，是武昌起义次日，即一九一一年十月十一日湖北革命党人组建中华民国鄂军政府的所在地，曾一度暂行中央军政府职权。收藏有关辛亥革命的文物、史料，包括旗帜、印章、武器、名册、文件、布告、电文、信函、委任状、日记、手稿、宗谱、名片、书籍、报纸、田契、石碑、木匾、历史照片等。其中有刘静庵烈士画像、湖北留日学生出版的刊物《湖北分生界》、中国同盟会湖北分会会长余诚日记、孙武亲自设计和制作的革命军旗式、黄兴在武汉保卫战中的照片，以及武昌起义主要人物传略等。

(九)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坐落在上海市兴业路 76 号，原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李汉俊和其兄李书城的寓所，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就在这里召开。该馆复原了楼下客厅的“一大”会场，另辟了辅助陈列室。共收藏有自鸦片战争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各种文献、实物、照片共 3.9 万件，其中特别珍贵的是表现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历史的文物资料。

(十)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位于广州市中

山西路 42 号,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培养农民运动干部的学校,毛泽东曾在此主办第六届农讲所。该馆复原了讲习所旧址和陈设,还增辟了辅助陈列。馆内现有文物 233 件,复制品 2000 余件,照片 1 万张,资料 6500 多份,图书 1 万册。

(十一)遵义会议纪念馆遵义会议会址在贵州遵义市老城红旗路 80 号,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决定,确立了共产党的正确路线,保证了长征的胜利。该馆按原样陈列了“遵义会议会议室”、“军委总司令部一局办公室”、“周恩来同志住室”、“朱德、康克清同志住室”、“一局局长张云逸同志住室”、“参谋人员住室”、“工作人员住室”。还复原、管理了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居住过的新城古寺巷 19 号主楼。该馆共收藏介绍红军长征进贵州、遵义会议、四渡赤水等历史的各种图照、文照、实物、图表、照片 1561 件。

(十二)延安革命纪念馆延安是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八年中共中央所在地。共有革命旧址 140 余处。纪念馆设在延安城北王家坪。馆藏文物共有 3.5 万多件,照片资料 5500 多张,图书 1.2 万余册。

(十三)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位于安徽泾县云岭,是以当年新四军军部所属各单位的旧址为基础而建立的。至八十年代末恢复开放的旧址有:司令部、政治部、军部大礼堂、军部修械所、战地服务团、中共中央东南局、抗日殉国烈士墓等。馆藏的革命文物、资料、图片等 7000 余件,其中有叶挺在皖南使用过的办公桌、木床、望远镜等珍贵的革命文物。

(十四)东北烈士纪念馆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一曼大

街。馆收藏文物 7000 余件，资料 5000 余件。其中有杨靖宇将军担任哈尔滨市委书记时穿的大衫、在抗日联军指挥作战的军用地图和签发文件的名章，赵尚志将军的手枪，赵一曼烈士的文章，李兆麟将军被害时穿的血衣、董存瑞烈士荣获的毛泽东奖章等。

(十五)淮海战役纪念馆坐落在徐州市南郊凤凰山东麓，共有藏品 1.5 万余件。其中有淮海战役总前委用的电台，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签署的作战命令，十勇士架桥用的绳头，中国人民解放军登上宿县城头吹的号角，“碾庄战斗突击模范连”的奖旗，歼敌“老虎团”使用的电话机，骑兵追歼敌坦克的“雪枫刀”，以及群众支前用的“功劳车”、做鞋夹板、担架队拄棍等。

中国博物馆的陈列展览

中国博物馆陈列展览的概况

新中国建立之后，博物馆已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博物馆通过文物标本的收藏、征集，尤其是通过举办陈列展览这一种特殊方式，来传播历史和科学文化知识，对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为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为实现工业、农业、科技和国防的现代化做出贡献。

在博物馆的全部工作中，陈列展览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是衡量博物馆工作的重要标志，要求各级各类博物

馆，都要认真办好与本馆性质任务相适应的具有本地本馆特色的基本陈列，同时也要重视并办好形式多样的临时展览。要求陈列要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反映历史和自然发展的规律，具有较高的思想性、科学性和艺术性。

在五十年代初期，中央文化部设立文物事业管理局之后，决定了整顿与改造旧有博物馆的政策，着手改造原有陈列内容，清除旧的影响，逐渐改变过去那种零乱不堪的“古董摊”式的陈列布置，使文物展品与时代和社会生活联系起来，按照历史发展规律进行新的科学的陈列设计。以北京故宫博物院为例，即依上述方针首先举办了《清代革命史料》和《帝国主义侵华史料》等展览，以及开放部分宫殿复原陈列。之后，再逐步完成按时代发展的综合艺术陈列——历代艺术馆。正是由于各级博物馆以社会教育作用为主旨，通过各种陈列展览开展了革命传统教育、辩证唯物主义教育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以及普及科学文化知识，而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

新中国建立四十多年来，随着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博物馆的数量品种均有很大的发展，故各种基本陈列和临时展览也大幅度增长，观众数量逐年增多。据统计，从一九八二年到一九九一年九年中，全国各地博物馆，举办基本陈列累计为 11220 个，举办临时展览为 13030 个，观众总人数达 15 亿多人次。随着中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博物馆的陈列设备和宣传手段也在逐步改善。

博物馆的陈列设备是陈列展览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用为保护文物标本，进行文物组合，扩大版面延长展线，增强文物标本的珍贵感，增添陈列品的形象美。陈列设

备大致包括橱柜、台座、屏风、支架、版面、镜框、积木、说明牌等等。但在五十年代，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和工作经验之不足，各级博物馆的设备，大都采用笨重的木质制品，而且规格不一，色彩深沉，显得毫无生机，因而影响了宣传效果。八十年代由于改革开放的方针，推动了中外文化交流，开阔了文物博物馆界的视野，因此陈列设备方面已日见改进，有不少博物馆的陈列设备已逐渐规格化。有些基本设施，在长、宽、高度方面已有一定比例，在造型、线脚、色调上已趋一致。另外在陈列设备的民族风格方面，也已日渐形成。新的设备一般具有实用、美观、朴素、大方、线条简洁，色调含蓄等特点。也就是说具有了一定的时代特征。同时，这些设备的用材也在改进，如过去的木质橱柜，不易搬动，使用不便，故部分博物馆已改用轻型钢材、铝合金或铝镁合金等新材料作替代。至于支架、说明牌等，大都采用有机玻璃，这样显得轻巧、美观，而且加工易，视线好，方便参观。如江西省博物馆一九八九年举办的《江西古代文明史》陈列，即采用了上述设备，展出效果很好。在陈列设备的制作上也日益考究，有些已达到工艺精湛的程度，对陈列品起到了很好的烘托作用，珠连璧合，相得益彰。

为了增强宣传效果，适应社会的审美观点，有一部分博物馆引用了现代化的新技术，增加了声像等设备。如北京故宫博物院于一九八四年对奉先殿进行了改造，建成了新的钟表陈列馆。他们改进了灯光照明，增加了空调设备，因此使陈列馆内光照柔和，温度适宜，并在厅内设置了8台彩色电视机，用闭路电视轮流放映有关钟表的电视片，引起了观众的浓厚兴趣。中国地质博物馆

于一九七六年之后，在大部分陈列室内采用新技术新材料制作大型展品和展柜。展品中突出标本，并配合有灯光布景箱、电动模型、图表文字等。每个陈列室的总体布局不同，但都注意了层次变化，起伏迂回，使展出形象直观，具有立体感，从而提高了陈列效果和观赏价值。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卢沟桥事变半景画馆，是利用绘画、实物、电影的有机结合，再配以灯光、音响、特技和自动解说等现代化手段，构成立体形象效果，借以烘托气氛，表现主题。另外还放映卢沟桥事变纪录片，反映日军进攻卢沟桥的情景，其中有中国二十九军跑步出击及赵登禹、佟麟阁两位将军在南苑牺牲的情况，真实地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挑起战端，侵略中国的历史。

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在《红军长征》部分即较好地运用了景箱，如“飞夺泸定桥”景箱，有冲天的火焰，爆炸的炮火，血染的波滔，一幅活生生的战斗场面呈现在观众面前；“雪山草地”景箱，用冷色渲染，皑皑的白雪，茫茫的沼泽，枯树荒草，一片凄凉。

中国历史博物馆于一九八一年组成了电化教育小组，编辑制作了《废品中的瑰宝》、《古画揭裱》和《中国历史博物馆群众教育工作集锦》等10多部录像片，在陈列室内开辟了录像、幻灯放映室，每天免费为观众放映，湖南省博物馆在《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陈列馆》中放映《考古新发现》、《西汉古尸研究》等录像片，也深受群众欢迎。

有些馆集中声、光、电技术融灯光、绘画、模型、照片为一体，对增强陈列展览的艺术感染力和趣味性发挥了良好作用。长沙市博物馆在《血壮军魂》、《秦始皇军阵》两展览中，即采用同步配音灯箱装置，用一组灯箱

配以结合陈列主题的解说、音乐、模拟音响的录音，较好地制造了环境气氛。中国革命博物馆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示意图”，安徽云岭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的“八省红军游击队集中图”等，都是通过电动使静态变动态，以先后有序的形式出现，有的还配以同步音响，即能较好地反映出展品的内涵。

少数博物馆已将电脑技术引入陈列之中。如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一台大型投影电视即由微机程序控制，实现沙盘灯光显示、电视画面和录音讲解三同步的电动沙盘，直观而形象地再现了南昌起义的战斗经过，使观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也在陈列宣传中引进了电脑技术，用以控制陈列中的录像设备。

上述情况说明，中国博物馆应用现代科学技术于陈列宣传工作，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综合类博物馆的陈列

综合类(地志类)博物馆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大类的内容，其特点：一是地方性，二是综合性。例如：

(一)首都博物馆是北京市最大的地志博物馆，一九五四年二月筹建，经历了近二十年的曲折道路，一九八一年十月一日正式开馆。一九五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吴晗副市长指出：“这个博物馆，一方面是地方性的，与北京没关系的东西不陈列；另一方面是要有重点，不是什么都包括。”该馆本着“立足北京，联系全国”的原则，举办了《北京简史陈列》。其古代史部分为六个方面，即远古的居民聚落、燕蓟遗迹、北方重镇、统治半个中国的都城、驰名中外的元大都、明、清两代的政治中心。

形式上采取了史志陈列的传统方式——板柜式的矩形规则布局，比较适合有导引的教学参观；其近代史部分分为清王朝的末世都城、北洋政府时期的北京等。陈列的指导思想是：以北京在中国近代史中的地位和特点为分期依据，以近代史上发生在北京的重大事件为依托，以人民革命斗争为主线，同时适当反映经济、军事、城市的发展变化及社会生活等。《北京简史陈列》有两个明显的社会意义：一是为观众提供了一个了解北京历史的简明直观的场所；二是从学术上看，初步形成了一个有着自己风格特点的北京史研究体系。另外，该馆还举办了许多临时性展览，如《北京出土文物展览》、《双塔庆寿寺出土文物展览》、《馆藏青铜器展览》等，因此吸引了广大观众。

(二)黑龙江省博物馆是一九七八年中国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介绍的十个省级博物馆之一。基本陈列，即《黑龙江古代历史文物陈列》、《动物陈列》和《古动物陈列》。《黑龙江古代历史文物陈列》共有 900 多件展品，分为“黑龙江的原始文化”、“唐代渤海时期的黑龙江”、“辽、金时期的黑龙江”、“元、明、清时期的黑龙江”，展览揭示了黑龙江历史的发展概况；《动物陈列》通过对昆虫、鱼、两栖爬行动物和鸟类、哺乳类等动物标本的展示，形象地说明动物界的多样性和由低级向高级的演化过程，同时又重点突出了本省特产的珍禽异兽，如东北虎、丹顶鹤和驼鹿等，还介绍了边疆人民养蜂、养蚕、养鹿、养貂等情况；《古动物陈列》是通过该省出土的不同地质时代的古动物化石，说明生物进化经历了漫长的道路，重点展品有鸭嘴龙、披毛犀和猛犸象等。该馆曾多次举行临时展览，并组织《恐龙》、《黑龙江珍奇蝶类》

和《馆藏历代货币》等巡回展出。

历史类博物馆的陈列

历史类博物馆是以研究和反映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和发展规律以及历史上重要事件和人物为主要内容的博物馆。由于反映社会历史的情况不尽相同，此类博物馆有全国性的，有地方性的，有一般性的，有专门性的。无论何种，都要以特定的历史内容和范围作为自己的反映对象，并按照博物馆工作本身的规律，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给人以生动的历史唯物主义教育。例如：

（一）中国历史博物馆是中国最大的历史博物馆，因此它的陈列最具有代表性。一九五一年三月，中央文化部指示，北京历史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前身）的陈列方针是：

1.中国通史陈列要以科学的历史观点和方法，将中国历史按年代、事件、人物布置陈列。

2.设立物质文化专题陈列室，如对生产工具、建筑和科学发明等历史上物质文化的发展过程，予以系统的陈列，并将考古材料科学地陈列。

3.陈列中应贯彻科学性、思想性和艺术性。中国历史博物馆遵照上述指示，组成了《中国通史陈列》，陈列面积为7000平方米，文物展品9000余件，他们当时的陈列原则是：

（1）通史陈列从原始社会开始，到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前止。既按照社会发展分期，又按照时代排列。

（2）以阶级斗争为主线，并结合生产斗争表现中国历史各个时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状况和劳

动人民的斗争历史。其中突出地表现历代农民起义和标志各个历史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发明创造，对中国历代的文化、艺术、科学和人民生活状况也适当地加以表现。

(3) 凡在中国历史发展各个方面起过重大推动作用的代表人物，都适当地加以表现。对代表被压迫阶级和民族的革命领袖人物和大思想家、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科学家、大文学家、大艺术家都有所表现。对统治阶级的重要代表人物，只要对历史发展起过重大积极作用的，也适当表现。

(4) 关于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根据历史真实情况，正确地表现以汉族为中心的多民族的、统一的国家发展的历史。着重表现民族间的友谊团结和各民族对祖国的贡献。

(5) 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中外关系，力求正确地表现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关于历史疆域地图问题，凡涉及国际关系，本着既符合历史真实，又注意国际关系的精神，慎重处理。

(6) 关于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问题，以郭沫若的观点为依据。

该馆根据上述原则所举办的《中国通史陈列》，以文物为主，辅以必要的图表、模型和文字说明。所陈列文物展品集中了当时全国的主要文物精华，其中绝大多数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十年间的考古发掘品，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中国通史陈列》系统地反映了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发展过程，具体地展示了中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面貌、重大的历史事件、杰出的历史人物和创造，以及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祖国历

史的伟大业绩，是一部生动、形象的中国古代史。展览开放后，曾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好的影响。这一陈列后来又历经修改，使陈列内容与形式更臻完善。

该馆还举办了《解放后人民捐献文物展》、《中国历代钱币展》、《中国历代兵器展》、《古代墓室壁画展》等 100 多个。这些临时展览，内容专一、小型多样，对活跃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二)南京博物院于一九六一年举办了基本陈列，命名为《江苏历史陈列》，以后曾不断修改。此一陈列系由近 3000 件考古学、民族学文物和历史文献组成，主要表现江苏地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地方历史陈列。它是歌颂人民的创造业绩的长篇史诗，也是一册图文并茂的乡土历史教科书。在内容上，注意了江苏历史与全国历史的联系，利用江苏出土和征集的大量文物资料，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反映中国历史特别是江苏历史的发展过程。内容与形式相统一，具有较高的思想性、科学性和艺术性，故能成为历史唯物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生动教材。一九八九年十月，该院基本陈列彻底更新，举办了《长江下游五千年文明展》，内容已不囿于江苏一省的范围，而扩大为整个长江下游地区，较《江苏历史陈列》扩大了视野。

该院举办的另一重要陈列，是一九七七年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文物资料展览》，内容分为农业水利、天文地理、纺织印染、建筑交通、造纸印刷、化学冶铸、数学、物理、机械、医学等部分。共展出文物 500 多件。通过这些实物资料反映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生产斗争和科学实践中所取得的伟大成果，表现出中国先人对全人类的重大贡献。

它说明中国是世界上农业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是最大的农作物起源地之一,商代甲骨文中即有稻、麦、粟等记载;中国是世界上天文学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在古代文献上即有日蚀、月蚀、太阳黑子、极光、流星、慧星、超新星等记录,东汉张衡发明的地动仪比西方早了一千多年;中国纺织手工业历史悠久,商代甲骨文中已有蚕桑、丝、帛等文字记载,到了汉代,丝织品已远销国外,中国在二世纪已发明了造纸技术,对人类文化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与疾病作斗争中,创造了医药学的宝库,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有关医学理论的帛书和导引图,即为历史的明证。

此外,该院还举办了《祖国的陶瓷展览》、《江苏丝绣品展览》、《金陵画家作品展览》等 200 多个展览,这些展览深受群众欢迎。

革命史类博物馆的陈列

革命史类博物馆陈列的原则是:反映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三个时期的历史,展示中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丰富经验,阐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伟大意义,向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例如:

(一)中国革命博物馆是中国革命文物收藏量最大的博物馆。该馆的基本陈列为《中国革命史陈列》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历史陈列》。一九五九年,经中央批准的陈列原则为:

1. 陈列范围,包括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三个时期。陈列以少而精为原则。

2.严格遵循以高度的政治性和真实性相结合的原则，对于历中事件和人物的表现，在政治上应着眼于对人民群众的积极教育作用，同时应符合历史的真实。

3.由于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革命的不平衡，对各个时期中国各地人民群众的具有重大影响的革命斗争，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地大规模的群众斗争、武装起义、各根据地的发展和各方面军的活动，都应当正确地加以表现。

4.按着国际主义原则，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世界各国工人阶级和人民在各个时期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援助都要有所表现。

5.正确地体现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对于各少数民族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应在各个时期和各个方面的陈列中加以表现。

6.对于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以巨幅画像表现的，以政治局常委为限；雕塑只限于毛泽东主席。有中共中央负责人在内的集体照片和个别中央负责人的单人照片，凡是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拟配合历史事件加以陈列。

据此，《中国革命史陈列》包括旧民主主义革命（一八四一年至一九一九年）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一九一九年至一九四九年）两个时期。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陈列内容包括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反帝运动、辛亥革命等7个部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陈列，包括5个段落，即中国共产党的创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陈列面

积 4120 平方米，展出文物 3600 多件。重要文物有鸦片战争抗击英国侵略军的虎门炮台的大炮；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的玉玺；康有为的手迹；武昌起义军用的武器；一九二一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最早版本；延安中央印刷局的印刷机；毛泽东转战陕北用的望远镜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时升起的第一面国旗等等。此外该馆还举办了《纪念林则徐诞辰二百周年文物资料展览》、《庆祝罗共成立六十五周年》、《祖国在我心中》等许多临时展览。

(二) 吉林省革命博物馆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建立，陈列面积 2000 平方米。该馆确定的原则是把本地区的历史发展作为自己的主要工作方向。他们在举办吉林省革命历史陈列中，突出地表现了如下的历史特点：

1.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2. 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艰苦奋斗，浴血奋战，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

3. 中国革命是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进行的，没有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革命是不能取得胜利的。

该馆本着上述原则，举办了《中国共产党历史文物资料陈列》，以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等 5 个部分，反映了吉林人民、东北抗日联军等英勇斗争的事迹。此中有“五四”运动中吉林人民反对“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传单；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生前的用品；抗日将领周保中一九三六年与日军作战时绘制的行军路线图。罪

证文物有日本关东军 731 细菌部队研制细菌武器用的工具。

该馆还举办了各种不同类型的临时展览,结合主要历史人物纪念日,举办《周恩来总理光辉业绩展览》、《鲁迅生平事迹展览》、《马克思生平事迹展览》等;结合现时先进人物事迹,举办《雷锋光辉事迹展览》、《朱伯儒先进事迹展览》等;结合国际国内的政治斗争,举办《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罪行展览》、《打击刑事犯罪展览》等;结合外事工作举办了《铁托思想、生平、事业展览》等。

这些临时展览,深受群众欢迎,故每年观众均在 20 万人以上。

纪念类博物馆的陈列

纪念类博物馆一般是纪念重要历史人物和重要历史事件的专业博物馆。故常以特定的纪念性遗址、遗迹的原貌作为自己存在的条件。其所纪念的对象都是属于中国历史上已经肯定的重大事件和杰出人物,这些事件和人物都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推动了历史的前进,因此这些事件和人物长期以来在人民之中就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故其陈列的特点,一般是通过历史原貌的复原陈列或辅助陈列反映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活动事迹。例如:

(一)北京鲁迅故居于一九五 年对外开放,一九五六年十月建成。其基本陈列是以鲁迅生平经历和思想发展的顺序编年陈列的,表现鲁迅作为一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事迹。陈列共分 8 个部分,前 4 部分

主要介绍鲁迅诞生的时代，童年生活，以及他在青年学生时代寻求改造旧中国的理想抱负。分为绍兴期间（一八八一年至一八九八年），南京期间（一八九八年至一九二二年），留学日本期间（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九年），杭州、绍兴期间（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二年）。陈列的后4部分主要介绍鲁迅到北京直至一九三六年与世长辞的历史。此中分北京期间（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六年）、厦门期间（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广州期间（一九三七年一月年至九月）、上海期间（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六年）。

陈列厅西侧的鲁迅故居，是一个小四合院，北屋中间向外突出的一间是鲁迅的工作室兼卧室，鲁迅称为“老虎尾巴”。室内陈设简朴，保持了鲁迅生前的陈设原样。在此8平方米的斗室中，鲁迅写下著名散文诗集《野草》、杂文集《华盖集》、《坟》以及译著等共200多篇。

（二）韶山毛泽东同志故居纪念馆毛泽东的故居在上屋场，为一坐南朝北的农舍，堂屋左首是灶门兼火炉屋，灶屋左首正房是毛泽东父母的住室，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即诞生于此。穿过饭堂便是毛泽东的卧室兼书房，窗下有书桌，书橱内有两册毛泽东读过的书，封面上有他当年亲笔写的“泽东”二字，是珍贵的纪念物。

一华里之外的纪念馆，建筑面积4000平方米，展出面积2000多平方米。有8个陈列室，即毛泽东青少年时代，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时期，毛泽东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及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另辟有“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家庭”、“韶山风物耐人思——一部分中央和地方领导同志及知名人士在韶山”、“国际友人馈赠礼品”等3个专题陈列室。在上述陈列中有大量毛泽东早期著作、照片和书信，以及毛泽东用过的皮箱、草帽等珍贵文物。

军史类博物馆的陈列

(一)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是中国第一个综合性军事历史专业博物馆，于一九六〇年“八一”建军节正式开馆。陈列面积4万多平方米。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于一九五八年确定的建馆宗旨是：“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和成长壮大的道路，阐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所取得的胜利；阐明人民军队的本质和显示现代化革命军队的面貌，借以介绍中国革命武装斗争和建军经验，继承和发扬光荣传统，教育全军，教育全国人民，教育后代。”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九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联合发出《关于调整充实军事博物馆陈列内容的通知》指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是我国唯一的军事博物馆……今后要收集、研究、陈列我们祖国历史上有关军事的、战争的、武器的史料，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军事遗产教育人民。”这样，军事博物馆的陈列内容，将不仅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武装斗争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而且要反映整个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以来的军事史、战争史、兵器史。因此，就其宗旨和职能来说，将由初建时期人民解放军军事博物馆逐步转变为

国家军事博物馆。

该馆陈列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馆，共分4部分，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形势，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运动的高涨，国民革命军的成立，统一广东的战争、北伐战争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馆，分5部分，即中国共产党创建工农红军和农村根据地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国民党的“围剿”和工农红军的反“围剿”斗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的交错，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与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从国内战争向全民族抗战的转变；抗日战争馆，共分4部分，即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敌我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战区统帅部的建立，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第三次国内战争馆，分5部分，即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争取和平民主、准备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而斗争，人民解放军的战略防御，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伟大的战略决战，人民革命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兵器馆，陈列各种武器2000多件，分为轻武器、火炮、坦克和装甲车、飞机、舰艇和导弹等6部分；古代战争馆（约五千年前——公元一八四一年），分先秦、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夏金元和明清等六个时期进行陈列，依次介绍了历代的兵制、武器、重大战役、军事将领和军事著作等；近代战争馆（一八四一年至一九一九年），分为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战争，抗击列强瓜分中国的革命战争，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战争等。

除基本陈列外，该馆还经常举办各种教育性、知识性、艺术性和技术性的题材多样的临时展览。二十多年中共举办临时展览50个以上，如《向雷锋同志学习》、《南京

路上好八连》、《击落美国 U—2 飞机》等展览。

(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它同时具有军事史博物馆的性质,建于一九八七年“七七”抗日战争爆发五十周年之际,位于宛平古城内。该馆陈列的指导思想是:

1.高举爱国统一战线和民族革命战争的旗帜,立足于全民族和全国的角度,反映出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抗战,反映出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全民族团结抗战的胜利。

2.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国民党政府及其领导下的军队的抗战实事求是地予以反映。

3.紧紧把握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的论断及阶级矛盾服从民族矛盾的原则。

4.整个陈列要以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和抗战路线、战略策略以及持久的人民战争为主流的这一显著特色。

5.采取“大事不漏,重点明确,文物精选,形式多样”的原则。

该馆陈列分为5个单元。第一单元,抗日战争序幕,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第二单元,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从卢沟桥事变到全国人民、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支援抗日战争;第三单元,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第四单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中国战区;第五单元,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抗日战争纪念馆自一九八七年开放后,受到了国内外观众的欢迎,当年观众即达10万人次。

艺术类博物馆的陈列

艺术类博物馆遵循和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

方针，继承文化遗产，搜集、研究、保存、陈列有关文化艺术方面的文物资料和各种文化艺术珍品，组织综合性或专题性陈列，表现中国人民丰富的艺术创作才能，反映各个历史时期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情况和民族特点，反映中国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反映各类艺术的风格面貌，向群众普及文化艺术知识，继承和发扬我国民族文化。例如：

（一）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最大的艺术博物馆。新中国建立之后，当时新组建的陈列部，确定故宫陈列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宫廷以及与宫廷有关的文物的宫廷历史陈列；一类是以故宫收藏为主的历代艺术品陈列。

故宫收藏近百万件文物，大多是历代艺术珍品，包括名贵字画、碑帖、瓷器、雕刻、玉器、织物、绣品以及商、西周、春秋、战国时代的青铜器和古代近代的外国钟表。此外还收藏大量同时具有高度艺术价值的明清两代帝后生活用具及有关清王朝典章制度的文物。因此该院选择了能够典型地反映宫廷生活的大量珍贵文物，设立了珍宝馆；以宫中收藏的各国富有艺术气息的钟表，开设了钟表馆。历代艺术陈列部分，除设有综合性的历代艺术馆外，还分设陶瓷、绘画（包括书法）、青铜器、雕塑、织绣、明清工艺美术、清代典章制度、清宫玩具、文房四宝等专馆。陈列结构亦按历史发展顺序进行设计。

故宫博物院先后举办过一百多个有历史、艺术价值的临时展览，如《敦煌艺术展览》、《永乐宫壁画展览》、《纪念中国古代十大画家展览》、《曹雪芹逝世二百五十周年展览》等等。另外还组织《明清织绣》、《清代帝后生活》展览等在全国各地进行巡展，曾组织《中国艺术展览》、《中国珍宝展览》、《宫廷珍宝展览》、《故宫宫廷展览》、

《清帝后庆典文物展览》、《紫禁城文物展览》、《中和韶乐》等赴美国、日本、德国、瑞士、丹麦、比利时、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保加利亚等国以及香港地区展出。

(二)上海博物馆曾被誉为“黄浦江畔的艺术宝库”，早已成为介绍中国优秀文化遗产的艺术博物馆，常设4个专题陈列馆：

中国青铜器陈列，展品600多件，分为4个部分：介绍商周奴隶社会状况和中国青铜器产生的社会背景；青铜器的铸造技术；从二里头文化到汉、唐时代的各种青铜器；巴族、百越族、滇族、匈奴族的青铜器。

中国陶瓷陈列，展品600余件，从原始社会有代表性的各种文化的陶器，一直到现代精美瓷器，系统地介绍了中国陶瓷工艺的发展历史。

中国绘画陈列，以大量书画真品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四千余年绘画发展的历史概况。唐以前陈列以摹本为主；宋元以后陈列原作。分宋元、明清和近代3个室，展出原作120余件。

中国古代雕塑陈列，展品近百件。主要介绍了中国雕塑艺术的成就和各时期不同的艺术风格，例如有战国木俑、汉陶俑、魏晋到唐宋的石造像和鎏金造像，元明的泥塑和木雕菩萨等。

除此之外，该馆还举办了不少临时展览，并曾多次赴美、日等国进行展出，获得好评。

自然类博物馆的陈列

自然类博物馆是以研究和反映自然界和人类认识保

护和改造自然界为内容的博物馆。它的任务是反映自然科学范畴的客观规律；利用中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光辉的古代科学技术成就，向广大观众普及科学知识和技能，提高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也配合当前的科技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此类博物馆按其不同性质又分为一般性、专门性等类型。例如：

（一）上海自然博物馆筹建于一九五六年，属自然科学综合性博物馆，有无脊椎动物、鱼类、两栖动物、爬行动物、鸟类和哺乳类动物、古动物、人类史等陈列室。陈列面积共 4000 平方米。

古动物陈列室展出的有长达 22 米的合川马门溪龙、云南禄丰龙和山东棘鼻青岛龙等，这里展现了七千万年以前的恐龙世界。

人类史陈列室展出的有元谋人、蓝田猿人、北京人、山顶洞人的化石和模型，展示了从人猿进化到人的过程。

动物学陈列厅分无脊椎动物、昆虫、鱼类、两栖动物、鸟类、哺乳动物等 6 个陈列室，其中有最低等动物海参、海绵、高脚蟹等，有重约万斤的鲸鲨标本，有娃娃鱼、绿毛龟、变色龙、极乐鸟、孔雀，有鸭嘴兽、长臂猿等等。这些种类齐全的动物标本，组成了一个出色的科普园地。

此外，该馆还有专题陈列厅，举办有《古尸（木乃伊）展览》、《南极考察知识展览》和《中国特产动物——麋鹿展览》等。

（二）中国地质博物馆始建于一九一六年，新馆建成开放为一九五九年十月。它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全国（兼顾世界）各地区典型、重要、特殊的各类地质标本的采集、收集、整理、保管和陈列展出工作。基本陈列有矿

产资源室、地球史室、地层古生物室、矿物岩石室、中国矿床石及宝石室等 6 大陈列室。展出各类标本展品约计 10000 余件。

矿产资源室,分为农用化工矿产、钢铁金属矿产、有色金属矿产、燃料化工矿产、非金属材料矿产等 8 个单元,介绍了中国矿产(自然界有经济价值的矿物、岩石)资源的概况。

地球史陈列室,介绍了地壳和地壳运动;地球表面形态和内外地质动力作用;自然地理环境的变迁和古生物演变;地球的物理性质、物质组成和内部构造;由内动力地质作用产生的褶曲、断裂、大陆漂移、海底扩张、板块构造、火山、地震等地质现象。

地层古生物室,以地质时代为序,展示了不同地层中的各类生物化石,揭示了从远古代至第四纪以来生物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从水生到陆生的演化过程。

矿物岩石陈列室,展出的矿物部分,包括了矿物的形成及其鉴定特征、矿物种类、中国新矿物、中国矿物珍品、外国矿物集锦等等。

中国矿床室,介绍了矿床在一定地质作用和物理化学环境中形成的其质和量在现代经济技术条件下符合工业要求的有用物质富集体,及其在中国的分布和地质特征。

宝石陈列室,分宝石、玉石、彩石、砚石等 4 个单元展出,展品有 900 多种,分别来自国内各省及世界上 20 多个国家。

此外该馆还自办或联合举办了几十个临时展览,如《中国地质学会六十周年展览》、《建国三十五年来地质工作成就展览》、《磷矿展览》和《地质力学展览》等等。

科技类博物馆的陈列

科技类博物馆包括综合科学博物馆和专业技术博物馆,其目的主要在于社会教育,普及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它在博物馆学理论和表现技巧上有很多发展和创新,它将实物(科学标本、机器)同模型以及示范(物理实验、天象演示、野外考察、机械模拟等)结合在一起,鼓励观众动手操作,亲自体验,使教育对象变为知识上的主动探索者。例如:

(一)中国科技馆是国家科技馆,一九八八年九月完成第一期工程后对外开放。该馆的陈列原则是:

1.收藏、保存和展示中国科学技术成就,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成就,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教育。

2.举办科学性、知识性和趣味性相结合的多学科综合性科技教育展览,普及现代科技知识。

3.陈列展示国内外最新科技成就,促进国内外的科技交流,促进中国的科技进步和科学技术向生产力的转化。

4.组织以启发思维,培养理论联系实际,提高实际问题能力为宗旨的科学实验活动,培养和开发以青少年为主的人才和智力。

参观对象以青少年和中等文化水平者为主,因此阐述时深入浅出,考虑不同层次的需要。在展览教育思想和展示方式方面,力图使展品和环境设计能够让观众亲自动手参与,让观众在实践中主动、生动、活泼地学习和探索知识。

该馆常设展览有8个展区,即:

1.电磁世界。高压放电、磁浮列车、静电植绒、涡流

磁效应、表演台等。

2.力、热展区。锥体上滚、角动量守恒、陀螺稳定装置、巴斯卡原理。

3.机械展区。有趣的机械传动、航空喷气发动机解剖等。

4.人体反应角。身高预测，体型评价，胖瘦及营养状况评价，握力、背力、平衡测定等，用于指导青少年健康成长。

5.声学展区。排箫、声音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声透镜、双耳效应、立体声实验室。

6.光学展区。反重力镜、眼球和成像、立体视觉体验、立体视觉检查。

7.信息技术展区。扫描与同步、机器人、计算机辅助设计、计算机作曲、电脑查询。

8.核技术展区。射线穿透实验、射线穿透实验、放射性无处不有。

该馆另外还举办有《中国古代传统技术展览》，介绍了中国古代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以及天文、青铜冶铸、机械、纺织刺绣、建筑、陶瓷、中医中药、传统手工艺等方面的科技成就。此展览曾在美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展出，观众达 300 万人次。

(二)南通纺织博物馆于一九八五年正式开馆。主馆陈列厅有 5 个，即：《人与纺织》，介绍了古今中外纺织界著名人士的生平业绩，纺织的起源、传统的纺织原料，新兴的纺织原料和纺织产品的应用；《中国纺织概貌》，展示了中国纺织工业技术发展概况，主要纺织产品以及宏大的中国纺织工业体系；《南通纺织史》，从早年的南通土布到近代机器棉纺业，多侧面地介绍了南通纺织业

的历史渊源和特点；《当代南通纺织》，介绍了南通纺织工业的巨大变化，纺织技术的革新，品种质量的发展提高，纺织科研状况和人才培养等；《纺织展望》，介绍了当代纺织从原料到最终产品，开始发生系列化的连续突破，生产技术进入伟大变革新时代的构想。

副馆为占地 1700 平方米的露天博物馆，这里展示了南通纺织的“昨天”，即《农家纺织》，由 4 幢不同时期的农家棉场，按复原形式组成，有旧式棉田、靛蓝田、纺织机具等，陈设逼真，有人操作，机杼之声不绝于耳。

《染作场》和花纱布商业，包括染坊、收花行、收布庄、纱庄、布店、弹花铺、颜料店、裁衣铺、竹篾店、车木店等，这里有人操作表演并出售纪念品，另外为了展示当地的风俗民情，设有杂货店、土特产店、酒店、点心店、玩具店、铁匠铺、当铺、水龙局，以及吊桥、石桥、露天戏台等等。

民族、民俗类博物馆的陈列

民族类博物馆的主要任务是调查、研究、陈列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生产、生活、宗教、风俗、习惯等方面的特点。其中包括生产工具、社会生活、家庭生活的用品、文化、文献方面的实物。通过陈列展示各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的规律性。例如：

(一)内蒙古博物馆建于一九五七年，陈列面积 3500 平方米。

内蒙古历史文物陈列是该馆的基本陈列之一，共分为 7 个部分，即内蒙古古代文明的开端、北方民族的兴起、北方民族的进一步发展、北方民族的大融合和大迁徙、

北方民族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北方各民族政权并存时期、大统一的蒙元帝国等。系统地反映了以蒙古族为主的中国北方民族的发展历史。

内蒙古民族文物陈列,主要陈列清朝后期的蒙古、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族的文物。这里有蒙古包和毛纺地毯、酿酒的工具,充分反映了蒙古族草原经济生活的状况;有达斡尔族的渔猎工具、农牧生产工具以及用桦树皮制作的各种生活用品;有鄂温克族饲养驯鹿以及用皮革、桦树皮制作的生产、生活用具;有鄂伦春人居住的“撮罗子”和各种狩猎对象等。这些展品都具有鲜明的北方草原民族的特色。

该馆还有内蒙古古生物与古人类陈列、内蒙古革命文物陈列等等。

(二)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在四川省西昌市,于一九八五年八月建成开放。该馆《凉山彝族奴隶社会陈列》,主要分3部分,即凉山的自然概貌与彝族历史沿革的梗概;民主改革前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原貌,包括社会生产力、等级、家支、习惯、婚姻、宗教和习俗等;凉山人民进行反抗斗争和民主改革的光荣事迹。陈列品中有彝族人民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品、服装、佩饰、兵器、法书、经书、彝族老红军遗物等。整个陈列既揭露了奴隶社会的黑暗和落后状态,又讴歌了奴隶们的斗争性和创造性。

民俗博物馆主要调查、研究某一民族地区人民在生产、生活、文化、风俗习惯以及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特点。通过举办陈列,展示这一地区人民的历史发展过程,过去与现在的经济、文化及生产、生活面貌。例如:

(一)苏州民俗博物馆于一九八六年开馆,对外展出的有3部分,即婚俗、节俗和食俗。

(二)山西丁村民俗博物馆陈列为4部分,共有6院29室,展出晋南岁时习俗:腊八、祭灶、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七夕、中秋等节日的民间风情;临汾、襄汾一带清末和民国初年民间婚姻嫁娶的礼仪:说媒、定亲、换(庚)帖、纳采、纳吉、请期到迎亲、拜堂、洞房、合卺、喜筵、酬客等;晋南一带生、老、病、死的礼仪习俗:生男育女、满月、周岁、祝寿、侍病、丧葬礼仪、火葬遗风、五世同堂、兄弟析居和家塾教育等;以及晋南民间的绣品、剪纸、雕塑、木板画等民间工艺品,及蒲剧、眉户戏、民间歌舞、小戏、皮影、木偶、说书和武术等实物资料。

中国博物馆的宣传教育与服务

群众教育队伍的宏观管理

中国最早倡导在博物馆对观众提供讲解服务的是“南通博物苑”的张謇苑长,他于一九〇五年向清政府建议在京师建设帝室博物馆时,提出“遴派视察员、招待员,用为纠监导观之助,必须通东西洋语言文字二三员,以便外宾来观,有可咨询”。他提出的“导观”便是向参观者讲解陈列。不仅有汉语的讲解,还要有外语讲解。然而,在旧中国的博物馆没有什么专职的教育人员,当有重要人物来参观时,由馆长或专家陪同讲解。如北京国

立历史博物馆馆长韩寿萱就多次为来馆参观的外宾讲解展览。还有一些被称为“丐”的社会闲散人员，他们没有职业，但知道一些历史掌故，在故宫、北京国立历史博物馆等地，以导游为名，迎合一些人的好奇心，讲一些希奇古怪的内容，借以挣钱糊口。

博物馆宣传教育与服务工作真正地开展起来则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

一、博物馆群众教育队伍的诞生与成长

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展了对旧有博物馆的整顿和改造，明确提出博物馆事业的总任务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东北博物馆（即今辽宁省博物馆前身）于一九四九年首创说明员制度，招考并录取说明员，负责组织观众参观和实施讲解。此事引起国内博物界的重视。北京历史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于一九五一年也先后录用和培训了一批说明员。此后，其他博物馆纷纷效仿，使群众教育工作队伍迅速发展。到一九五五年，全国的50所博物馆，普遍建立了群众工作部，凡是举办的陈列、展览大都有人讲解。当时的群教人员，工作兢兢业业，他们学习苏联博物馆的经验，在开展“阵地讲解”的同时，还举办了一些短小精悍的流动展览。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以及外国贵宾都听过他们的讲解，并给予好评。他们当中涌现了一批热爱博物馆事业的优秀分子，几十年如一日，为中国博物馆事业做出了可贵的贡献。群教人员的刻苦努力精神和工作成绩，得到了文博界的肯定。一九五六年五月，在全国地志博物馆会议上提出“讲解工作是博物馆文化教育工作的最前线”、“讲解员就是观众的老师”。这是首次在全国性会议上以文件形式明确讲解员及其工作

的重要性。自此以后，这一权威性的提法得到确认，各级领导在思想上也更加重视群教工作了。而作为讲解员们既然被称为老师，也就大大激发了学习热情和工作热情，努力充实自己的知识，逐渐摆脱了机械背稿的局面，并能回答观众的一些提问。

一九五九年三月间，为解决新建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的说明员队伍问题，呈请周恩来总理和中宣部、教育部帮助解决。周总理指示从当年报考大学的高中毕业生中抽调一部分担任讲解工作，还特别关照对这些高中毕业生按大专工资待遇，在工作中要好好培养。七月上旬，所需 60 名高中毕业生全部调齐，他们经过三个月紧张的培训，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时便担任了向国内观众的解说任务。同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领导下，从各大军区选拔了 200 多名解放军官兵，加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讲解行列。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领导人帮助中央有关部委具体筹划解决博物馆群众教育队伍的配备问题，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这一工作的高度重视。

领导上的这次决策，还使来自北京、天津、四川、陕西等地的 40 名大学毕业生走上了讲解岗位，从而开创了中国高校毕业生成批到博物馆担任讲解员的先例，这对以后群教队伍素质的提高有很深远的作用。

随着中国文博事业的发展和学习外国——特别是苏联博物馆学的理论，大家对群众教育的作用和方式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文化部文物局于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发出的《关于博物馆和文物工作的几点意见》中指出：“博物馆的群众工作，是馆与观众之间的纽带。一个博物馆陈列开放以后，群众工作就成为对外的主要

活动。”这里既用形象地比喻说明了群众教育工作所起的沟通、联系作用，又较好地解决了博物馆内陈列、保管和群众工作三者之间的关系。该意见还指出群众教育工作“应该采用多种多样方式进行。讲解工作是其中的主要部分，但不是全部”。在全国性文物工作专业会议和向全国下发的文件中，这是首次明确群众教育工作包括讲解在内的多种形式，其意义十分深远。它促进了中国博物馆宣传教育工作的深化和群众教育队伍的成长。因为要完成多种形式的群众教育工作，没有一支既具有相当知识水平又专业化的群众工作队伍，显然是不能胜任的。为此，该意见对群众工作队伍的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也提出了较高要求。例如讲解员要“根据不同对象，作不同的说明。回答观众问题时，能够解释清楚，要力求做到不出差错”。讲解员欲达到上述要求，必定要孜孜不倦地学习和努力钻研，同时也要努力加强自己的思想修养。为了进一步促进群众工作队伍的建设，在该意见书中强调讲解员应该“有必要的学习时间”，并且要“在制度上加以保证”。大多数博物馆认真学习、贯彻了这一文件，讨论、制定了群众教育队伍的发展规划。例如，中国历史博物馆群工部就建立了每周半日政治学习、半日业务学习的学习制度。每个讲解员还都要拟定一年的学习计划。年终，群工部要检查每人学习计划的实施情况。在各级领导的关怀下，六十年代的群教工作者为中国博物馆群众教育事业的发展，探索、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例如，讲解员由背诵专家提供的讲解稿进步到自己写讲解稿，而且能写出适宜于不同程度、不同要求的几套讲解稿。在群众教育的内容上，除阵地讲解外，不同程度地举行了流动展览、讲座、电化教育、配合教

学等活动，深受社会欢迎。他们非常热爱博物馆群众教育工作。这些人事业心强，好学习，干劲足，肯钻研，是活跃在群众教育工作岗位上的骨干力量。

二、全国首次博物馆群众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

“文化大革命”期间，文物博物馆事业遭到破坏，群众教育工作也处于半停滞状态，除了宣传毛泽东主席光辉业绩的一些博物馆外，大多数博物馆的群众教育工作者或下放劳动，或纷纷改行。一九七六年前后，博物馆的群众教育工作得到恢复，大多数博物馆重新招聘了群教人员。但同时，由于各馆在人力、财力方面的实际困难，特别是一些负责干部仍然认为群众教育工作无关紧要，可有可无，于是普遍实行“三员一体制”，使大多数群众教育人员徒具虚名，实际上成为陈列室的保管员和卫生清洁员。同时鉴于新吸收的群教人员思想、文化素质都较低，业务水平不高，为了能迅速提高社会教育队伍的素质，使这支队伍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充分发挥博物馆的社会教育职能，文化部文物局决定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在天津召开全国性的博物馆群教工作会议，推广天津自然博物馆群教部门通过体制改革，建立了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群教人员的积极性的经验。

全国各博物馆对此次会议非常重视，到会者除群教部门的主任外，还有不少馆长，他们都写出了有一定水平的工作总结。除文字材料外，一些馆还带来了录像、图片等形象材料进行交流。与会人员比较全面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博物馆群众教育工作的经验教训，对群众教育工作在博物馆中的地位和群教工作队伍的建设等问题进行了认真地讨论和研究，就广大群众教育工作者

普遍关心的问题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在以文化部办公厅名义下发的此次会议的纪要中提出：“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战略高度上来认识群众教育工作在博物馆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切实加强领导，提高管理水平，大力改革群众教育工作的管理体制。”根据与会代表的意见，《纪要》明确指出：“讲解，保管，卫生‘三员一体制’不利于群众教育工作的开展和群众教育工作队伍素质的提高。”针对中国文博事业还比较落后，各地人力、财力有限的实际情况，首先要求省级以上博物馆要创造条件尽快改变“三员一体”的局面，配备专职的群众教育工作者。为了保障群众教育人员的素质，《纪要》规定，新招聘的群众教育人员“一定具有高中以上文化水平，经过考核，择优录取”。针对全国各地绝大多数群众教育人员是工人编制的情况，为了更好巩固和发展群教队伍，《纪要》规定“群众教育工作人员应享受业务干部待遇”。由于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群众教育工作的专业会议，在全国反响非常强烈，会议纪要受到普遍重视。例如陕西省在全国会议结束以后，立即在省内进行贯彻落实，几个较大的博物馆的群教部改变了“三员一体”的局面，讲解员也享受了业务干部的待遇。此次天津会议以后，全国的群教队伍建设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突出表现为事业心较前稳定，工作热情普遍较高，业务知识有了一定丰富。

为了巩固天津会议的成果，一九八七年十一月，文物局又举办了群教部主任的学习班。参加学习班的既有一些经验丰富且有一定理论水平的老群教工作者，也有刚走出大学校门的新人。文物局还特意从全国范围选派了几名在群众教育工作上作出过突出贡献的群工部主任到

学习班交流经验。通过一个月的学习、讨论，大家提出和制定了《博物馆群教部主任职责（草案）》，规定了群教部主任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工作内容和权利、义务。它要求群教部主任必须“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团结同志，敢于负责”，“掌握群众教育工作性质、范围和基本理论，开展各种形式、多层次的群众教育活动”。由于讨论、制定这一职责的大多是具有实践经验，又有一定理论水平的人员，所以制定的内容比较切合实际，对各博物馆群教部的负责人如何带好本部门的队伍，领导大家开展工作有一定指导作用。参加学习班的人员很珍惜这次学习机会，自发地商定返回各自的岗位以后，要主动地定期互通工作情况，及时交流经验。对培养队伍、开拓工作起了积极作用。

一九八八年九月，中国博物馆学会在北京召开专门会议，成立了酝酿已久的社会教育专业委员会。文化部的领导人、博物馆界在京的几十位专家、学者和来自全国25个省市的53名代表出席了这次盛会。社会教育专业委员会的宗旨是“组织联系博物馆社会教育工作者，开展博物馆的社会教育与服务问题的研究，促进博物馆社会效益的提高，推动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它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博物馆社会教育问题的学术研究与学术活动”，“组织全国或地区性的社会教育的观摩、咨询活动”；“协助有关部门为博物馆培训从事社会教育的专门人员”，“编著、翻译社会教育与服务书刊、资料、著作，传递有关信息”，有条件时还要“开展国际间社会教育问题的学术交流”。这一专业委员会的成立，不仅对推动博物馆学的研究有很大作用，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给群众教育工作者以鼓舞，很有助于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群众教育的

队伍。为此,不少人认为,从一九八六年到一九八八年,中国博物馆群众教育队伍的建设连续迈了几大步,形成新中国建立以来,博物馆群众教育队伍建设的高潮时期。

通过上述主管部门对群众教育工作的宏观管理,加之各博物馆领导的具体筹划以及群教工作者的不懈努力,群众教育队伍有了很大的发展壮大。首先在文化素质上有很大提高。新选拔、聘用的群众教育人员中多数为高中毕业生,一部分为大学本科生。同时对原有人员进行了各种形式的培训,特别是近七、八年间,普遍把一些群众教育人员送到大专院校进行系统地学习,大幅度地提高了文化知识。如沈阳故宫的 20 余名讲解员在一九八八年参加了辽宁大学历史系函授班的学习。他们利用业余时间艰苦努力,经“寒窗五载”全部合格毕业,获得大专毕业证书。又如,安徽省博物馆在一九八一年,一次就有 9 名讲解员考进安徽大学历史系文博班,以后两年又各有 1 人到大学学习,这样先后共有 11 名讲解员得到在大学进修的机会,占全部讲解人员(共 15 名)的 73%。再如中国历史博物馆群工部的讲解组,共有 17 名成员,其中 1 名是大学本科毕业生,12 名是通过电大、夜大、专业进修等形式取得大专文凭,两者相加占全组人数的 76.5%。以上所举三例,并非个别现象。由于文化素质的提高,群教人员的工作能力,科研能力都有增强。许多人取得了中级职称,还有些被评为高级职称。其次群教人员的业务水平有较大的提高。可以承担过去无力承担的许多宣传教育活动,如讲座、辅导教学。再次是涌现了一批优秀的群众教育工作者。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热爱这项工作,把它看成是一项平凡而光荣的事业,努力学习,艰苦奋斗,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了令人瞩目

的成绩。他们当中有的荣获了文博战线全国先进集体的称号，有的在电台、电视台、报刊上宣扬了他们的先进事迹，有的荣获了省“三八红旗手”、先进工作者等光荣称号，有的兢兢业业从事群众教育工作三十多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以上这些人员是中国博物馆群众教育队伍的主流，是促进群教工作队伍整体的巩固和发展的骨干力量。

群众教育队伍的选拔培养

新中国成立初期，限于当时的国情，文博界干部的文化程度都较低，大多数未经过正规培训，缺乏专业知识。群众教育部门的成员，多数只具有初中文化水平，少量是高中水平，还有的甚至连小学都没有毕业，至于大学毕业生简直是凤毛麟角。当时，博物馆群众教育人员的来源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刚出校门的毕业生；二是剧团、歌舞团中的青年演员；三是复员转业的战士。那时，也没有什么严格的选拔录用标准，只要政治思想好，相貌端正，口齿清楚，身体健康就可以了。至于他们是否愿意从事这项工作，则考虑的很少。这是因为五六十年代，人们的组织观念很强，在工作上能做到服从组织分配。所以，尽管群众教育人员的待遇不高，大家仍能兢兢业业地工作。

在五六十年代，对群众教育人员的培训也很简单，主要就是“以老带新”背颂讲稿。由于当时群众教育工作的主要形式就是讲解，社会上又往往将博物馆的讲解工作与展览会的讲解工作等同相视，加之在人员的配备、使用和培养上缺乏可资借鉴的经验，于是产生了一种讲

解工作是“青春职业”的说法，说什么“讲解工作养小不养老，结婚就拉倒”，这种说法很有一些影响，造成不少博物馆的群教人员调动频繁，队伍很不稳定。

随着在工作实践中不断加深对博物馆群众教育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和注意积累培养群众教育工作队伍的点滴经验，逐渐就这支队伍的选拔、培养提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做法：

一、群众教育人员的基本条件及招聘

首先是明确群众教育人员的基本条件，它主要包括思想品德、业务知识、工作能力和体格、口才等主要方面。

在明确群教人员基本条件的同时，还实行了一套以招聘为主要形式的选拔方法。招聘对象以应届大、中学毕业生为主，招聘过程包括报名、面试、笔试、体检、政审 5 个主要程序。为了保证招聘的质量，大都在招聘工作中坚持了 3 条原则：一是党委领导、按章办事。各馆招聘群教人员时，都要在党委领导下，组成专门的领导小组，制定各种细则；二是公开程序，增强招聘工作的透明度，如公布拟录取人数、岗位内容、培养方向、物质待遇等；三是平等竞争，排除人情、面子、内部关系、特殊关照等各种干扰因素。

由于是向社会招聘，所以每次招聘的工作量都比较大。如中国革命博物馆在一九八五年欲招聘 10 名讲解员，结果有近千人报名。又如辽宁省博物馆一九八八年在报纸上刊登招聘广告后，有 326 人报名参加面试，其中 153 人达到面试分数线后，进入笔试，最后有 17 人被录用。

二、群众教育人员的培养宗旨及途径

为使群众教育队伍早出人才，多出人才，根据这一工

作的性质和特点，明确了群众教育人员的培养宗旨、方向，并在培养的途径、步骤、措施等方面摸索、积累了比较完善的经验。

群众教育人员的培养宗旨就是建立一支在德、智、体、美方面都得到发展的专业化群众教育队伍。

群众教育人员的培养方向是知识密集型的业务人员。博物馆的特点在于一个“博”字，群众教育人员就应对本馆涉及的各学科、各段落的知识都要有所了解。由于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做到样样精通，所以要求群众教育人员在学习知识时首先也是要突出一个“博”字，就是要多学科地从面上汲取知识，进而循序渐进，根据自己的条件，在某一个领域深入进去，“博中求专”。

群众教育人员的培养途径是学用结合，边干边学，不断提高。学习、研究的基点必须是立足于“为工作所用”，通过学习促进工作。在具体方式上，有以老带新、互相观摩、送出代培、离职到大专院校进修等。

群众教育人员的培养步骤要本着循序渐进的精神。

第一步先由必需的基础知识即学习博物馆基本知识、了解讲稿和陈列意图入手，逐步拓宽和深化其知识结构。一般的做法是先以能从事一般性讲解为目的，由领导讲明博物馆的性质、方针、任务，使其了解博物馆的社会作用和所处地位。由陈列设计人员或老群众教育人员，介绍陈列意图、主题思想、展出内容和应该向观众讲解的要点，最后进行考核。与此同时还要进行语言方面的培训，掌握正确的呼吸方法，练习发声用气。很多博物馆都邀请本地话剧团的演员或电台的播音员讲有关发声、用气的原理，并进行示范辅导。著名的语言大师侯宝林，语言文字专家吴晓铃，著名演员王晓棠、梁小楼、

周正等都曾向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的讲解员讲授有关知识，还针对每个人的缺陷进行纠正。

第二步以提高表达能力和阅读能力为目的，围绕陈列内容组织较系统的专题学习和选修古汉语、古诗文及现代优秀的短篇小说等，还要学点心理学、教育学。

第三步以培养研究能力和提高写作能力为目的。引导学习外语和深入学习有关专史，开展包括博物馆学在内的科学研究，提倡亲自写讲解稿、讲座稿和由小到大的文章等。特别是对讲解稿的编写，受到各馆领导和广大群众教育工作者的重视。因为讲解稿既是从事讲解的基本依据，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每个博物馆的观点和研究成果，甚至反映了中国对某些问题的态度。一般地说，一部比较好的讲解稿应该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艺术性、知识性和针对性五者统一。概括地说就是要观点正确、脉络清晰，史物结合，言之有据，简明扼要，有情有趣，对象明确，程度适宜。每个博物馆根据不同类型观众的需要，编撰了几套程度深浅不同、内容各有侧重的讲解稿。有配合学校教学的，有适宜于浏览性观众的，有供接待国外来宾用的。这些讲解稿是群众教育人员在对陈列主题思想、展出内容、展品详情等进行了全面了解，占有了大量资料，并对社会，对观众作了一番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的，后经专家和领导予以讨论、修订。

在全部培训和使用过程中，要不放松政治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和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国内外时事，用以指导自身修养，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还要始终贯穿职业道德教育，如事业心的巩固，同情、理解、关心并尊重他人的美德的树立，忍耐、刻苦和牺牲

精神的养成等，从而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培养群众教育人员的组织领导工作主要表现为安排计划，制定规章制度以及日常管理和组织辅导、考察等内容。各博物馆都有培养规划，学习计划，工作计划等，各种规章制度则更多。组织领导者不仅负责督促，甚至亲自动手起草、制定一系列符合实际的计划，还要采取各种措施组织实施之。如安排观摩讲解，进行讲评；召开座谈会，交流学习和工作的经验；组织考核评比，开展以服务态度好，讲解质量好，团结协作好，坚守岗位好为主要内容的优质服务活动等。有的单位曾定期举办讲解员的学习成绩展览，将大家抄录的卡片、笔记、写的文章都摆列出来，既起到互相交流的作用，又达到督促的目的。

博物馆的领导不断注意引导群众教育人员端正学习和工作的方向、态度，同时也积极为群众教育人员创造学习条件，提供各种学习机会。如组织群众教育人员参观、考察与陈列内容相关的生产单位、文物古迹、自然保护区等。自然科学类的博物馆还组织群众教育人员外出采集标本，社会科学类型博物馆组织群众教育人员到考古工地参加发掘。通过种种活动，使群众教育人员开阔眼界，加深对所要讲解内容的理解。例如，半坡博物馆组织讲解员分批参加考古发掘的实践活动，既学到划分地层、分类分期和断代等考古技术，又把平日所学的陈列知识与实践中获得的知识紧密结合起来，从而解决了接待过程中的一些难以说清的问题。

讲解工作水平不断提高

中国博物馆的群众教育工作是由单一的背诵式阵地讲解向多形式多层次的宣传教育活动发展，从而减少了盲目性，增强了针对性、计划性，收到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同时也丰富了博物馆学的内容。这一发展变化，体现了群众教育人员的精神状态和创造才能。

尽管各地区、各博物馆在展出内容、观众组成和自身队伍素质等方面有种种差异，导致各博物馆的宣传教育形式也各不相同，但是各博物馆普遍采用了“展室讲解”这种宣传教育形式，同时来自国内外的广大观众也乐于接受这种形式。同世界博物馆界相比，中国这种宣传教育形式也显得极为突出。

一、对讲解意义的认识不断提高

博物馆的陈列虽然具有很强的形象性和直观教育功能，但也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首先是那些固定的、静止的展品，难以针对不同文化水平和理解能力的观众的不同需要，而自动地显示其所包含的丰富内容。再者，博物馆的陈列往往由于展品的种类和数量有缺环，以及受展出空间的限制，有些该表现的内容却无法表现或不能充分表现出来。陈列本身的这种缺陷就要借助讲解工作予以弥补，讲解人员通过介绍展品之间的内在联系和陈列的“潜台词”，引导观众把通过视觉获得的不连贯的感性知识，上升为对陈列主题思想的正确理解，以至成为系统的理性知识，从而使博物馆陈列充分发挥其教育作用。从观众的求知效果来看，讲解工作也是非常必要的。如果没有讲解，只是让观众单纯看陈列，所得印象

就必然不够深刻。简明扼要的讲解还可以使观众在较短的时间里获得较多的知识和信息，比之观众自己参观要节省许多时间。观众中还不乏各方面的行家里手和对博物馆事业的爱好者、关心者，讲解工作不单是向他们输出知识和信息，还能从他们那里输入知识和获得对博物馆各项工作的反映、建议及批评意见，成为博物馆改进工作的参考。

二、讲解方式方法的不断改进

在四十年代的讲解工作中经常采取的讲解方式方法主要有：(1) 引导叙述式。即讲解员在引导观众参观的过程中按陈列顺序进行解释和说明，既可以前后贯通系统讲解整体陈列内容，也可以根据观众的兴趣和需要，讲解陈列的某一部分。这种方法的讲解气氛较为宽松，适宜于接待零散到博物馆的观众；(2) 课堂教学式。这主要是接待利用博物馆作为第二课堂的学生和带有某种学习目的到博物馆参观的集体观众。如天津自然博物馆为配合生物教学，在现有陈列的基础上，增添一些中学生物课中所涉及的标本、照片、幻灯和录像带。他们的直观教学活动，深受学校欢迎，一九八五年和一九八六年各用一个半月的时间分别接待了100多个班级的3000多位师生；(3) 总介绍式。即在观众参观前，先集中概括地介绍展出的主题思想和主要内容，使观众明了将要参观的是什么并对参观发生兴趣。这种方法主要用于接待较大规模且参观时间较短的团体观众；(4) 交谈式。适用于接待人数较少的有目的的到博物馆参观的专业工作者，讲解员同观众边看边讲，不时进行交谈，气氛活跃，双方都有收获；(5) 边讲边操作式。如中国科技馆向观众展示了一批可以操作的模型、复制品或模拟品，

在讲解过程中，让观众“触摸”操作一番，很有助于加深对所听、所看内容的理解。

在讲解实践中，逐步提出和完善了“因人施讲”的工作方法，大家认为这是衡量讲解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之一。不言而喻，每个博物馆的性质、内容、形式、规模都不尽相同，观众的职业、年龄、素质、参观目的、参观重点以及对陈列内容的接受能力也各不相同。因此，各博物馆的讲解工作不能用一个固定的模式，而是“因馆而异，因人施讲”，也就是不同类型的博物馆有不同的讲解基调和做法，对不同类型的观众，做不同的讲解。即使是同一种类型的观众，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不总用一种方法一成不变地进行接待。这里所说的不同，既有讲解内容上深浅程度的区别，侧重面的不同，详略不同和取材角度的不同，也有讲解艺术上表达方式的不同，语音语调的不同，感情运用的不同和讲解形式的不同。只有注意并掌握了这些不同，才能做到讲解有特色，有针对性，从而取得较好的教育效果。例如给小学生讲解时必须头绪简单明了，内容生动有趣，有一定故事性；对中学生的讲解则紧密结合学校的教学大纲，特别是注意教学中的重点，在讲解方法上适当采用提问形式，以达到启发思考，加深记忆的目的；对准备参加高等学校入学考试的学生，便用复习的方法讲解，注意同类问题的归纳、比较，帮助他们分析问题，突出重点；对大学本科讲解时，因为他们已有较高的分析能力和理解能力，所以便多向他们介绍一些有关的文物、标本，还结合陈列介绍一些学术动态，使之视野开阔。

为了做到“因人施讲”，大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国内外观众进行了分类。有的按照观众的参观目的分为

求知型、求乐型和求解型三种类型。有的按观众的类型和特点将国内观众分为一般观众、小学高年级学生、初中生、高中三年级毕业生、大学生、解放军战士、青年工人、少数民族和与展出内容相关的专业工作者共九种类型。外宾分为旅游者、新闻记者、驻华使节、专业工作者、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社会名流、保密性外宾、外籍华人等八种类型。

中国博物馆界对“因人施讲”的不断实践和总结提高，对提高群众教育队伍来说也是一条重要途径。因为讲解人员若总按一个模式讲，天天重复一个相同的内容，时间一长就产生了疲劳感，加之观众听讲时反应冷淡，于是对搞好讲解工作乃至群众教育工作的热情就会渐渐减退。实践“因人施讲”以后，它便使讲解员有了一种压力感，总觉得知识不足，难以胜任，从而保持充沛的干劲，不断积累知识，工作也不断有所前进。

为了尽可能提高讲解效果，中国的博物馆宣传教育工作者还摸索总结了讲解艺术，它包括了语言、表情、姿态等方面。

在语言上强调吐字清晰流畅，节奏适宜，准确地发好每个字的音，做到“吐字如珠”，将每一个字清清楚楚地送给观众。吐字既不能太快，也不能过慢，注意节奏的轻重缓急，抑扬顿挫，以使声音和谐悦耳。注意发音圆润洪亮，声情交融，通过正确的呼吸方法，合理使用发声器官，使声音响亮有力。注意以声传情，将发自内心的真挚感情融汇在语言的表述中。运用逻辑重音、逻辑顿歇，恰当地从语气上对某个词或某句话予以加强，使讲解内容主次分明，根据一句话中的层次关系在讲解中做适当的停顿，使一句话的意思表达得更清楚，更准确，

并力求做到语言简练、通俗，尽量选用富有表现力的词句。不使用口头语和晦涩难懂的语言。

在表情方面，因为它是思想感情的外在表现，在一定程度上比语言有更广泛的交际范围，能补充言语所不能完成的功能。所以，讲解员要借助表情，表达源于讲解内容的真实情感，更好地吸引和感染观众。

在姿态上，做到自然大方，注意避免矫揉造作之态。还恰当地运用手势，借以状物言志，在观众眼里造成视觉幻象，激发观众的想象能力，以加强对内容的理解。

三、讲解工作取得显著的社会效益

由于讲解艺术的日臻完善，讲解质量有了明显提高。四十多年来，在博物馆里听到讲解的观众涉及到社会上的各行各业、各阶层。既有党和政府的领导人，也有幼儿园的小朋友；既有各条战线的先进人物，也有正在服刑的犯人；既有各方面的健康人，也有盲聋哑瘸等残疾人；既有各种肤色的外宾，也有外籍华人和港澳台同胞。他们当中不少人在听讲以后，都用自己认为最适宜的方式表达了对讲解人员的感激之情，从中可以看到讲解工作产生了非常好的社会效益。这可以归纳为五个方面：

（一）受到感染、激励。绝大多数听讲解的观众都为我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祖先的聪明才智所感动。他们感到自己的血流加快了，为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员而感到自豪。失足青年流下了愧对祖先的热泪，想移居海外的人打消了出国的念头，表示要为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为振兴中华，辛勤劳动，努力工作，贡献自己的一切。

（二）深化了对祖国、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坚定了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观众们通过新旧的比

较，通过对革命历程的认识和对英烈业绩的了解，进一步认识到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国家不强大，民族不振兴，经济不繁荣，政治不稳定，落后就要挨打。无数事实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自然类的博物馆也有这种效果，如人们听了唐山地震资料陈列馆的讲解，了解了地震所造成的灾害的严重性，也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积极领导人民群众向自然灾害作斗争，从而树立起战胜自然的信心，进一步认识到社会主义好。

（三）增长知识，开阔视野。观众在留言和来信中表示在博物馆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不少学校的老师比较了学生参观前后的变化，感到学生的学习劲头比以前大了，课堂纪律也有了好转。还有一些学生观众听讲解以后，对某种知识领域产生了浓厚兴趣，从而确立了学业方面的志向。例如地质工作常年在野外比较辛苦，但有些中学生通过参观中国地质博物馆，认识到地质工作的意义，立志为祖国的地质事业贡献一生。他们后来就真的考上了地质学院。

（四）陶冶情操，克服思想上的消极因素。许多单位和个人将参观博物馆同政治课、党团活动、主题班会、少先队活动等相结合，把参观听讲解作为思想教育的一个环节。例如在中共整党期间，许多党支部把参观“祖国在我心中”展览作为一项重要活动。一个农村党支部来信说：他们通过参观和听讲，“大家的思想境界高了”，“前线战士、共产党员忠于人民、无私奉献的高大形象，是我们后方共产党员活生生的楷模。我们找到了做一个党员的标尺。”一位年轻人在参观以后写道：“我曾有过迷茫空白，对社会的一些不良现象看得很重，颇有些看

破红尘，对好的现象认为太假。可今天，这一切的一切，空白、空虚都在这里得到充实和弥补，人生价值在于奉献，而不在于索取。”

（五）提高了博物馆的知名度，听到了观众的意见和要求。许多观众通过参观和听讲解，改变了过去对博物馆的陌生感，认识到博物馆是一座丰富无比的大课堂。一些观众还很诚恳地向讲解员提出了对博物馆各项工作的意见和要求；有的还提供了文物、展品的线索。这对改进博物馆工作是十分必要的。

举办流动展览和专题展览

由群众教育部门把流动展览推向基层和举办专题展览，是中国博物馆群教工作的特色之一。早在五十年代初，一些博物馆为了及时配合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需要，为了扩大博物馆的社会教育效益，便采取了流动展览的形式，由群众教育部门将展览送到基层。如四川省博物馆在一九五三年十一月至一九五四年二月举办的《黄继光烈士展览》，先后在内江、自贡、万县、重庆等地巡回展出，观众达30万人次之多。东北博物馆自一九五四年春节起，组成9人流动展览工作队，携带《伟大祖国历史文物》等展览，赴锦州、大连等25地巡回展出，历时二百二十七天，观众多达41万人。一九五八年三月，全国文物、博物馆会议上提出：“多办小型多样的专题展览、流动展览……面向工农下厂下乡。”许多博物馆积极贯彻会议精神，流动展览和专题展览的数量一度大增。流动展览的地区，开始是本馆所在城市的厂矿、部队驻地、街头和郊区农村，紧接着发展到本

省各地，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有的馆发展为在全国范围内巡回展出。从效果上看，社会上对属于革命传统教育类型的内容反映最强烈。

一、流动展览的特点和效果

主题突出、针对性强，富有思想教育作用是流动展览的最大特点。各博物馆或配合政治形势，或配合中共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或结合重大纪念活动，或针对社会上的一些热门话题，按照自己馆的性质和藏品情况，选定与之密切相关的展览内容。如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精神，东北烈士纪念馆组织烈士事迹流动展览小分队，十三年来，行程 15 万里，足迹遍及黑龙江省 82 个地、市、县及全国 16 个省市，受教育人数 160 万之多。湖南雷锋纪念馆建馆二十一年，坚持下乡、下厂，仅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八年，就宣传群众 32 万人次。为宣传“农业为基础”的号召和全国兴修农田水利的热潮，山东省博物馆于一九六一年举办了山东省先进农具配套成龙巡回展。黑龙江省博物馆于一九六三年搞了“各行各业支援农业”等图片资料到农村流动展览。中国历史博物馆在一九六五年组织了“中国古代农田水利”、“中国古代生产斗争和科技成就”展览挂图和小型木制农具模型到农村流动展览。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六十七周年的时候，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推出“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到广东、湖南、湖北、四川等省流动展览，接待观众 10 万多人。

这种流动展览产生了很好的教育作用，普遍受到群众的欢迎和领导的重视。如浙江省博物馆记述他们的流动展览到达展出地点后，一瞬间，人群就拥上来把展览车包围了起来。当展览活动结束的时候，展览车四周还是

站着层层观众。天津自然博物馆的“优生展览”在邯郸市展出时，市的领导出面做了组织宣传工作，全市有14万人参观了展览。东北烈士纪念馆小分队的宣讲活动，常使许多人感动得热泪盈眶。东北烈士纪念馆流动展览小分队以其出色的工作先后荣获了“全国双拥先进集体”、“全国文博系统先进集体”、省“三八红旗先进单位”、省“精神文明建设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

短小精悍，形式多样，少花钱多办事是流动展览的又一特点。由于每个流动展览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主题，展品又经过精心筛选，所以一般规模都较小，所需展板、展品大都防震、防湿，便于携带、运输和装卸。有的配有幻灯片、录像带或小型电影放映机，还加进讲解人员的演讲、演唱等观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手段。如东北烈士纪念馆小分队，在讲解烈士事迹后演唱东北抗联的歌曲，把人们的思绪带进到深山密林，带到抗联战士的营地。又如浙江省博物馆在一九五六年举办小型街头流动展览时，用5辆平板三轮车就带上了全部展板和宣传用品，利用晚上时间，到人烟稠密地区宣传，来去都很方便。

通过流动展览也使群众教育工作的队伍得到锻炼和提高。流动展览所去的地方，大多比较艰苦，展品的运输和拆装，都要自己动手，展出场地有的烈日当头，每讲一次都是汗流夹背，而有的地方又冷得出奇，讲完一场，手脚都冻僵了。在这种情况下，广大参展人员都表现出吃苦耐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陕西省博物馆的参展人员在一次流动展览中，一直展到深夜十一时许。天津周恩来青年时代在津革命活动纪念馆的三、四个女讲解员，在数九寒冬，带着几百斤重的木箱子和铝合金架子，一个村一个村地走，有时一天要拆装两、

三次，讲解七、八场。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的讲解员，在一九八七年一年中就到了成都、重庆、安庆、溧水等 9 个城市巡展、讲解 438 场。

二、举办专题展览

随着群众教育队伍素质的提高和博物馆内有关方面认识上的变化，一些博物馆群众教育人员在本馆内承办专题展览。这其中：一种是通过主动联系，把别人办的专题展览借到本馆展出，用以丰富本馆的展出内容，扩大宣传教育面和增加一些经济效益。再一种是群教人员自己组织、设计专题展览。中国革命博物馆群工部办的《祖国在我心中》专题展览是个突出事例。这个展览的文物征集、清理、排卡、分类以及展览内容的编辑，完全由群众教育工作部承担。他们从一九八六年一月开始筹备，先后到了 13 个省市、300 多个单位进行采访和征集文物，其中包括云南、广西边防前线和有关参战部队，共征集到文物 2500 多件，图片 2000 多张，资料 300 多份，录像带 24 盘，为办展览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他们在征集文物的过程中，通过和广大指战员的接触，受到英雄、烈士们英雄事迹和牺牲精神的感染，激发了工作干劲和宣传英雄的责任感，用半年时间，完成了展览任务，展出面积 1500 平方米，展出文物 1500 多件，图片 300 多张，还在序幕部分复原了一座 1:1 的猫耳洞。在十三个月的展出中，共接待了观众 165 万人次，受到广大群众好评。还应邀到河南、天津、四川、辽宁的一些城市作了巡展。

当然，由群众教育部门举办专题展览仅仅是一些有条件的博物馆的一种尝试，它涉及到和陈列部门、征集保管部门的协调问题，还不是可以迅速全面加以推广的。

配合学校教育活动

配合学校教育是关系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大事,博物馆发挥直观、形象、系统、生动的优势,在配合学校教育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其中开展比较普遍的有组织学生参观、提供教学参考资料、辅导教师、担任校外辅导员、引导和参与课外活动等。

(一)组织学生参观。教育部门为弥补课堂教学缺少形象教具的困境,一直比较重视组织学生参观博物馆,将博物馆作为他们的第二课堂。因此,大多数博物馆接待的学生数量要占全部观众人次的15%左右,有些博物馆接待的学生数量更多达观众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以中国历史博物馆为例,一九七六年观众总数是896779人次,其中学生为276459人次,占30.8%;一九七七年观众总数是500538人次,其中学生为115256人次,占23%。学生们参观的目的多种多样,有的结合课堂教学,有的准备参加高考,有的是团、队活动。鉴于以上情况,博物馆对接待学生参观是非常重要的。有的博物馆早在六十年代初期,就建立了专门的学生工作机构,负责有关对学生讲解工作的事宜。各博物馆对学校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从而比较准确地掌握了信息,摸索总结了一些配合教学的工作规律。他们对学校的调查研究主要有以下一些做法:在本地区选择几所有代表性的学校作为了解本地区教育情况的窗口,着重了解与本馆陈列内容相关的课程设置及教学进度;老师在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在学生参观以后,召开各种类型座谈会,请师生填写调查表,了解学生的接受能力和广大师生对博物馆的

意见与要求，到学校听课，分析与本馆内容相关的课程的教授方法。同课本、乡土教材编辑部门建立联系，及时了解教材的编辑、修改意图。各博物馆根据调查得到的各种信息，进行分析、综合，建立专门的业务档案，制定可行的接待计划。有的制作了“各年级相关课程一览表”，“新旧教材对照表”；有的画出了学校组织参观博物馆的时间曲线图，根据曲线图适时调配力量做好接待、讲解工作。

根据不同年级学生的特点，大多数博物馆专门分别撰写了对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等不同内容的讲解稿。这些讲解稿的共同特点是以教学大纲和课本中的重点、难点作为讲解的重点，既远离课本，又不简单重复课堂教学内容。在讲解过程中，还根据各类学校（如重点中学和一般学校，城区学校和郊县学校）的区别，参观时间（是开学之初还是学期中间，或者期末复习阶段）的不同，灵活地变通讲解内容、讲解方法，尽量做到有针对性，以争取最大限度的讲解效果。

为了让学生在参观时更多地得到一些知识，旅顺博物馆于一九八六年四月编印了两套分别供中、小学生参观使用的思考题，经过试用、修改，于一九八七年四月正式定稿，定名为《旅顺博物馆陈列内容思考题》。它依据历史文物专题陈列的内容，按陈列顺序，以填空的形式提出问题，在学生参观前发给他们，请他们一边参观，一边填写，填写过程中讲解员做些适当辅导，群众工作部对这些答题做出认真批改后，附上教学参考意见寄回本校。天津自然博物馆在植物群落部分利用布景箱、标本、录像片，收到了内容贴切、视听结合、形象生动的教学效果，不少学校特意带学生去讲授有关课程。

(二)提供教学参考资料。一些馆发挥“博物”的优势,将本馆收藏价值不高且数量又较多的文物、标本以及模型、复制品、图片、照片、幻灯片、录像片、录音带等资料,无偿提供学校使用。有的博物馆,特别是自然科学类博物馆,还将本馆采集、制作的多余矿石、动物、植物标本送给学校,受到校方欢迎。

(三)辅导教师。在同学校的接触中,博物馆群教工作者发现教师队伍中存有两个问题,一是教师的水平很不整齐,有的既有较丰富的知识,又有较丰富的教学经验,甚至可以著书立说;有的教师则知识面较窄,工作较为吃力。而几乎所有的历史教师都极其缺乏文物、标本等博物馆展品知识。鉴于这种情况,博物馆群教工作者自一九六五年起为教师举办了多种形式的辅导、培训活动。一种是大型讲座形式,集中全省、市有关学科的教师,分若干专题讲授文物、历史、自然科学等方面知识;再一种是在陈列室上课的形式,每期四五十人,重点讲解陈列中与教学有关的内容;第三种是动手操作形式,多见于自然科学类博物馆,如中国地质博物馆组织地理教师到野外采集矿物标本,认识地形地貌。北京自然博物馆辅导教师制作小动物标本和植物标本。

(四)参与学校课外活动。一些学校或出于德育教育的需要,或为了丰富课外活动,聘请群教工作者担任校外辅导员。这些人员配合教师开展了许多有教育意义的活动:有的组织了主题班会,有的带学生参观名胜古迹,有的给同学们讲故事,有的辅导学生们收集资料、自办小展览。这种活动对群教工作者是很大鼓舞。

一些学校和博物馆联合举办的“义务讲解员”活动更是一举多得。参加这项活动的主要是高中一、二年级和

少量初中二年级的学生。博物馆群教部门通过对他们的选拔、培训，经上岗考试合格者，利用假期和星期六下午到博物馆担任义务讲解员。这既在一定程度上充实了讲解力量，缓解了讲解员少的矛盾（特别是节假日，观众较平日大为增加，需要较多讲解力量），同时，同学们通过培训和反复讲解，巩固并拓宽了课堂所学的有关知识。再者，还使他们有机会接触社会，培养了爱劳动和为人民服务的好品德。例如一九八七年，北京景山学校31名初中二年级学生通过义务讲解实践，74%的同学认为自己所学的知识更深化了，33%的同学感到了为人民服务的幸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心灵财富。91%的同学在“苦”和“累”中知道了幸福来之不易，从而更加理解、尊重他人的劳动。77%的同学认为通过讲解，提高了社交能力。所以学校和博物馆都认为这种义务讲解，为校外活动开辟了一条新路。

举办博物馆知识竞赛和夏（冬）令营

一、博物馆知识竞赛活动

将竞争机制引进博物馆社会教育，举办以博物馆所宣传的内容为题材的各种形式的知识竞赛，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参加博物馆活动的兴趣，是各博物馆日益广泛采用的教育手段，而且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博物馆界举办的这类活动，大都得到当地报刊、电视台、电台等新闻媒介的支持与合作。

甘肃省博物馆于一九八六年四月举办的“兰州市中学生爱鸟周知识竞赛”和“兰州市爱鸟周知识竞赛”开辟了博物馆社会教育的一条新途径。该馆群众工作部和自

然部首先在馆内筹办了人与鸟——献给一九八六年爱鸟周展览，然后便联合省林业厅、市教育局、省环保局、省电视台、兰州晚报社等单位开始了上述两项竞赛活动。兰州市中学生爱鸟周知识竞赛采用电视录像的形式，教育局负责向各中学发出竞赛通知，20多所中学派代表队参加了初选活动，最后进行决赛，电视录像后，分两次向全市播出，受到观众普遍好评。兰州市爱鸟周知识竞赛采用答卷形式，试题在《兰州晚报》登载，广大青少年和干部群众踊跃参加竞赛。竞赛期间，展览室内观众比往日有很大增加，平均每天800多人。既使爱鸟活动深入人心，又扩大了博物馆的社会影响。

为了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五十周年，上海鲁迅博物馆在一九八六年十月同上海电视台、《文汇报》等单位联合举办了鲁迅文学知识竞赛。此次竞赛分预赛和决赛两个阶段。当预赛试题在文汇报登出后，短短十天之内，就有3100多份应试的卷子从全国28个省市寄回。其中既有耄耋老人，也有稚气未脱的小学生，最后有100名优胜者进入决赛。决赛活动改变了传统的一问一答形式，而采用表演小品和提问相结合的形式，演员们将鲁迅《药》和译著《死魂灵》等作品中的人物再现于舞台，将鲁迅作品中的精华呈现在决赛者和广大观众面前，让观众通过演员的神态、服饰、举止、对话，猜出演员所扮演的是谁，出于鲁迅的哪篇作品，以及相关的问题。上海电视台对决赛进行了录像和播放，掀起了学习鲁迅、纪念鲁迅的热潮。

北京博物馆学会在一九八七年组织北京地区的29座博物馆举办博物馆知识竞赛，为期八个月之久，是中国博物馆界举办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知识竞赛活

动。这次活动分宣传、初赛、决赛三个阶段。《北京青年报》和《北京生活参谋报》，在近四个月的时间里，每周各用1个整版，专门刊登介绍博物馆的文章，随后，在这两家报纸上同时登载了100道试题，试题的答案一部分能从报纸发表的文章中找到，另一部分要到博物馆的陈列中去找。有的参赛者全家出动，利用休息时间，将29座博物馆都参观了一遍。北京电视台利用“黄金时间”，对决赛进行了现场直播，坐在电视机前的千家万户怀着浓厚的兴趣注视赛手们的回答，从中既学到了知识，又加深了对博物馆的了解。国际博物馆协会秘书长在了解了此次活动后，给予充分的肯定，并且约稿在世界范围内作了推广、交流。

类似的活动在甘肃、河北、湖北、辽宁等省都先后举办过。

八十年代以来，演讲成为颇受群众欢迎的一种宣传教育活动形式，各行各业举行了一系列演讲比赛。借鉴社会上的成功经验，贵州省博物馆联合当地的校外教育部门，于一九八七年率先举行了由中小学生参加，以“可爱的贵州”为题的演讲比赛。“可爱的贵州”是贵州省博物馆办的一个大型陈列，从历史、地理、物产、人物、风土民情等方面反映了贵州的可爱。同学们在参观这一陈列的基础上先写作文，再进行演讲，既加深了对陈列的理解，又通过他们的演讲扩大了陈列的影响。贵州电视台播放了演讲比赛的实况，进一步扩展了博物馆的宣传教育功能。

北京博物馆学会学习贵州省博物馆的做法，联合市教育部门和新闻单位，举办了以“我爱北京博物馆”为主题的演讲比赛。参赛对象为本市高、初中在校生。《北京

日报》、《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和北京电视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多次播发了这次比赛的规则、办法和活动情况。北京 30 家博物馆携带近百种宣传资料举办了声势浩大的博物馆宣传日活动，用图表、画面、录像、广播和发放宣传品等方式，向行人介绍各博物馆的展出内容、开放时间、地理位置、乘车路线等，使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了解了北京地区博物馆的概况。比赛分为高、初中两个组别，包括写作和初评、复评、总评、决赛共 4 个阶段。学生们为了写好一个博物馆或某一个展览，一次又一次地到博物馆参观。北京以区、县为单位按两个组别各选出 10 篇优秀作文，由博物馆界组织复评，评出优秀作文 60 篇（初、高中各 30 篇）进入总评阶段。总评采用演讲的方式，从写作和口头表达两个方面评分，评出初、高中各 10 名进入决赛。决赛仍是从写作和演讲两个方面评分，评出一、二、三等奖。学生们优美的文笔和真挚的情感，产生了强烈的感染力，使到场的博物馆界人士感到欣慰和鼓舞。赛场上的广大师生也一致反映这种活动有意义，希望今后继续举办。为了巩固这次活动的成果和进一步宣传博物馆，北京博物馆界自愿集资，将 60 篇优秀文章汇编成册，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中国文物报》、《北京青年报》、《北京博物馆信息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还刊登、播出了部分文章。实践证明，这种竞赛活动确实是扩大博物馆教育面的好手段。

二、博物馆夏（冬）令营

夏（冬）令营是受到社会广泛欢迎的一种学生假期活动，自一九八六年起，苏州博物馆率先把这种融知识性、娱乐性为一体的教育活动引进到博物馆，举办了苏州市

首届少年历史访古夏令营。此次活动紧密配合了纪念苏州建城两千五百周年的活动，受到社会好评。

为了搞好夏令营活动，苏州博物馆同组营单位，认真安排了活动计划，组成了强有力的夏令营领导机构，拟定了活动纪律和评选文明集体、文明营员的条件。在四天的时间里，营员们既参观了戏曲博物馆、碑刻博物馆、刺绣博物馆和苏州博物馆，又到上方山访问、考察古遗址，实地采集文物标本。学生们在愉快、有趣、惊奇和兴奋中得到了家乡历史文化的熏陶，拓宽了知识面，陶冶了爱家乡、爱祖国的情操。

苏州博物馆组织夏令营的经验在全国群教工作会议上进行了交流，引起与会者的兴趣。北京博物馆界在研究了苏州的做法和社会上的各种夏令营的状况后注意到，社会上多举办夏令营，很少有冬令营，而冬季又恰是博物馆的淡季，观众较少，博物馆的接待力量相对充裕，于一九八八年一月，推出了博物馆冬令营活动。他们利用北京地区博物馆数量多、种类也多的优势，确定博物馆冬令营的主题是“了解祖国、热爱祖国”。围绕这一主题，组织学生参观一系列博物馆。其中既有历史类，又有自然科学类；既有艺术类，又有名人纪念馆。这些博物馆的选择均有内在的有机联系。在活动项目上，比学生们平常到博物馆的参观要丰富的多。如自然博物馆现场为营员们表演动物标本的制作；宋庆龄故居组织营员们在宋庆龄像前宣誓，还让他们亲手给宋庆龄名誉主席生前养的鸽子喂食；茅盾故居给每个营员一份茅盾临终前给中共中央信件的复印件，这些都大大激发了学生们参观博物馆的兴趣。

各博物馆对这种活动都很重视，他们站在讲求博物馆

社会效益和热心为国家培养下一代的高度,不计较报酬,不惜损失一些票房收入,甚至还要送给营员一些纪念品。

北京博物馆界的第一届冬令营结束后,在社会的强烈要求下,每年均举办冬、夏令营各一次,每次400人左右。而且每次的活动都要做到有所创新,不断充实。如第二届冬令营增加了让营员动手操作的内容,第三届增加了登飞机和智力游戏,还请著名作家浩然以及当年的老游击队员给营员讲课,并合影留念。每届夏(冬)令营参观的博物馆也不完全一样。他们甚至把聋哑学生、盲学生、弱智学生也请进博物馆夏(冬)令营,并特意安排一些适合他们生理条件的活动内容。

陕西、贵州、河北、辽宁、湖南、上海等省市的博物馆也举办了夏令营活动。从全国看,这种活动有日益发展扩大之趋势。

宣传教育活动形式的多样化

一、讲座和报告会

举办讲座和报告会是博物馆进行宣传教育活动的重要方式之一。各博物馆根据自身的性质和任务,从馆内藏品和陈列内容出发,针对社会需要,举办了多种多样的讲座和报告会。在时间上有定期和不定期的;在场所上有在馆内举行的,也有到工厂、农村、部队、机关、学校、少年之家等处举办的;在内容上有系列性的,也有专题的。综合各馆的做法,举办讲座或报告会,主要有以下3种情况。

(一)结合本馆举办的陈列展览。选择人们特别感兴趣的内容,举行学术报告,借以繁荣学术活动。举办这

种讲座大都事先登报预告或发票通知,通告讲座的内容、题目、时间、地点和主讲人。讲座的主讲人一般都是学术上有一定造诣的研究人员。如南京博物院自一九八年以来举办的以江苏历史为题材的讲座就有“高邮天山汉墓黄肠题凑的意义”、“孙中山与南京临时政府”、“连云港摩崖石刻的重大发现”、“南京地名考略”、“曹雪芹与江苏”等 10 多个讲题。

(二)配合形势教育举办专题讲座。其题材以爱国主义、革命传统、烈士事迹等为主。主讲人多为群众工作部的工作人员。如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四年间,北京市许多单位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意见》,邀请中国历史博物馆的讲解员举行有针对性的讲座活动。该馆讲解员在北京啤酒厂、北京电视机厂、工程兵部等 40 多个单位进行了以《社会发展史》、《中国近代史》和《我们伟大的祖国》为题材的讲座 230 多场。由于他们讲的深入浅出,生动感人,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又如东北烈士纪念馆在一九八四年配合中国共产党的整党学习,为 714 个单位的 52 万多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宣传烈士事迹 947 场。一位老干部听了宣讲后说:“仿佛又回到了战火纷飞的时代,想起那些牺牲的同志,深为自己没有尽到一个幸存者的责任而内疚。”

(三)为普及历史、文物、自然科学知识举办的讲座活动。听讲对象主要是求知、求解型的观众。这种讲座往往系列化,在一段时间内,听众也相对稳定。如上海博物馆以馆藏文物为基础,连续举办了《从青铜器看中国奴隶社会历史》等 10 个系列讲座,受到热烈欢迎和一致好评。

二、电化教育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促使博物馆工作者积极探索新的教育手段,将声光电引进博物馆社会教育活动之中。一九七六年以前,主要是有线广播、录音、幻灯和少量的电影,一九七六年以后,电视、电脑等现代化视听技术在博物馆迅速推广。

五六十年代,许多博物馆都安装有广播设备,向观众介绍本馆展出内容,说明参观注意事项等。它部分地解决了观众多、讲解人员少的矛盾,满足了一部分观众的求知愿望。限于当时的科技水平和博物馆财力,广播的音响效果都不太理想,特别是“音”和“物”结合较差,常常出现观众听到声音后找不到所介绍的物,只能听,做不到看、听一体化。为解决这种矛盾,少量博物馆在展柜内加了指示灯,当播放录音时,相关的指示灯同步闪亮,效果较好。

这一阶段,博物馆界对幻灯的运用还是比较多的,有的在陈列室安置屏幕,放映同陈列内容相关联的幻灯片,帮助观众较全面、系统地认识陈列内容。有的博物馆在流动展览、巡回讲演、学术报告中配备幻灯片的放映,既充实了内容,又活跃了气氛。

一些规模较大的博物馆,如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等都建有电影放映厅,结合学术报告等活动,放映相关的新闻纪录片、资料片、科教片等。中国历史博物馆就放映过《马王堆汉墓》、《铜绿山古矿冶遗址》、《敦煌艺术》、《紫禁城》等影片。

一九八八年,故宫博物院同美国有关公司合作搞成录音讲解,是中国博物馆电化教育的一大突破。他们运用出租录音机、录音带的方式,由承租观众自己控制开关,

边参观边听讲解。录音带都是由专家学者担任讲解，水平较高。在语种上既有英、法、日、西班牙等多种外国语，又有闽、粤等中国方言，能广泛地适应各国来宾和各地侨胞的需要。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随着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博物馆采用了电视教育的手段，主要做法有：

(一)在展室设置录像放映点，播放与展览内容有关的专题片，适当改变观众的参观节奏和注意力，使观众获得比较完整且形象生动的感受。如故宫博物院钟表馆，那些造型精美的钟表足以令观众啧啧称赞，然而由于既不能启动运转，又不让观众摆弄，观众不能领略其妙。现在在钟表馆内定时放钟表录像，使观众既能看到它们的机械原理，又听到打更、报时、鸣叫等声音，加深了对展品的理解，满足了心理上的要求。

(二)开辟录像放映室。一些博物馆在展厅中或展厅附近开辟专室，放映与本馆陈列有关的录像带，作为观众参观的组成部分。如淮海战役纪念馆，在观众参观陈列以后，引入放映室观看四十多分钟有关淮海战役的录像资料，帮助观众将刚刚参观过的内容条理化。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均在展览室增辟设有 80 个座位的录像室，定时放映紧密配合陈列内容的录像片，每年能接待七、八万观众，效果比较明显。

(三)同电视台、电教馆等专业单位联合制作电视片，将博物馆知识推向社会。八十年代以来，电视机迅速进入千家万户，覆盖面大，收视率高。博物馆界充分发挥“物博”的长处，或就一组文物，或就一个事件，或就一段历史同电视台、电教馆联合录制成片予以放映。如中国历史博物馆在一九八六年至一九八七年间和中央电

视台制作了系列片《在博物馆里》(共 10 集),介绍了古代的绘画、雕塑、青铜器、陶瓷器以及天文,医学等方面的专题知识。他们还同北京电教馆合作,配合中学历史教学的需要,录制了 10 多集专题片如《郑和航海》、《两宋绘画》、《唐代手工业》等。陕西半坡博物馆由讲解员参与同陕西电视台合拍的科普电视片《半坡姑娘》、电教片《西安半坡》,多次在中央电视台、陕西省电视台播放,在全国都有较大影响。

(四)独立摄制电视片。限于财力,到八十年代末仅有少数博物馆购置了摄像、编辑、字幕机等设备,能自己拍摄录像片。这样既有利于本馆、本系统积累资料,更有利于及时报导,同时还可大幅度节省拍摄经费。上海博物馆拍摄的《青铜器》、中国革命博物馆拍摄的《祖国在我心中》、中国历史博物馆拍摄的《废品中的瑰宝》等,在社会上产生了影响。

(五)激光视盘的运用。激光视盘是一种信息储量大、图像清晰,而且保存、使用都很方便的新宣传手段。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做了一点放映尝试,效果较好。这一宣传手段在博物馆界有逐步发展的趋势。

(六)电脑开始进入博物馆的宣教领域。半坡博物馆为了更形象化、立体化地表现半坡遗址的陈列内容,在遗址展厅内搞了一整套完备的电子陈列讲解设备,当观众步入遗址大厅时,可以听到由电脑自动控制趋动的导游解说,各种色彩的指挥灯伴着观众的步伐,显示出不同遗址的真实原貌。

三、博物馆之友

博物馆之友的工作开始于五十年代末期,它是博物馆

广泛联系群众，争取社会各界和人士对博物馆事业的关心和支持，扩大博物馆影响的一条重要渠道，博物馆之友的成员有教师、科研人员、机关工作者、美术工作者、文物爱好者等。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还在一九八八年五月，建立了博物馆系统的第一个“博物馆之友”协会。

开展博物馆之友活动的博物馆，一般都做到了“四有”，即有证书、有章程、有联系人、有活动。经过本人申请或他人推荐，获准成为博物馆之友的人，在履行填写表格等手续后，由博物馆发给自行设计制作的“博物馆之友证书”。在博物馆之友的章程中，规定了博物馆之友的权利和义务。主要权利是：凭证免费参观本馆举办的一切展览；参加博物馆举办的讲座；查阅馆内的图书资料；获取本馆的部分出版物、宣传品。其义务主要是：积极主动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博物馆的展览和有关业务活动；组织群众参观博物馆；收集群众对博物馆的要求和意见；提供文物、标本的线索等。例如有的博物馆在物资回收公司中发展了博物馆之友，从中获得了群众当作废品处理的珍贵文物。有的博物馆之友定期在陈列室中为观众讲解或参加博物馆的值班工作。有的博物馆组织博物馆之友游览当地的名胜古迹，并为他们讲解有关知识。

四、文物鉴定、咨询答疑

文物鉴定是一项融知识性、政策性、服务性为一体的、深为社会欢迎的工作内容。中国民间散布着数量众多的文物，其中不乏一些有重要价值乃至罕见的珍贵文物。然而，许多文物保有者并不具备文物知识，加之社会上有人专门倒卖文物，引发社会只片面地看待文物的经济

价值，因此极不利于对这些珍贵文化遗产的保护。他们当中许多人想知道自己所持有文物的真伪、时代、价值等，因此常有一些人到博物馆了解有关文物知识，有的还带着文物照片或自己收藏的文物。博物馆很重视对他们的接待，既实事求是地讲明所收藏文物的价值、时代，也主动地向他们宣传国家有关文物的政策、法规。博物馆界还多次利用庙会、游园、服务周等机会，在公共场合设立文物鉴定台，义务为人民群众鉴定文物。这些活动不仅引导人民群众正确认识文物价值，增强保护文物的自觉性，而且还从中发现文物的线索，甚至收购到一些珍贵文物。这项工作是和馆内有关专家配合进行的。

同文物鉴定相近的咨询答疑工作也一直受到各馆的重视。自五十年代起，各博物馆都设立了意见簿征求观众的意见和要求。在观众当中常常有人提出一些有关文物的疑难问题请求解答，因此博物馆建立咨询答疑工作是非常必要的。观众们有关求知求解的各种来信，基本上都能得到回音。自一九八五年起，中国历史博物馆、河南省博物馆、上海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辽沈战役纪念馆等陆续在陈列室设立了咨询服务台，用醒目的标志向观众说明“我们愿意为您服务”，主要内容是解答疑难，提供讲解。上台值班者都是有较丰富业务知识和较强责任心的人员。咨询服务台还设有登记簿，记录每天接待观众的情况，特别是遇到一些不能解答的问题，都认真记下问题的内容，提问题人的姓名和通讯地址，以便查清弄懂后向观众作出解答。观众的来信和现场求解均反映了观众对博物馆的信任，因此，必须认真对待。实践证明，通过咨询答疑，不仅解答了观众的疑问，还增进了博物馆与社会的联系，

同时也有助于锻炼队伍，可谓一举多得。

五、图片资料的供应

图片资料供应也是各博物馆为社会服务的一个重要内容。各博物馆都拍摄、收集有本馆藏品、展品及相关内容的大量图片，这些正是新闻、出版、教育、科研等方面所需要的形象资料。为此，博物馆界在人力、财力并不宽裕的情况下，仍然想方设法配备专人，开辟专室，提供样片、目录，供来访者查找。社会上的许多出版物，如书籍、教材的插图，大部分是博物馆提供。据统计，一些较大的博物馆每年对外供应照片在1万张左右。

六、出售纪念品

售品部的服务功能受到各博物馆的普遍重视。售品部的设置主要是为了满足各种层次的观众在知识性、纪念性方面的需要以及饮食之需。出售的物品主要为两大项：一项是有关本馆陈列内容的印刷品、音像制品和纪念品，如说明书、图录、幻灯片、录像带、文物复制品、动植物标本等。另一项则是方便食品、饮料，如面包、饼干、矿泉水、茶水等。还有的博物馆结合本馆展出内容出售特色食品，如苏州民俗博物馆的小餐部，出售反映苏州民俗的民间小吃，有苏州豆腐花、冰冻绿豆汤；故宫博物院出售一些清代宫廷小吃。这就不是单为解决观众的饥渴问题，而是“寓教于吃”，让观众在美食中进一步加深对展出内容的印象。